

李银河文集

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 / 李银河著. -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2.4

(李银河文集, 4. 第1辑)

ISBN 7-5057-1785-5/I·467

I. 中... II. 李... III. 婚姻-问题-研究-中国 IV. D6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11643 号

目 录

自 序 /1

第一篇 择偶标准

引言	/1
文献综述	/2
研究设计	/6
研究结果	/7
结论	/19

第二篇 青春期恋爱

引言	/24
文献综述	/25
研究设计	/28
研究结果及讨论	/29
结论	/45

第三篇 浪漫爱情

引言	/48
----	-----

文献综述	/49
研究设计	/52
研究结果	/55
结论	/65

第四篇 独 身

引言	/68
文献综述	/69
调查的样本、方法及结果	/73
结论	/82

第五篇 婚前性行为规范

引言	/86
文献综述	/88
研究设计	/92
研究结果	/95
结论	/108

第六篇 婚姻支付

引言	/113
文献综述	/114
研究设计	/118
研究结果	/119
分析与结论	/129

第七篇 自愿不育

引言	/133
文献综述	/135
研究设计	/138

研究结果	/139
结论	/148

第八篇 婚外恋

引言	/152
文献综述	/153
研究设计	/156
研究结果	/159
结论	/169

第九篇 离 婚

引言	/173
文献综述	/174
研究结果	/179
结论	/191

第十篇 同性恋

引言	/195
文献综述	/196
基本事实	/201
分析与结论	/225

第十一篇 婚 姻

历史	/232
现状	/236
婚姻道德	/240
未来婚制	/244
附录一：婚姻问题调查表填写情况统计	/249
附录二：国外几种值得注意的动向	/252



自序

本书运用社会学方法研究了当代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行为及观念，因此应属“社会科学”范畴。在中国，人们似乎还不习惯将人文与社会科学作明确划分，这也许是由于中国文化人向有务虚不务实、重理论轻事实的倾向。我们的“社会科学”与其说更接近于科学，不如说更接近于文学，想象力多于对事实的描述，应该怎样的价值判断多于是怎样的实证考察，辞章之美多于准确翔实。这本书于是尝试对上述倾向有所突破，力求对社会状况和人们的行为及观念做经验的研究，提出的每一论点也力求有事实作依据。这样做的结果可能会减弱理论的“光彩”，但我觉得这是必要和有意义的尝试。

在美国留学六年，学习了大量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对西方社会学中的经验研究方法有较多的了解。现在回来做这些经验研究，除了研究本身的意义外，还有以自己的努力倡导和实践实证精神的意思。

书中除了“婚姻”一篇作于1980年外，其余十篇的研究均作于1988年9月至1990年8月这两年间。近十多年，我国经历了政治、经济、社会诸方面的大变革，人们在性爱婚姻方面的行为方式也有了很大的改变。本书试图了解当代中国人在择偶标准、青春期恋爱、浪漫爱情、婚前性行为规范、婚姻支

付、婚外恋、独身、离婚、自愿不育、同性恋、婚姻等方面行为方式及观念，并研究影响着这些行为方式及观念的诸因素，从而在对事实描述的基础上，尝试对它们做出恰当的释。

本书的研究范围涉及一些仅属于少数人的行为，如独身、自愿不育、婚外恋、同性恋等。笔者认为，对少数人行为的究价值并不下于对多数人行为的研究，对“异常”现象的研价值亦不下于对“正常”现象的研究。只有将人口中少数人异常行为方式包含在内，才能勾勒出事实的全貌。具体地讲，虽然多数中国人在一生中都会结婚，会生孩子，不离婚，没婚外恋，情爱对象限于异性，但只有当我们了解了那些不婚、不生育、有婚外恋、离婚或同性恋经历的人们的行为方式及观念之后，才能了解我们社会在性爱与婚姻问题上的全貌才能懂得多数现象仅属或然而非必然，每种现象都是“变量”而非常量。从研究的结果可以做出一个大胆的推论，即随着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之打破单一的农业社会结构与生活方式，代中国人在性爱与婚姻方面的多种选择也会打破传统单一“标准模式”。这个发展演变过程很值得注意，并需要做多角度层面的研究。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笔者曾得到冯小双、王小波二同志的助，前者参加了“独身”与“离婚”两篇的调查和初稿工作，后者参加了“同性恋”一篇的调查和初稿工作，并对全书所使用计算机进行的数据分析作了统计学和计算机方面的指导在此特向二位致谢。此外，在实地调查过程中还得到北京大学社会学所诸位同仁的协助以及被调查者的配合，在此一并谢。

最后，还应感谢我在北京大学作博士后这两年间导师

孝通教授。虽然由于他公务繁忙，笔者并不能经常得到他的直接指导，但这位社会学老前辈所作的富于创造性的研究工作是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的楷模，他的注重社会调查的科学精神是我们应当继承的。

作者于北京大学

1990 年 9 月 15 日



第一篇 择偶标准

引言

摩斯坦 (Murstein, B.I.) 曾将其所著的一部关于择偶标准的著作题为“谁会跟谁结婚”。这个短句言简意赅地为择偶标准一词下了定义。择偶这一行为是千千万万的人们世代代在实践的一种行为，社会学关心的是：这种行为中是否有规律？有没有某种理论或模式可以概括人们这一行为的规律并对某人跟这个人而非那个人结婚做出合理的解释？根据摩斯坦的介绍，关于择偶标准的理论至少有五种：第一种是历史前例理论，它强调在历史上普遍存在着由父母包办或父母做主要决定的择偶方式；第二种是心理分析理论，它以弗洛伊德的理论为依据，强调人是社会动物，认为在择偶行为中生理需要的因素大于社会选择的因素；第三种是需要互补理论，它强调在择偶时人们的主要考虑是各种需要的相辅相成，例如支配欲强的男性往往选择依赖性强的女性为偶，想受人侍候的男性往往选择会侍候人的女性为偶等等；第四种是价值理论，它认为人在生长过程中，通过社会化 (socialization) 的作用已逐渐将某种价值观内化于个性之中，而这种价值观即成为其择偶的依据；第

五种是过程筛选理论，它认为不能用人的个性因素来解释择偶行为，而只能视之为一个过程，人们相遇，相互产生好感，通过自我启示达到相互的了解依赖，最终满足了各自个性的需要，因此，筛选理论是强调过程而不是强调某种决定因素的理论（摩斯坦，1976）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婚姻由父母包办，婚姻当事人没有什么择偶的自由。当然，父母包办时也有一个择偶标准的问题，一般说来就是所谓“门当户对”。关于社会阶层与择偶标准的关系，费德曼（Feldman, J.）等人曾提出过一个三模式理论框架，其中第一模式是社会分层与择偶行为绝对相互独立的模式，即择偶行为完全是随机的；第二模式是社会分层与择偶行为绝对相互依存的模式，即择偶行为完全由社会阶层所决定；第三模式是某一社会阶层内的随机择偶，即择偶范围不会超出人所处的阶层但在阶层内是随机的。（费德曼，1975）中国传统社会的情况似乎属于第三种。在近现代，情况有了变化，一般新青年主张恋爱自由，择偶自由。在1931年已有了主张婚姻自由的婚姻法，1950年婚姻法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反对包办婚姻，提倡和保护自由恋爱、择偶的权利。那么，目前中国人的择偶标准有哪些特点？又有哪些因素对人们的择偶行为有重大影响？影响的程度如何？这就是此项研究想解答的问题。

文献综述

当代社会学关于择偶标准的研究可以大略归纳为三类：一类是关于一般择偶标准的综合性研究；第二类是对某项择偶标准的具体研究；第三类是对于择偶标准的变化及其原因的研

究。

兆提(Jyoti, S.K.) 在一项研究中将人们的择偶标准归纳为以下八类：(1) 性格，(2) 教育与智力，(3) 健康与相貌，(4) 经济状况，(5) 气质，(6) 年龄，(7) 持家能力，(8) 宗教。(兆提，1983)

费舍(Fisher, W.A.) 在一部题为“苏联婚姻市场”的著作中对一般择偶标准的研究发现，这些标准包括(1) 他(她)爱你，(2) 你爱他(她)，(3) 性格，(4) 教育，(5) 健康，(6) 相貌，(7) 民族，(8) 职业，(9) 经济状况。(费舍，1980)

麦尔顿(Melton, W.) 等人的研究将择偶标准划分为两大类，一类为物质性的，其中包括经济社会地位等标准；另一类为精神性的，其中包括感情的和谐一类的因素。他们的研究是以美国大学生为对象的，调查结果表明，(1) 黑人比白人更重视物质性标准，(2) 在精神性标准上没有性别人种的区别，(3) 男性黑人比男性白人更重视物质性标准，(4) 人们对物质性标准的重视程度与社会经济地位成反比，即社会经济地位越低的人越重视物质性标准。(麦尔顿，1976)

贝瑞斯(Peres, Y) 等人通过对以色列报刊上 1800 个征婚启事的研究发现：第一，男性和女性择偶标准间的区别正趋于消失；第二，女性比男性更加挑剔；第三，婚姻从被视为“搭伙”转向被视为“交友”，即婚姻双方从以物质需要上的互相补充、支持和辅助为主转向以个人吸引力及相互满意程度为主。(贝瑞斯，1986)

詹伯斯(Chambers, V.) 等人一项研究中发现，相貌相似是择偶标准之一。他们所用的方法是请研究对象为 18 对定婚男女的相片配对。相片是完全打乱了的，而正确配出对子

的概率说明，相貌相像有可能是一个重要的择偶因素。（詹伯斯，1983）

科洛斯（Cross, L.J.）研究了宗教因素在现代择偶行为中的重要性，研究假设有下列几项：第一，女性比男性在择偶时更重视宗教；第二，年龄大的人比年龄小的人更重视宗教；第三，已婚与寡居者比独身者更重视宗教。上述假设通过检定得到了证实。（科洛斯，1981）

辛格（Singh, H.）以移居美国的印度人为对象，研究了他们在纽约一家大报上刊登的征婚广告，发现（1）种性在择偶中降低为不重要的因素，只有 4% 的男性和 12% 的女性对配偶的种性有要求；（2）对宗教有要求的也不太多——28% 的男性和 15% 的女性对配偶的宗教信仰作了规定；（3）对配偶的社会地位提出要求者在男性中占 14%，在女性中占 30%；（4）有较多的人提出了地理和语言方面的要求，他们在男性中占 27%，在女性中占 40%。（辛格，1977）

科威坦诺维克（Cvetanovic, m.）以贝尔格莱德日报上的征婚广告为依据研究了南斯拉夫人的择偶标准，他发现（1）80% 的男性要求同岁或较年轻的女性，而 90% 的女性要求年龄较大的男性，以大七岁为上限；（2）许多人希望对方同自己职业、教育相近，但也有一半以上的人在强调自己的职业与教育程度时并未对配偶的职业及教育程度提出特别的要求。登广告者在女性中多为办事员和退休者，在男性中多为退休者和技工。（科威坦诺维克，1973）

林（Lin, R.I.）在台湾大学社会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教育程度在择偶行为中重要性的论文。对“人们愿与教育程度相近的人结婚”这一假设作了检定。他发现，在 1966 年的样本中，调查对象中有 49% 男女教育程度一致者的比例超过

了不一致者，作者分析其主要原因在于女子上学的机会增高致使女子同男子教育水平的差距缩小。（林，1977）

霍依特（Hoyt, L.L.）等人 1981 年以美国大学生为对象的研究表明，在过去十年中择偶标准发生了下列变化：（1）对未来家庭生活的关注下降而对对方社会地位的关注有所上升；（2）对配偶智力程度和教育程度的要求提高了；（3）男性在选择女性时更注重相貌而忽略持家能力，例如烹调能力等；（4）贞节对于男女双方都不再是重要的因素。作者分析导致上述变化的原因首先是性角色变化的反映；其次是受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再次是人们对浪漫爱情的理想化倾向上升了；最后，变化中的社会经济条件也是造成上述变化的重要原因。（霍依特，1981）

在我阅读关于择偶标准的文献时所见到的最“保守”的（下述观点一般被视为保守，但不是在十分精确的意义上使用“保守”一词的）一篇论文是弗克（Falk, G.）的《择偶在美国》。他认为择偶不是只靠机遇（强调浪漫爱情者持这种主张），用浪漫取代现实往往是婚姻不和的来源。各种文化择偶标准差异很大，在某些民族和文化中，婚姻的结合根本不考虑浪漫爱情。浪漫爱情是在朋友中发展起来的，而朋友中视为珍贵的往往是造成婚姻不和的因素。他指出，人们的择偶行为在实际上受到多种限制，它同每个人的行为参照系紧紧相联。因此，双方的一致能带来成功的婚姻，而仅靠机遇和浪漫爱情是不会有幸福婚姻的。（弗克，1975）

研究设计

本项研究的资料是从全国各地报刊杂志上的征婚广告中选出的 300 人，男女各 150 人。具体地说，样本是用随机数码表从一本全国范围的征婚名册（共 1000 人，男女各 500 人）中随机抽取的。因此可以说，这个样本虽然还不能在严格的统计学意义上推论全国，但大致反映了全国征婚广告的现状。

输入计算机（使用 DBASE III）的数据共计 50 个变量，其中 25 个是征婚者对自身状况（条件）的描述，如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婚姻状况和经历，以及身高、容貌、性格、收入等等；另外 25 个是征婚者对配偶提出的要求。

数据分析采用 SPSS/PC 统计软件，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各项变量的基本描述，即百分比的描述，以展示征婚者自身的基本情况，他们对自己的描述和他们对配偶的要求；第二部分是对主要自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s，包括性别、教育程度和户口状态）与各依变量（dependent variables）相关关系的检定，采用卡方检定法（ χ^2 ）；第三部分是在第二部分数据分析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筛选，采用对数线性回归方法（log-linear analysis）对变量作定量的分析，以确切了解主要变量间的相关程度。由于使用对数线性回归方法分析社会科学中大量存在的定类定序变量只是近十几年发展起来的新方法，对于如何解释对数线性回归分析给出的参数值至今仍在热烈的讨论中。本项研究采用阿尔巴（Alba）和朗（Long）的方法，首先将对数参数值还原为真数，用这些数值与几何平均值作比较，进而将同一变量中不同取值的影响加以比较，以获得有意义的解释。

研究结果

第一部分

1. 征婚者的基本特征

(1) 年龄：从样本看，征婚者中最年轻的是 20 岁，最老的是 71 岁。25 岁以下的占 29.0%，26 岁至 30 岁的占 27.0%，31 岁至 35 岁的占 22.3%，36 岁至 40 岁的占 9.7%，41 岁以上的占 12.0%。

(2) 教育程度：样本中大学以上教育程度（包括本科肄业、毕业、研究生）的占 26.9%，中学教育程度（包括高中、初中、中专、中技）的占 35.7%，小学教育程度的占 16.7%，文盲占 1.7%。此外，有 19% 的人没有提到自己的教育程度。

(3) 职业：样本中干部占 13.3%，知识分子占 24.0%，国营工人占 33.0%，集体职工、临时工、合同工占 3.0%，乡镇企业职工、民办教师占 8.0%，农村专业户占 4.7%，一般农民占 3.7%，军人占 2.7%，个体户、待业青年占 2.3%。样本中有 5.3% 的人没有提到自己的职业。

(4) 户口状态：样本中城市人口占 78.3%，农村人口占 19.3%，军人占 2.4%。

(5) 婚姻状况及经历：样本中 51.7% 的人声明至今尚未结过婚，20.6% 的人曾结过婚，目前丧偶或离异，有 27.7% 的人没有提到自己的婚姻状况及经历。

2. 征婚者对自身状况的描述

从征婚者对自身状况的描述可以看出人们在择偶时看重自身的哪些素质，以为自己在哪些方面值得配偶予以注意（或是值得骄傲的对己有利的“条件”，或是对己不利但应当让对方有所了解的情况），因而也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反映出人们在择偶过程中最看重的因素。

除去全部征婚者都提到的性别和年龄以外，其他按样本成员描述自身情况时提到某一因素的频率顺序排列如下：

（1）有 94.7% 的征婚者提到了自己的职业，只有 5.3% 的人没有提到自己的职业。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国，一个人的职业是其社会地位的主要标志，以致人们在把自己展现给对象时将它摆在极重要的位置，而那种如在印度社会中人属于哪一等级（种姓）或在西方发达国家中人的财产或在种族纷杂的社会中人的种族等因素的重要性在中国都是不显著的。

（2）其次重要的是身高：样本中有 92.3% 的人提到了自己的身高，只有 7.7% 的征婚者没有提到这一点。这个现象在世界各国的征婚广告中是绝无仅有的，十分有趣。联想到中国的一些俗话，如“一高遮百丑”以及有一段时间甚为流行的关于男子在 1 米 75 以下就是“二等残废”、1 米 70 以下是“一等残废”等谚语，可以印证中国人在择偶时对身高的特别关注。虽然我们尚难以确定这种关注的确切原因（是因为男子高大才显得有男子气概？——这是一种对健美、性感的较高层次的追求；还是因为在勉强温饱的国度身材高大是营养较好因而身体强健的标志？——这则是较低层次的追求了），但人们不约而同地将身高摆在如此重要的地位加以介绍这一点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3) 征婚人在自我介绍时摆在第三位的是教育程度。样本中有 81.0% 的人提到自己的教育程度。在中国，教育程度的高低虽然与职业密切相关，但与收入的多少却不甚相关或很不相关。近年暴露出来的收入“脑体倒挂”（知识分子有时甚至不如普通工人、服务行业职工收入高，更比不上个体户），更使这种关系变为负相关，从而使教育程度的重要性相应降低。然而人们在择偶时仍把教育程度放在重要地位。可以想到的原因是，中国人往往不仅把教育程度同谋生手段相联系，而且把它视同为教养程度。

(4) 征婚人在自我介绍时摆在第四位的是容貌，有 73.3% 的人提到自己的容貌，女性多用“秀丽”“端庄”“清秀”“端正”“白皙”“俊秀”等词汇，男性则多用“五官端正”“英俊”等。

(5) 征婚人提到自己婚姻状况的占 72.3%，占第五位。样本中有 51.7% 的人提到自己从未结过婚，20.6% 的人提到有婚史，其中有人强调只有“短暂婚史”。由此看来人们对初婚再婚还是相当关注的，这也是在跨文化比较中较为突出的中国特色。

(6) 征婚人提到自己性格品德的占 69.0%，比例也相当大。使用的词汇主要有：质朴稳重、勤勉谦和、温柔娴静、热情真诚、正直善良、开朗活泼、老实正派等等。

(7) 征婚人介绍自身情况时，第七个注重的因素是健康，样本中 52.3% 的人提到自己身体健康。

(8) 有 30.7% 的征婚人提到自己的爱好，其中包括爱好文学艺术、音乐美术、摄影书法等，也有许多人只笼统地说“爱好广泛”或“兴趣广泛”。

(9) 36.7% 的征婚人提到自己的收入。这个比例是不太高

的，可能的原因是，在中国，人们的基本工资较平均且固定，一旦说出职业，对方基本上可以估计出其收入，只有个体户和专业户这一群收入高低差别大的人才有必要加以特别说明。

(10) 样本中有 17.7% 的人提出自己的家庭背景，除了有极少数出身于干部和知识分子家庭的人提到自己的家庭出身之外，多数人是说明“无负担”、“孤身一人生活”或提到自己与母亲一起生活等等。看来有无家庭负担也是人们择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

(11) 征婚者中有 16.7% 的人提到自己有住房。这种情况在跨文化研究中也较少见。可见住房在中国人的择偶标准中有非同寻常的分量。在世界多数国家中，人们根据财力不同会享有极为悬殊的住房条件，但很少有如我国由于住房几乎完全由单位分配因而有钱也租（买）不到的。因此，在征婚广告中提到自己住房条件的人往往并不说自己住房的好坏，而只是说“有住房”，这就足以增加其吸引力了。

(12) 有 14.3% 的征婚者提到自己有事业心。

在以上征婚者介绍自身的主要条件之外，还有一些不及 10% 的因素，如 6.7% 的人提到自己有某种技术专长；6.7% 的人提到自己身有残疾；6.0% 的人提到感情的因素，所有用词汇多为“重感情”、“感情丰富”等；6.0% 的人提到自己的身材（“苗条”）；5.0% 的人提到自己没有不良嗜好（“不嗜烟酒”）；4.7% 的人（男性）提出如对方条件好愿去女家居住（这一条件的提出证明中国男性认为愿去女家入赘是对女方做出的重大让步，可以吸引对方）；2.7% 的人提出自己善理家务；2.3% 的人提出家有全套家具或家用电器；2.3% 的人承认自己是党员（这一因素的重要性比起怀特与帕瑞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中国人择偶标准的研究所得到的数据是大大降低

了); 2.0% 的人申明自己所属的民族, 其中多为回族人。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 申明自己民族为回族的征婚者全部要求配偶也是回族人, 而其他提到自己所属民族的人并没有要求对方与自己同族。

3. 征婚者对配偶提出的要求

从征婚人对配偶提出的要求可以更加直截了当地看到中国人择偶标准中的各种因素是如何排列的。

(1) 样本中征婚人对对方提出的头等重要的条件是年龄, 有 78.3% 的人提出了具体的年龄要求, 当然也有人只简略地要求“年龄相仿”。

(2) 择偶标准中第二重要的是性格品德, 有 76.3% 的人提到要求对方要通情达理、豁达开朗、诚实正派、温柔善良、气质好等等。

(3) 择偶标准中占第三位的是身高。与上节征婚者介绍自己时一样, 身高在向对方提出的要求中也占了很不寻常的位置。样本中有 54.3% 的人提出身高要求。许多人采用了“年龄在 $\times \times$ 岁以下, 身高在 $\times \times$ 米以上”这一句式。

(4) 在择偶标准中占第四位的是婚姻状况和经历。有 30.0% 的人要求对方必须从未结过婚, 24.0% 的人声明可以接受有婚史的人。对婚姻状况提出了要求的总共占样本的 54.0%。

(5) 择偶标准中占第五位的是教育程度。样本中有 44.3% 的人对对方的教育程度有要求。

(6) 择偶标准中按其重要性应列为第六位的是容貌——41.0% 的征婚者提出容貌要求。

(7) 第七位是健康——39.0% 的征婚者提出这一要求。

(8) 第八位是职业——36.7%的人提出职业要求。许多人要求对方的具体职业为国家正式职工、干部等，有些提出对方最好从事医务工作、教学工作等，但许多男性对女性的职业要求仅仅是“有工作”或“有正式工作”。

(9) 第九位是地区要求。样本中有 23.7%的人对对方的居住地有具体要求，如北京、上海、天津、武汉等大中城市的征婚者往往提出要求对方在本市居住，也有少数人指定了一定居住范围，如某省的北部或某个更小的范围

(10) 有 21.7%的人要求对方事业心强，办事能力强等。

(11) 有 14.0%的人对对方提出感情要求，多数只是写“重感情”，虽然也有直书希望对方“能够爱我”的，但只是极少数。

(12) 样本中有 13.0%的人向对方提出户口要求：有 7.3%提出希望对方是城市户口，有 5.7%的人提出对方可以是农村户口。

此外还有一些属于少数人的要求，如有 4.7%的人要求对方有一技之长；4.0%的人要求对方善理家务；3.0%的人要求对方无家庭负担（无老人或幼子需要抚养）；2.7%的人要求对方身材好等等。

第二部分

用卡方检定法检定三个主要自变量与依变量之间的关系，原假设是自变量与依变量之间没有相关关系，显著程度 .05。以下分别叙述检定结果：

1. 性别

(1) 性别与征婚人是否提到自己的身材这一变量相关

($X^2=9.99$, $DF=1$, $P=.0016$) , 其中女性提到自己身材的频率超过期望值, 二变量不相关的假设被否定。

(2) 性别与征婚人是否提到自己收入相关 ($X^2=54.8$, $DF=1$, $P=.0000$ ^①) , 其中男性提到自己收入的频率大大超过期望值, 二变量不相关的假设被否定。

(3) 性别与征婚人是否提到自己身体健康相关 ($X^2=21.4$, $DF=1$, $P=.0006$) , 其中男性提到自己健康的频率超过期望值。

(4) 性别与征婚人是否提到自己有住房相关 ($X^2=20.2$, $DF=1$, $P=.0000$) , 男性提到自己有住房的频率高于期望值。

(5) 性别与征婚人是否提到自己家庭状况、负担情况相关 ($X^2=9.2$, $DF=1$, $P=.0025$) , 男性提到自己家庭状况、有无负担的频率高于期望值。

(6) 性别与征婚人是否提到自己性格特征相关 ($X^2=12.2$, $DF=1$, $P=.0005$) , 女性提到自己性格特征的频率高于期望值。

(7) 性别与征婚人是否向对方提出身高要求相关 ($X^2=21.5$, $DF=1$, $P=.0000$) , 女性征婚者对男方提出身高要求的频率高于期望值。

(8) 性别与征婚者是否向对方提出教育程度要求相关 ($X^2=33.8$, $DF=1$, $P=.0000$) , 女性对男方提出教育程度要求的频率高于期望值。

(9) 性别与征婚者是否提到职业要求相关 ($X^2=17.6$, $DF=1$, $P=.0000$) , 女性对男方提出职业要求的频率高于期望值。

① 计算机分析所显示的结果, 表示其数值小到可不计。下同。

(10) 性别与征婚者是否提出户口要求相关 ($\chi^2 = 18.6$, $DF=1$, $P=.0000$)，男性要求对方是农村女性的频率高于期望值，女性要求对方是农村户口者一例也无，大大低于期望值。

(11) 性别与征婚者是否提出事业心要求相关 ($\chi^2 = 45.3$, $DF=1$, $P=.0000$)，女性要求男性事业心强的频率远远高于期望值。

(12) 性别与征婚者是否提出理家能力相关 ($\chi^2 = 10.5$, $DF=1$, $P=.0012$)，男性要求女性善于操持家务的频率高于期望值。11 与 12 两项明确勾勒出中国人的性角色期望：男子要有事业心，女子应善持家务。

在卡方检定中发现性别与下列因素无关，因而不能推翻二变量不相关的原假设：性别与征婚人是否提到自己的婚姻状况及经历无关，换言之，在是否介绍自己婚姻状况这一点上男女没有显著差别。性别与征婚人是否提到自己的容貌只有极微弱的相关性，其中女性提到自己容貌的略微高于期望值。一般印象中男性应远比女性更注重对方的容貌，但从国人的征婚广告看，这一差别并不明显。

2. 教育程度

教育程度与征婚者是否介绍自己容貌、家庭状况及负担、性格以及是否提到自己重感情有显著的相关关系。教育程度还与征婚者是否对对方提出年龄要求、教育程度要求、婚姻状态要求、户口要求以及善持家务的要求相关。

3. 户口

户口状态（分城市、农村和军队三种）与征婚人是否介绍

自己的婚姻状况、收入、以及是否提到自己有住房相关。户口状态还与征婚人是否向对方提出居住地区要求、身高要求、教育程度要求、职业要求和户口要求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第三部分

在这一部分，数据分析进入更复杂精细的阶段。在卡方检定中显示出最多相关性的一些变量被选出来作进一步的分析，即使用 SPSS/PC 统计软件所作的对数线性回归分析。

1. 关于征婚者是否介绍自己婚姻状况的分析

在对性别、教育程度、户口与征婚人是否介绍了自身婚姻状况这四个变量的分析中，首先规定：

性别 S (男 $i=1$, 女 $i=2$)

教育程度 E (大学 $j=0$, 其他 $j=1$)

户口状态 R (城市 $k=0$, 其他 $k=1$)

依变量为征婚者未提与提及自身婚姻状况 (M) 之比 (odds)

由于对数线性回归筛选出来的最佳模型^① 是

SRM, ER, SE

按变量产生的时间顺序及本项研究的目的，定未提与提及自身婚姻状况之比为依变量，性别、教育程度和户口状态为自变量。略去与依变量无关的因素（经运算筛除教育程度的影响），只余性别和户口状态的影响，得到：

^① 有关公式参见附录。

$$\begin{aligned}
 S_i & \begin{cases} \omega_1 = .098 & (1.10)^{\text{①}} \\ \omega_2 = -.098 & (0.91) \end{cases} \\
 R_k & \begin{cases} \omega_1 = .576 & (1.78) \\ \omega_2 = -.576 & (0.56) \end{cases} \\
 S_i R_k & \begin{cases} \omega_{11} = -.214 \\ \omega_{12} = .214 \\ \omega_{21} = .214 \\ \omega_{22} = -.214 \end{cases}
 \end{aligned}$$

上述参数值首先可以解释为自变量对依变量相对于几何平均值的影响。从上述参数看，男性的比值（未提与提及自身婚姻状况之比）是平均值的 1.10 倍，即一旦个案为男性，这一比值就会升高到平均值的 1.10 倍；一旦个案为女性，这一比值就会降到平均值的 .91 倍。城市户口的比值为平均值的 1.78 倍，即一旦个案为城市户口，比值就会升高到平均值的 1.78 倍；一旦个案为农村户口则降至平均值的 .56 倍。

其次，当我们对自变量的一对取值进行比较时，它对依变量的影响会变得更加明确和显而易见。通过计算得到户口状态对依变量影响中城市户口的比值与农村户口的比值之比为 3.2 (1.78/.56)，也就是说，城市户口的比值是农村户口的比值的 3.2 倍，即一旦个案为城市户口，其征婚广告中不提自身婚姻状况的机会是农村户口成员的 3.2 倍。

由于性别的影响和性别户口状态的二阶影响比较微弱，故略去不谈。

① 括号内的数值为从对数还原出来的真数

2. 关于征婚者是否介绍自己收入的分析

这一分析仍旧采用性别 (S) 教育程度 (E) 户口状态 (R) 三个自变量, 依变量是征婚者未提及提及自己收入 (I) 之比。

对数线性回归分析筛选出来的最佳模型是

SRI, ER, SE, EI

得到的参数值是:

$$\begin{aligned} S_i & \begin{cases} \omega_1 = -.87 & (.42) \\ \omega_2 = .87 & (2.39) \end{cases} \\ E_j & \begin{cases} \omega_1 = -.12 & (.89) \\ \omega_2 = .12 & (1.13) \end{cases} \\ R_k & \begin{cases} \omega_1 = .52 & (1.68) \\ \omega_2 = -.52 & (.59) \end{cases} \\ S_i R_k & \begin{cases} \omega_{11} = .16 \\ \omega_{12} = -.16 \\ \omega_{21} = -.16 \\ \omega_{22} = .16 \end{cases} \end{aligned}$$

我们仍旧首先看自变量是对依变量与几何平均值相比的影响。从上述参数得到, 男性的比值是平均值的 0.42 倍, 而女性的比值是平均值的 2.39 倍; 大学教育程度的比值是平均值的 0.89 倍, 低于大学教育的比值是平均值的 1.13 倍; 城市户口的比值是平均值的 1.68 倍, 农村户口的比值是平均值的 0.59 倍。

其次我们将自变量的不同取值对依变量的影响一一进行比较, 得到性别对依变量的影响中, 女性比值是男性比值的 5.7 倍 (2.39/.42), 也就是说, 女性在征婚广告中不提自己收入

的机会是男性的 5.7 倍。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的比值之比为 2.8 (1.68/.59)，即城市的征婚者在征婚广告中不提自己收入的机会是农村人的 2.8 倍。

教育的影响和性别户口的二阶交互影响很微弱，略去不加讨论。

3. 关于征婚者是否对对方提出教育程度要求的分析

这一分析中的自变量为性别 (S)、教育程度 (E) 和户口状态 (R)，依变量是征婚者未提与提出教育程度要求 (D) 之比。

对数线性回归分析筛选出最佳模型为：

SED, ER, SE, RD

所得参数如下：

$$\begin{aligned}
 S_i & \begin{cases} \omega_1 = .47 & (1.60) \\ \omega_2 = -.47 & (.63) \end{cases} \\
 E_j & \begin{cases} \omega_1 = -.53 & (.59) \\ \omega_2 = .53 & (1.70) \end{cases} \\
 R_k & \begin{cases} \omega_1 = -.39 & (.68) \\ \omega_2 = .39 & (1.48) \end{cases} \\
 S_i E_j & \begin{cases} \omega_{11} = -.040 & (0.67) \\ \omega_{12} = 0.40 & (1.49) \\ \omega_{21} = 0.40 & (1.49) \\ \omega_{22} = -.40 & (0.67) \end{cases}
 \end{aligned}$$

自变量性别对依变量的影响中，男性的比值是平均值的 1.60 倍；自变量教育程度对依变量的影响中，大学教育程度的比值是平均值的 0.59 倍；自变量户口状态的影响中，城市的比值是平均值的 0.68 倍。

男性与女性的比值之比是 2.5，即男性在征婚广告中不向对方提出教育程度要求的机会是女性的 2.5 倍。低于大学教育程度的比值与大学程度比值之比是 2.9，即低于大学程度的征婚者在征婚广告中不向对方提出教育要求的机会是大学以上教育程度征婚者的 2.9 倍。农村户口与城市户口的比值之比是 2.2，即农村人在征婚广告中不提教育程度要求的机会是城市征婚者的 2.2 倍。

二阶的影响在这一分析中也很强烈。对它的解释是，在同一户口状态中，大学教育程度与低于大学程度的区别对依变量的影响是男女区别对其影响的 2.2 倍（ $1.49/0.67$ ）。

结论

从目前我国征婚广告看，综合了征婚者对自身情况的介绍和对配偶提出的要求，择偶标准中最受重视的因素依次为：（1）年龄；（2）身高；（3）教育程度；（4）性格；（5）职业；（6）婚姻状况与经历；（7）容貌；（8）健康。

在社会各类人群的不同属性对择偶标准的影响中，性别的影响仍然存在且相当重要。男性更注重收入和户口状态，女性则更注重性格、身高和教育程度。这种区别可以解释为男性在择偶过程中比较倾向于实际，而女性则较男性更多浪漫情调，因为性格、身高和教育程度这些因素更偏重于人本身，而收入户口一类则关系到实际的家庭生活。一个重要的线索可能对男女间的这种差别做出进一步的解释，即在全部征婚者中，女性的教育程度和职业明显高于男性（性别与教育程度的相关关系 $X^2 = 23.9$, $DF = 4$, $P = .0001$ ，女性明显高于男性；性别与职业的相关关系 $X^2 = 30.3$, $DF = 9$, $P = .0004$ ，也是女性明显

高于男性)。因此,在承认女性本身更加“浪漫”、男性更加“实际”这一外在事实之外,还必须注意到或许是全国女性征婚者的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普遍偏高,使女性显得比教育程度、职业地位普遍偏低的男低征婚者更加富于浪漫情调。

从户口状态对择偶标准的影响看,城市征婚者更注重教育程度,而农村征婚者更强调婚姻状况和收入,据此可以得出农村征婚者比城市征婚者更加“实际”的结论。教育程度对择偶标准的影响与台湾林教授的调查结论相似,教育程度高的人对配偶的教育程度要求也高。

如果我们作一个粗略的跨文化比较(即与文献综述一节提到的那些研究相比较)则会发现,为中国人看重而为生活在其他文化中的人所不太看重的择偶标准有年龄、身高和婚姻状况三项。国外有些学者正在对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男性极其看重“年轻”这一现象作研究。“年轻漂亮”常常是形容有吸引力的女性时并列出现的两个主要褒词。中国人在择偶时注重年龄的原因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同样,如第四节提到的对中国人择偶时特别注重身高的现象也有种种可能的解释,有待进一步研究。中国人的注重婚姻状况与经历也是很有特色的现象,无论是在征婚时提出自己从未结过婚还是要求对方没有婚史,无论是在征婚广告中承认自己曾有过结婚经历还是允许对方可以有婚姻经历,对这一条件加以申明这件事本身至少说明人们把配偶是否为初婚看得相当重要。这与传统文化强调从一而终以及一般价值取向强调白头偕老不无关系,隐隐地还可以嗅出“处女膜崇拜”的味道。

其他文化中人看重而中国人不太看重的择偶标准则有宗教、民族、感情(爱情)等几项。中国人的无宗教信仰(或泛神论)和汉族占全人口的92%这一事实解释了在宗教和民族

标准上的文化差别。至于说到感情问题，那就不是这项研究所能包容的了。是中国人羞于公开表达感情方面的要求，还是中国人就是比其他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中人较少浪漫气质呢？我准备在本书第三篇关于浪漫爱情的专题研究中再去讨论这个问题。

附录：对数线性回归的有关公式

在 \log_e 模型中，odds 之自然对数为依变量，自变量称为因子，

以 i, j, k 等记号表示因子水平：

$$\Omega_{ijk} = \log(\text{odds}) = \log(F_{ijk1} F_{ijk2})$$

并以 ω 分别表示各因子对 Ω 之主要作用与交互影响：

$$\Omega_{ijk} = \omega + \omega_i + \omega_j + \omega_k + \omega_{ij} + \omega_{jk} + \omega_{ik} + \omega_{ijk}$$

上述公式系从 \log -linear 模型公式推衍而来：

$$L_{ijk} = \log F_{ijk}$$

$$L_{ijk} = \mu + \mu_i + \mu_j + \mu_k + \mu_{ij} + \mu_{jk} + \mu_{ik} + \mu_{ijk}$$

详细推导过程参见福克斯 (Fox, J.) 《线性统计模型及有关方法》一书。

参考书目：

- ① 阿尔巴 (Alba, R.D.)：《对数线性模型之参数解释》，《社会学方法与研究》，第 16 卷，1987 年第 1 期，第 47—77 页。
- ② 伯哈格瓦 (Bhargava, G.)：《职业内婚制：印度医科学生的择偶标准》，《社会科学及医学》，1983 年总 17 期，第 413—417 页。
- ③ 伯林纳德 (Brainard, M.)：《游牧民族的择偶结构》，《人类生物学》，1982 年总 54 期，第 469—475 页。
- ④ 詹伯斯 (Chambers, V.) 等：《相貌相似：关于择偶过程

中相貌相似因素的研究》，《社会生物学》，1983 年总 30 期，第 151—157 页。

科 洛 斯 (Crooss, L.J.): 《与同类结婚，当代宗教因素在大学生择偶中的重要性》，提交给北中部社会学年会的论文，1981 年。

- ⑥ 科维坦诺维克 (Cvetanovic, M.): 《对个人条件的内容分析》，《社会学》，1973 年总 7 期，第 115—118 页。
- ⑦ 弗克 (Falk, G.): 《择偶在美国》，《国际行为学者》，1975 年总 7 期，第 68—80 页。
- ⑧ 费德曼 (Feldman, J. 筹): 《相似性的社会分层》，《质量与数量》，1975 年总 9 期，第 283—316 页。
- ⑨ 费舍 (Fisher, W.A.): 《苏联婚姻市场》，普雷格出版社，1980 年。
- ⑩ 福克斯 (Fox, J.): 《线性统计模型及有关方法》，约翰威利出版社，1984 年。
- ⑪ 格洛弗 (Grover, K.J.) 等: 《择偶过程与婚姻满意度》，《家庭关系》，1985 年总 34 期，第 383—386 页。
- ⑫ 汉森 (Hansen, S.L.) 等: 《性角色态度与青年的约会择偶》，《青少年》，1980 年总 15 期，第 83—90 页。
- ⑬ 霍依特 (Hoyt, L.L.) 等: 《个性在大学生择偶中的重要性》，《社会行为与个性》，1981 年总 9，第 93—96 页。
- ⑭ 兆提 (Jyoti, S.K.): 《锡克人的婚姻实践》，蒂普出版社，1983 年。
- ⑮ 林 (Lin, R.I.): 《台湾人择偶中教育因素的影响，1966—1972 年》，《台湾大学社会学杂志》，1977 年总 12 期，第 117—125 页。
- ⑯ 朗 (Long, J.S.): 《对数线性模型的功能》，《社会学方法与研究》，1983 年总 12 期，第 399—432 页。
- ⑰ 麦尔顿 (Melton, W.) 等: 《黑人大学生与白人大学生择偶的物质精神价值观》，《婚姻与家庭杂志》，1976 年总 38

期,第 509—517 页。

- ⑬ 麦尔维尔 (Melville, K.) :《当今婚姻与家庭》 兰德姆出版社, 1977 年。
- ⑭ 摩斯坦 (Murstein, B.I.) :《谁会跟谁结婚? 婚姻选择的理论与研究》 斯普林格出版社, 1976 年。
- ⑮ 贝瑞斯 (Peres, Y) 等:《求偶过程中的自我表现:对以色列征婚广告所作的内容分析》,《家庭比较研究杂志》, 1986 年总 17 期,第 19—31 页。
- ⑯ 辛格 (Singh, H.A.) :《对国外印度人征婚广告所作的内容分析》,《印度人》, 1977 年总 57 期,第 69—74 页。

第二篇 青春期恋爱

引言

某些常出现于报章杂志的用语并不科学，例如“早恋”。这一用语不但含有贬义价值评价，而且定义不明。顾名思义，早恋就是过早的恋爱。但是何谓“早”？目前一般是指中学时期，有时甚至包括大学。西方社会学研究将十二三岁到 19 岁的青少年的恋爱行为称为青春期恋爱。相比之下，这一用语既给出了明确的时间定义，又未加道德评价。在研究现象时不加道德评价是一切科学研究的基本守则。尽管由于科学家也是社会的人而很难完全做到这一点，愿望至少是应该有的。

关于青春期恋爱的研究在国内已有一些，但对这一问题所做的严格社会学意义上的研究并不多。这项研究将包括下列七个方面：第一，年龄。青春期恋爱开始的年龄，人们观念上理想的恋爱年龄以及影响到人们在这一问题上的想法和做法的因素，如人们的家庭背景、性别及所处的不同年龄组的影响等。第二，动机。青春期恋爱都有哪些动机？主要动机有哪些，次要动机又有哪些？这些动机是否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第三，择友标准。当然，所谓“友”是男友女友的“友”，不是指一

般朋友。但如用“择偶”恐怕与成年人的择偶难以区别。择友标准中既包括个人标准，如性格、相貌等等，也包括社会标准，如家庭背景、经济状况等。第四，途径。指男女双方通过何种途径结识对方，以及男女青年中哪方更加主动接近对方等等。第五，恋爱内容，包括约会次数、地点、活动等。第六，青春期恋爱的后果，例如它对当事人学习成绩的影响，对当事人在同学中地位的影响等。第七，对青春期恋爱所持态度及措施。

鉴于中国的社会传统及教育领域一般对青春期恋爱所持的审慎态度，我们没有像外国同行常做的那样直接询问调查对象的行为，而是将调查分为态度（对这一现象的看法）和经历两个部分，这样，即使研究对象出于各种考虑不能提供关于自己行为的真实情况，我们至少还能得到他们对这一问题所持的态度；即使这种态度受到周围环境或社会规范的压力而不完全是答问者本人的真实态度，我们至少还能得到他们心目中社会规范对这类行为的规定。

文献综述

沙学汉教授的《台湾求偶方式研究》（1974）一书中有整整一章讨论青少年恋爱方式。他是在台北使用人类学方法做的这项研究。沙教授在文中特意谈到 dating 一词在美国与在台湾地区的不同含义：在美国，社会学家们给 dating 下的定义包括五种功能：（1）一种娱乐形式；（2）一种社会化形式；（3）个人需要的满足；（4）取得某种地位或身份的手段；（5）求偶的手段。沙教授认为，在台湾地区，所谓 dating 只有最后一种即第五种功能，它远比纯粹娱乐的性质严重（第 16 页）。在关于

青春期恋爱的一章中他论及下列问题：有哪些人在恋爱，他们从何时开始谈恋爱，恋爱包括哪些内容，恋爱双方的关系等等。

还有一本研究青春期恋爱的专著是斯维霍克（Sweehock, S.）等人合写的《新加坡青年》。书中除了对青春期恋爱的个人标准、社会标准、约会频率、约会模式以及确定关系的模式的研究之外，还研究了影响上述现象的因素，如年龄、国籍、宗教、教育程度、就业状况、职业、收入、家长的职业、家庭规模、家庭结构等，其中有些因素在新加坡具有独特的意义，如种族、母语、宗教信仰等。这项研究采用了十分规整的社会学调查方式、随机抽样、填写问卷等等，值得借鉴。

斯克华兹和默顿（Schwartz, G. & Merten, O.）在《爱情与义务》一书中的第三章研究了恋爱的社会动力学。他们发现，美国的男女少年从 12 至 13 岁起相互发生兴趣（在此之前没有感觉），青春期恋爱是成年期恋爱与婚姻的第一步。他们在研究中发现，青春期恋爱在女孩子心目中比在男孩子心目中占据了更重要的地位。女孩子的名誉地位与其“恋爱纪录”紧密相连并成正比，即如果一个女孩子有许多男孩子追求，她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就会上升；如果一个女孩只有很“没份儿”的男生或根本没有男生来喜欢她，就会大跌身价。青春期恋爱的内容一般只包括一起出席晚会、吃午饭，以及拥抱接吻等等，并不发生性关系。中国的情况与美国显然不同。除社会历史传统的不喜言性爱及男女授受不亲等戒条的影响外，还有生理差异。据研究，西方青年青春期的到临（男孩变声，女孩经期）比东方要早些。这些差异在研究中应给予特别注意，或许会成为在中国的研究中最有趣的发现。

多恩巴克（Dornbusch, S.M.）等人在一项关于黑人青少

年青春期恋爱的研究中观察了不同种族的家长对子女恋爱的控制方式。他们发现，年龄规范在黑人青少年尤其是女青年中十分重要。由于家长的严格控制，形成了黑人女青年开始恋爱时间普遍偏晚的模式。这种控制与对其他种类的越轨行为的控制密切相关，形成了一种副文化。可能的解释是，黑人家长用严厉控制的手段对抗威胁其子女身心健康的环境。在我的研究中，也应注意影响年龄规范的各种因素，如性别、家庭背景及其他个人因素。（多恩巴克，1984）

杰克逊（Jackson, D.W.）在《青春期》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专门探讨青少年恋爱的动机。他发现，为了与异性交往的动机在女青年中占 58%，男青年中占 35%；为了交个朋友的在女青年中占 7%，男青年中占 9%；为了摆脱父母的在男青年中占 10%，为了更好地了解另一个人的在男青年中占 9%，女青年中占 6%。研究还了解了青少年谈恋爱的场所，其中回答“没有地方可去”的在男生中占 73%，女生中占 43%。恋爱动机及场所均是我的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可通过比较发现其中的异同。（杰克逊，1975）

柯林斯（Colins, J.K.）的研究发现，青春期恋爱的一般模式是男孩采取主动，首先亲近女孩，但当双方产生感情后，女孩的热情程度迅速接近男孩。男女双方都是按照各自伙伴群的期望来掌握亲密程度的，因此男女青少年的恋爱关系往往并不过分亲密，否则就会同各人所在的伙伴群的期望发生矛盾。（柯林斯，1974）

麦可伯（Mocaber, M.P.）在一篇题为“青春期恋爱理论的形成”的论文中试图创造一套关于青春期恋爱的完整理论，并对影响此现象的种种因素加以研究。文章追溯了上世纪至今恋爱模式的变迁及青春期恋爱关系的沿革，将青春期恋爱的内

容归纳为两大类，一是性，二是感情，并认为对青春期恋爱的变迁影响最大的领域有三个，首先是物质和社会上的变化，其次是社会舆论压力的变化，最后是这些变化的个人意义及个人反应。（麦可伯，1984）

研究设计

研究采用了定性与定量两种方法。首先，在设计问卷之前，我访问了十几位中学教师和干部，他们当中有学校政教处主任和校团委书记，有年级组长，也有普通教师。提问依据一个比较松散宽泛的提纲，其中包括学生中青春期恋爱的年龄、动机、择友标准、途径、恋爱内容、后果及学校的措施等七个方面的内容。这些访谈使我得到对青春期恋爱现状的初步了解，人们关注的问题及看法，采取的措施等等，不但为问卷的设计提供了基础，而且得到不少生动的事例，使对这一现象的研究显得更加吸引人。

研究的第二步采用定量的方法，样本容量为 722 人，选自北京海淀区的三所中学。这三所中学一所是市重点中学（北大附中），一所是取分中等的中学（北大二附中），还有一所是取分下等的中学（海淀二中，所谓“收底”中学，即别校不收的考分太低的学生它全部收下来，这所学校的高中部是职业高中，有投递、金融等专业）。如此抽样的目的在于使样本尽量能反映不同程度的学生的情况。在每所学校中用随机原则在每个年级中各抽一班，以期得到不同年龄的学生的情况。问卷的填写采取访员到课堂散发，请调查对象自填，填毕收回的方法，回收率几乎达到百分之百（除了有个别没来上课的学生及极个别拒绝填写的学生）。由于样本不是随机抽样，研究在推

论上存在着严重的先天不足，至少目前已可看出的偏差有调查对象中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的比重过大，这与海淀区高校过于集中有关。

输入计算机的数据共计 95 个变量，其中 19 个是自变量，如年龄、性别、父亲教育程度、本人志向等；其余为依变量。数据分析采用 SPSSPC 统计软件，分为两个步骤：（1）计算各个变量的基本百分比及某些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以便对调查数据作基本的描述；（2）采用卡方检定法（ X^2 ）对 12 个主要自变量与全部依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检定自变量与依变量二者不相关的假设，显著程度规定为 .05。在检定结果的显著程度低于 .05 时，二者相互独立的假设被接受；反之，假设被否定，自变量与依变量被判定为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关系。随后，通过变量频数分布依据研究假设做出有意义的解释。

研究结果及讨论

样本中承认结交过异性朋友的学生占 28.8%。这一比例与实际情况的符合程度至少受到三种未知因素的影响：第一，由于教师和家长一般对青春期恋爱持审慎或公开的否定态度，调查对象有可能隐瞒自己的真实情况，否认自己的有关经历，这就会导致承认谈过恋爱的人数低于实际数字。第二，由于青春期恋爱与一般男女同学之间产生好感和亲近难以区别的十分清楚，有些人会将结交一般的异性朋友当做恋爱经历看待，这就会导致承认谈过恋爱的人数上升。第三，还有人纯粹出于幽默感愿意说自己是有过此种经历的，就像有些女人无中生有地指控某人曾强奸过自己而实际上是一种自恋和自我夸大的行为

那样（这一比喻也许并不十分恰当）。这种动机也会使承认结交过异性朋友的人数增加。如果我们考虑到第一种情况同第二、三种情况部分地两相抵消的可能性，28.8%这个比例或许是比较接近于实际情况的。根据对中学教师的访问，一位高一年级主任做过大略估计，在一个30多人的班里，男生有五六个、女生有六七个谈过恋爱，差不多占到全班的三分之一。这一估计与问卷调查结果相仿。

在对自变量与依变量相关关系的卡方检定中，首先假定二者是不相关的，显著程度规定为.05。检定发现与是否结交过异性朋友这一依变量相关的因素有：

（1）性别（ $P=.0089$ ）。从原始数据看，男生当中有过恋爱经历的超过期望值，女生则低于期望值。（2）与父亲关系（ $P=.0078$ ）。与父亲关系不好者中有过恋爱经历的超过期望值，与父亲关系好的低于期望值。（3）年龄（ $P=.0082$ ）。初中生恋爱的超过期望值，高中生低于期望值。

1. 关于青春期恋爱的年龄

在回答“你认为女生什么年龄开始结交异性朋友比较合适”这一问题时，半数以上（54.8%）的人们看法集中在17岁至20岁之间，选择16岁以下的占20.3%，21岁以上的占24.9%。平均值是18.72岁，标准差为2.79。对男生谈恋爱理想年龄的看法比女生略晚，集中在18岁以上，17岁以前的只占24.7%，平均值是19.19岁，标准差为2.91。在承认谈过恋爱的208人中，38人的恋爱经历发生在12岁以下，占19.3%；13岁的35人，占17.8%；14岁的35人，占17.8%；15岁的37人，占18.8%；16岁的31人，占15.7%；17岁的17人，占8.6%；18岁的3人，占1.5%；

19 岁 1 人，占 0.5%。平均值为 14.28 岁，标准差为 1.69。

根据中学老师们的说法，青春期恋爱确实从小学就开始了。有的老师指出中小学衔接的时间是一个“漏洞”，中间有长达两个月的时间没有事干也没有学校的管束，有些学生就是在这段时间交上朋友的。初一初二的孩子才十三四岁，他们真的会谈恋爱吗？有位老师给我举了一个例子，在他的学校有两个高一的男生为了争夺一个初一的女生打了起来，这个女生不想理睬他们，可她的一位女友却看不下去了，主动提出代她写情书，并说，“人家为你都打起来了，你还不理人太不好了，我来替你写。”不少老师认为，虽然初中的孩子（13—15 岁）好奇心强，刚刚萌发的对异性的兴趣十分强烈，又不知利害轻重，因此有时显得比高中生（16—18 岁）还热烈，但那“不是爱情，而是胡闹”。到高中以后，由于懂事了，又有考大学的压力，反而有些收敛，但真正的恋爱却可能在此时发生。

表一和表二是影响青春期恋爱的理想年龄与实际年龄的各种因素：

表一表二中的 χ^2 是对自变量与依变量之间是否具有相关关系所作的卡方检定得到的数值；DF 是自由度；P 是显著程度。当 P 小于 .05 时，两变量之间不相关的假设就被否定了，也就是说，这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所谓“期望值”是指假定两变量相互独立（不相关）时应当得到的频数，因此在我们发现两变量间存在相关关系时，还可以从原始数据（频数分布）中大略看出是哪一类人在这一变量上超过了假定二者不相关的期望值。

从青春期恋爱理想年龄与实际年龄的对比中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言行相悖（理想与实际的相悖），如高中生对青春期恋爱理想年龄的看法比初中生要晚，但实际年龄早。可能的

解释有两种，一种是内心矛盾导致理想与行动的矛盾，甚至包含有些人对自己过早恋爱表示后悔的因素；另一种解释则是口是心非，即口头上希望晚但行为上早。

表一 影响青春期恋爱理想年龄的因素

	X^2	DF	P	理想年龄晚超过期望值者
性别	44.6	11	.0000	女生
年龄	30.2	11	.0015	高中生
是否团员	21.1	11	.0326	非团员
学习成绩	42.1	22	.0062	学习成绩上等等者

表二 影响青春期恋爱实际年龄的因素

	X^2	DF	P	实际年龄早超过期望值者
学校档次	36.8	14	.0023	学校档次高者
是否团员	14.3	7	.0465	非团员
个人志向	16.6	7	.0198	准备报考大学者
年龄	67.6	7	.0000	高中生

2. 关于青春期恋爱的动机

在 202 名承认谈过恋爱的学生中，三项主要动机依次为（1）在需要时有人帮助（43.3%）；（2）异性的自然吸引力（34.0%）；（3）为了更好地了解另一个人（33.0%）。较次要的动机包括“对异性的好奇心”（17.9%）；“学习如何与异性相处”（13.4%）。此外还有少数人有下列动机；“追求刺激”

(6.7%); “寻找终身伴侣”(6.2%); “享受人生”(4.6%); “表现自己能够吸引异性”(4.6%); “摆脱父母的控制”(3.1%)。

包括没有恋爱经历者在内的研究对象(722人)对青春期恋爱动机的看法与上述排列次序大同小异,只是“为了表现自己能够吸引异性”这一动机被排得靠前了(第五位)。这一变化表达了旁观者与当事人的不同观点,即当事人并不觉得有表现自己的动机,而旁观者却认为他们是在“拔份儿”,显示自己。这一点被许多老师的看法证实。他们认为,不少谈朋友的学生是为了炫耀自己,“女孩子是为了找个靠山,男孩子是为了显示自己。”找靠山也是一种炫耀,有的女生说:我认识的男生多着呢,有人敢惹我,我能叫来一帮人。有位老师用学生的话概括一些女生谈恋爱的动机是“找个厉害的主儿给撑着”。

不能否认,有些比较早熟的青少年已经有了真正的恋爱意识,如许多人在问卷上写到目的是想寻求精神寄托,寻求温暖,避免孤独,有人诉说心中的苦恼等等。但即使是这些真正具有恋爱意识的人也极少考虑到结婚或寻找终身伴侣。有位老师转述他班上一位恋爱谈得如火如荼的女学生的话,当老师问她是否打算结婚时,她否认了,说:“哪怕好三天也行,起码我被人爱过。”然而,寻找终身伴侣的动机在青春期恋爱中虽属鲜见,却也不是完全没有的,如前面统计数字表明有6.2%的人怀有此种动机。当某校一个女生的恋爱被老师劝阻时,她说:“我个子矮,将来不好找对象。”最后虽然两人抱头痛哭分了手,女孩始终对拆散他们的老师耿耿于怀。这种情形似乎确属想寻找终身伴侣的事例。

在问卷列出的十种动机中,有两种同前述所有自变量无关,换言之,它们是均匀分布的。这两种动机是“对异性的好

奇心”和“寻求帮助”。这两项恰恰是频率数最高的动机。这说明各种类型（本人各方面状况及家庭状况）的青少年在恋爱时都可能存在这两类动机。另外八种动机则受到各种因素不同程度的影响，情况如表三所示：

3. 关于青春期恋爱中的择友标准

问卷中列举了十种择友标准请研究对象排序，以 1 为最重要，10 为最不重要，得到下列结果（序号均值越小者地位越重要）。

表三 影响青春期恋爱动机的因素

	χ^2	DF	P	提到此种动机高于期望值者
1. 异性的自然吸引力				
学校档次	24.4	4	.0001	学校档次高者
年龄	8.5	1	.0035	初中生
父亲职业	11.1	3	.0111	父亲为知识分子者
父亲教育程度	6.4	1	.0113	父亲教育程度在大学以上者
是否团员	21.1	1	.0326	团员
学习成绩	9.5	2	.0185	成绩上等者
个人志向	15.6	1	.0001	准备报考大学者
2. 了解另一个人				
学校档次	19.9	4	.0005	学校档次高者
父亲教育程度	5.7	1	.070	父亲教育程度在大学以上者
是否团员	4.0	1	.0449	团员
个人志向	9.5	1	.0020	准备报考大学者

3 学习如何与异性相处

学校档次	10.3	2	.0057	学校档次高者
是否团员	5.4	1	.0206	团员

4. 寻找终身伴侣

性别	12.7	1	.0004	男生
与父亲关系	7.3	2	.0265	与父亲关系不好者

5. 摆脱父母控制

年龄	4.9	1	.0265	高中生
父亲教育程度	4.1	1	.0435	
是否团员	7.1	1	.0077	团员

6. 享受人生

学校档次	14.2	2	.0008	学校档次高者
年龄	6.6	1	.0100	初中生
是否团员	9.4	1	.0021	团员
个人志向	5.3	1	.0211	准备报考大学者

7. 寻找刺激

学校档次	7.4	2	.0241	学校档次中等者
性别	5.1	1	.0245	男生
父亲职业	9.8	3	.0203	父亲为干部者
与父亲关系	9.5	2	.0088	与父亲关系不好者

8. 表现自己能够吸引异性

学校档次	6.6	2	.0360	学校档次高者
个人志向	4.3	1	.0383	准备报考大学者

表四 择友标准排序

择友标准	序号均值	序号标准差
1. 性格	2.84	1.87
2. 共同语言	3.07	2.28
3. 相互感情	3.21	2.34
4. 容貌	3.76	2.35
5. 能力	3.80	2.10
6. 身材	5.09	2.33
7. 抱负	5.43	2.51
8. 健康	6.82	2.23
9. 家庭背景	8.32	1.28
10. 政治表现	8.41	2.82

从这一排序可以看出，研究对象不约而同地把家庭背景和政治表现放在了最不重要的地位。可能的原因有二：一是青少年认为这些标准太俗气、太实际，而青春期恋爱的特征首先是它的浪漫色彩，它与实际的考虑最是格格不入；另一方面由于青春期恋爱大多没有长远的打算，因此不必考虑到对方家庭状况这一类对成家才会有较大影响的因素。对政治表现这一标准的贬低似乎隐隐透出青少年的逆反心理，与社会上“文革”后普遍出现的政治冷淡心态不无关系。

中学教师对青春期恋爱中择友标准的看法也认为，学生们很少考虑所谓“门当户对”的问题。男孩子找朋友漂亮是第一，女孩子更注重对方的才能。当然也有班上最出色的学生互

相倾慕的情况，才能容貌的因素兼而有之。总之，青春期恋爱中的择友标准是浪漫情调多于实际考虑。

健康这一标准与诸自变量无关。其余九项标准则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表五。

表五 影响择友标准的因素

	X ²	DF	P	提到这一标准高于期望值者
1. 容貌				
年龄	15.9	1	.0001	初中生
2. 身材				
学校档次	9.2	2	.0101	学校档次低者
年龄	22.1	1	.0000	初中生
3. 性格				
学校档次	13.7	2	.0011	学校档次高者
年龄	13.6	1	.0002	初中生
父母职业	11.1	3	.0111	父母为知识分子者
是否团员	20.9	1	.0000	团员
本人志向	23.1	1	.0000	准备报考大学者
4. 才能				
学校档次	39.3	2	.0000	学校档次高者
性格	10.3	1	.0013	女生
父亲职业	21.0	3	.0001	父亲为知识分子者
父亲教育程度	8.9	1	.0029	父亲教育程度在大学以上者
与父亲关系	7.8	2	.0200	与父亲关系不好者

是否团员	20.7	1	.0000	团员
个人志向	34.1	1	.0000	准备报考大学者
5. 抱负				
学校档次	7.3	2	.0266	学校档次高者
性别	7.9	1	.0050	女生
是否团员	7.2	1	.0074	团员
学习成绩	7.5	2	.0234	成绩上等者
个人志向	15.6	1	.0001	准备报考大学者
6. 家庭状况				
学校档次	8.1	2	.0176	学校档次低者
年龄	7.6	1	.0059	初中生
父亲职业	14.8	3	.0020	父亲为工人干部者
父亲教育程度	7.6	1	.0057	父亲教育程度低于大学者
7. 政治表现				
学校档次	10.6	2	.0050	学校档次低者
父亲职业	12.5	3	.058	父亲为工人者
父亲教育程度	4.4	1	.0370	父亲教育程度低于大学者
8. 相互感情				
学校档次	11.8	2	.0028	学校档次中等者
年龄	2.7	1	.0072	高中生
父亲教育程度	6.6	1	.0101	父亲教育程度在大学以上者
是否团员	12.7	1	.0004	团员
9. 共同语言				

学校档次	24.0	2	.0000	学校档次高者
父亲教育程度	8.6	1	.0034	父亲教育程度在大学以上者
是否团员	4.7	1	.0309	团员
个人志向	10.8	1	.0010	准备报考大学者

在影响择友诸标准的卡方检定中，一个最有趣的现象是，年龄较小者提到容貌和身材标准的超过期望值。它既可能反映了年龄较小的学生还不太懂得其他择友标准的重要，也可能表明他们还不善于掩饰自己心中刚刚萌发的对异性的感觉和欲望。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也会学会中国文化中内向（不公开表露愿望）和压抑（把欲望克制下去）的特点。但他们的天真在这个岁数上（13—15岁）还在自由流露呢。如何解释生理上更成熟的高中学生反而比初中学生更注重容貌身材这两项标准？掩饰（有意识的）和压抑（无意识的）的因素昭然若揭。

4. 关于青春期恋爱的途径

在回答男女双方哪方主动较好的问题时，26.0%的人认为男方主动好，5.5%的人认为女方主动好，68.5%的人答“无所谓”。关于结识异性朋友的途径，71.7%的人认为自己认识比较好，2.3%的人认为经人介绍好，26.0%的人认为无所谓。在有恋爱经历的调查对象中，67.2%是同班同学，其余为同年级、同校同学，以及通过家庭亲友结识的。

虽然持男生主动为好这一观点的人大大超过认为女生主动为好的人，但目前青春期恋爱中的一个特点是女生主动的很多。我访问的多数老师持“女生主动多”的看法。有的老师如此概括他的观察：“女孩子先疯，男孩子受勾引。”另一位老师

将两种接近方式的利弊概括为：“女孩子找男孩一拍即合，男孩子找女孩子屡攻不克。”有些老师将这种现象归结为“国外意识”的影响，因为中国传统观念要求女孩子端庄稳重，主动去找男孩“成何体统”？其实，与其说女方主动追求男方是“国外意识”与中国意识的区别，还不如说它是现代意识与古典意识的区别。即使在西方也一向是由男方向女方求婚的，女性追求男性当是现代男女平权的结果。尽管女生追求男生的个案增多了，但在绝对数量上仍然低于男生追求女生的个案数。在对谈过恋爱的人的调查中，性别与谁主动这一变量有强烈的统计相关关系（ $X^2 = 10.6$ ， $DF = 2$ ， $P = .0050$ ），其中男生承认“我主动”的超过期望值，女生填“对方主动”者超过了期望值。

5. 关于青春期恋爱的内容

所谓青春期恋爱内容包括当事人约会的时间、地点、方式及肉体接触程度等。这些问题当然全部是由那些承认谈过恋爱的人回答的。

首先，关于约会频率和方式。样本中每天约会一次的占 4.9%，一星期三次的占 5.5%，一星期两次的占 4.3%，一星期一次的占 23.3%，一个月两次的占 11.7%，一个月一次的占 7.4%，其余 42.9% 的人说，由于是同班同学，天天可以见面，有空就聊几句，或放学一起走，无所谓专门约会。有的老师概括说，好学生谈恋爱接触不频繁，差生每天约会、互递情书。关于约会方式，只有 16.6% 的人承认约会时总是两人单独在一起；有 53.8% 的人是有时单独在一起有时有别的人；还有 29.6% 的人总是在有他人在场的情况下和自己的朋友在一起。以此推断，至少这 29.6% 的人不能算真正的恋爱，怎

能想象两个在恋爱的人总在有别人的情况下才见面，而不敢或不愿单独在一起呢？如果我们把这些人去掉，那么在研究对象中有过恋爱经历的就不再是全样本的 28.8%，而降到 16.5%。如果将天天见面聊聊天并不专门约会的人去掉，则真正谈过恋爱的人只占全样本的 13.0%。

一位老师总结学生中约会模式是“从群体到个体，从公开到隐蔽”，即互有好感的少男少女们一开始结伙出游，或去饭馆，或给某个同学过生日，而其中某个“她”是冲着某个“他”去的。发展一段时间后就成为两人单独秘密接触了。其实所谓秘密也只是瞒着老师和家长，要好的同学之间互相谁和谁好都知道。

其次，关于约会地点和内容。约会地点在公共场所的占 52.7%，在学校的占 25.3%，在自己家的占 22.5%，在对方家的占 28.0%。约会内容按频数排列，在公共场所谈话的占 45.3%，一起学习的占 37.8%，在私人场所谈话的占 33.1%，一起逛公园的占 31.3%，一起看电影的占 25.0%，一起逛商店的占 19.6%，访问对方家庭的占 18.8%，一起跳舞的占 6.8%，一起下饭馆的占 6.1%。据老师们的观察，许多学生只是在学校附近找个比较僻静的地方在一起呆一会儿，聊几句。一位老师把学生常去散步谈心的湖边小路戏称为“鸳鸯小路”。

第三，关于约会中的肉体接触。在对这方面问题做出回答的 155 名调查对象中，有 61.3% 拉过手，有 17.4% 承认拥抱过，有 15.5% 承认亲吻过，有 1.9% 承认发生过性关系。虽然其中可能有不愿承认发生过此类肉体接触的现象，但从调查可以得出结论，在我国的青春期恋爱中，各种形式的肉体接触是极为审慎的，许多只是吻吻脸颊、搂搂肩膀而已，尤其是女孩

子，羞耻心更重一些。一位老师转述她班上一个女生的话说，她的男朋友想吻她抚摸她被她拒绝了。但对有些恋爱关系公开的学生，“他们在班上搂搂抱抱，同学们也不见怪”。总之，比起西方青春期恋爱中的肉体接触程度，中国的中学生要拘谨羞涩得多。

6. 关于青春期恋爱的后果

在有过恋爱经历的青少年中，认为对学习无影响的占 65.5%，认为有坏影响的占 19.1%，好影响的占 15.4%，认为恋爱对自己在同学中威信无影响的占 82.1%，威信降低的占 9.8%，威信提高的占 8.1%。

老师们几乎众口一辞地说，青春期恋爱会使学习成绩“直线下降”，经过劝说使二人分开后学习成绩立即回升。他们不否认有双方互相促进学习成绩提高最终双双考上大学的事例，但确属少数，老师们称之为“智力有富裕”的人，意思是说他们在中学如此强大的功课压力之下还能有精力谈恋爱。至于青春期恋爱对当事人在同学中威信的影响，多数人取中立态度。这种态度已经比“文革”前中学的气氛宽松了许多，但还远非西方社会中的“正比关系（恋爱纪录越多威信越高）”。

表六 影响青春期恋爱后果的因素

	X^2	DF	P	认为“无影响”超过期望值者
1. 对学习成绩的影响				
学校档次	25.8	6	.0002	学校档次高者
性别	15.0	2	.0006	男生
父亲教育程度	15.4	2	.0005	父亲教育程度在大学以上者

本人志向	7.1	2	.0295	准备报考大学者
2. 对当事人威信的影响				
学校档次	29.1	6	.0001	学校档次高者
性别	12.7	2	.0007	男生
年龄	6.3	2	.0430	初中生
父亲职业	15.2	4	.0430	父亲为知识分子者
父亲教育程度	20.2	2	.0000	父亲教育程度在大学以上者

从表六可以看出，认为青春期恋爱不会影响学习成绩和本人威信者多为好学生，他们个人志向高，家庭的社会地位也比较高。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

7. 关于对青春期恋爱的措施及态度

关于对青春期恋爱应采取何种措施，研究对象中有 14.2% 的人认为应当严格禁止，28.0% 的人认为一经发现应立即拆开，56.2% 的人认为应当听其自然，1.6% 的人认为应以引导，对目前学校采取的措施，62.8% 的人认为合适，32.3% 的人认为过于严厉，4.9% 的人认为过于宽松。

教师对青春期恋爱多持严厉态度，一旦发现即加以劝阻，召开家长会争取家长合作，有些还建立家长联系本，由家长接子女回家。由于这一问题十分敏感，稍一不慎会引起自杀之类严重后果，所以校方处理十分谨慎，一般不作公开的记录在案的处分，甚至很少当着全班批评（用一位老师的话说，怕“烧纸引鬼”），最多只是含蓄地谈一下这个问题，一般都是班主任找学生私下谈话秘密解决。

无论主张采取严厉还是相对宽松的措施，上述做法的基本价值评价是认为青春期恋爱不是好事，应当否定。与上述观点不同的是，我在调查中发现有些教师（极少数）对青春期恋爱做出肯定价值评价。他们发现，青春期恋爱的发生使男孩子变得更努力更豪爽，使女孩子变得更善良，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这一新视角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它是对以无性甚至反性为基调的中国文化观念的大胆挑战。

对影响青春期恋爱理想措施的因素的卡方检定得到下列结果：

表七 影响青春恋爱理想措施的因素

	χ^2	DF	P	持宽容态度（听其自然） 超过期望值者
学校档次	66.3	6	.0000	学校档次高者
年龄	42.2	3	.0000	初中生
父亲职业	46.2	9	.0000	父亲为知识分子者
父亲教育程度	26.4	3	.0000	父亲教育程度在以上者
是否团员	27.1	3	.0000	团员
个人志向	17.7	3	.0005	准备报考大学者

分析结果显示，肯定的社会价值（学校好，个人志向高，家庭社会地位高等）与对青春期恋爱持宽容态度有正相关关系，这一现象是发人深省的。

结论

这项研究描述了目前青春期恋爱的基本情况并分析了影响这一现象的各种因素。根据调查对象直接认定及他们对某些问题（如约会次数、约会方式）的回答推断，有过此类经历的人在中学生中所占比例在 13.0% 至 28.8% 之间，实际发生恋爱的平均年龄为 14.28 岁，而理想的恋爱年龄男性为 19.19 岁，女性为 18.72 岁。恋爱动机以寻求帮助，异性的自然吸引力和为了更好地了解另一个人为主。择友标准以性格，共同语言、相互感情为最重要，以家庭背景和政治表现为最不重要的标准。关于结交异性朋友的途径，虽然有近三分之一的人认为男方主动较好，但近三分之二的人认为哪一方主动无所谓。在约会方式上有一半以上的伴侣有时单独在一起，有时有他人在场。约会的地点和内容以在公共场所谈话为主。肉体接触除了拉手之外，进一步的接触所占比例甚小。对于青春期恋爱的后果有半数以上的人认为对学习和个人威信没有影响，但在认为有影响的人中，认为有坏影响的超过认为有正面影响的人。对校方应采取的措施有一半以上的人认为应当听其自然，并对目前学校采取的实际措施表示满意。

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发现是，那些在我们社会的价值天平上得到肯定的因素（如学校档次高、家庭的社会地位高，父亲的教育程度高、本人志向高等等）往往同对青春期恋爱持宽容肯定的态度联在一起，而那些在价值天平上受到否定的因素则往往同对青春期恋爱的严厉、否定的态度联在一起。如果我们考虑到大多数学校和家长所表现出来的对青春期恋爱现象的基本否定态度，这种反差就更显得有趣。也就是说，尽管教育的一方（学校、家长）对青春期恋爱持否定态度，社会价值却在做

出另一种选择。可以认为，对青春期恋爱持否定态度是与社会价值的选择相悖的，因此是不明智，也注定是无效的。因为社会上某个机构（比如学校）某一群人（如教师）的好恶无论如何也不能与社会价值的选择相匹敌。尤具讽刺意义的是，这种社会价值观（要上重点中学，要考大学，要争取较高的社会地位）正是由这些机构和这群人自觉不自觉地灌输给青少年的。这种灌输越是成功，则对青春期恋爱持肯定（宽容）态度的倾向越强烈，这是从我们对影响青春期恋爱的各种因素的分析中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

研究中遇到的一个十分微妙的现象是随年龄增长而增长的反性倾向。从择友标准一节的分析中发现，年龄越小的人在择友标准中提到容貌和身材这两个标准的机会越大，年龄越大的越不提这些标准。这与一般生理过程是相悖的，因为 13 至 15 岁的孩子对身材之类还不会有明显的感觉，至少这种感觉是不应当比 16 至 18 岁的青年更强烈的。在这一现象背后我们可以感觉到年龄较大的青少年自制或自抑的努力。奥威尔那本以天才的洞察力和鬼使神差般的预言能力著称的《1984》中曾描写过一个“青年反性同盟”。正像他许多不幸而言中的预言一样，调查中观察到的反性倾向简直是他的“青年反性同盟”的证据。这种反性倾向不仅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且是近几十年独特的政治社会气氛的产物。对于各种欲望的压抑，尤其是对性欲的压抑，在中国这个环境中将传统文化固有的禁欲主义与理想主义革命者清教徒式的禁欲主义溶于一炉，塑造着社会规范、社会环境，也塑造着每一个青少年的内心世界。因篇幅所限，本文不能再深入探讨这一问题，或有社会学界同仁会有兴趣对此做专门研究。

参考书目：

- 柯林斯 (Colins, J.K.), 《青春期恋爱中的接近程度, 规范与伙伴群的期望》, 《青年与青春期杂志》1974 年总 3 期, 第 317—328 页。
- ② 多恩巴克 (Dornbusch, S.M.) 等, 《黑人家长对青春期恋爱的控制》, 《社会观点杂志》1984 年总 27 期, 第 301—323 页。
- 杰克逊 (Jackson, D.W.), 《从无恋爱经验的角色观念看青春期恋爱的意义》, 《青春期杂志》1975 年总 10 期, 第 123—126 页。
- 麦可伯 (Mocaber, M.P.), 《关于青春期恋爱理论的建立》, 《青春期杂志》1984 年总 19 期, 第 159—170 页。
- 斯克华兹 (Schwartz, G.) 等, 《爱情与义务》, 哲人出版社, 1980 年。
- ⑥ 斯维霍克 (Sweehock, S.) 等, 《新加坡青年》, 新加坡大学出版社, 1981 年。
- ⑦ 沙学汉, 《台湾求偶方式研究》, 1974 年。

第三篇 浪漫爱情

引言

一般认为，关于浪漫爱（爱情）的研究是属于心理学的、微观的研究，但是由于浪漫爱现象的确包含着社会内容，许多社会学家也尝试从社会学的、宏观的角度来研究它。关于浪漫爱的社会学研究有许多种类，如关于浪漫爱度量尺度的研究，关于浪漫爱与现代化关系的研究，关于浪漫爱作为结婚主要原因的研究，以及关于与浪漫爱相关的社会诸因素的研究，等等。

在所有这些研究中，最吸引我的题目是浪漫爱与现代化的关系及浪漫爱作为结婚的主要原因。这两个题目实际上是紧密相联的，因为关于浪漫爱与现代化关系的主要理论是把人类婚姻史划分为两个大段，第一段是传统社会（或前现代化社会），婚姻缔结的主要原因在于夫妻双方相互依赖以维持各种基本生活需要；第二阶段是现代社会，婚姻缔结的主要原因在于浪漫爱情。许多实证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理论，但也有些研究的结果与这一理论相悖。这一点在文献综述一节还将详细论说。

这个题目之所以吸引人除了它本身的魅力外，还在于中国

这个环境。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一个现代化过程。尽管人们对这一过程的性质众说纷纭——有的说是从封建社会过渡到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有的说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但没有人否认这个变化本身。（顺便说一句，这是科学研究中一个常见的现象：人们常常在概念上争论不休，但请他们举出所指现象的具体内容，才发现他们是在用不同的语言描述同一内容。）这一过程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来检验浪漫爱与现代化关系的理论。换言之，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是否也发生了婚姻从以维持生活基本需要为主要原因到以浪漫爱情为主要原因的变化？这一点又受到哪些社会因素的影响？

有人认为，浪漫爱基本上是西方的东西（美国有些人甚至认为它是美国社会中的婚姻所独有的，而欧洲人是有门第观念的），它是文艺复兴的产物，其哲学基础是人文主义。中国传统社会一向把爱情放在次要地位，于是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及“门当户对”一类深入人心的做法与观念。但在我看来，中国古代并非没有以浪漫爱情为基础的结合——有许多描写浪漫爱的文学作品为证——只是以浪漫爱为基础的婚姻不占主导地位、没有成为人们的行为规范甚至常常受到不同程度的压抑罢了。这项研究打算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对婚姻实际情况的描述——它是以浪漫爱为主要原因还是以维持生活基本需要为主要原因？二是对浪漫爱现象的解释——有哪些社会因素在影响着人们的浪漫爱情，决定着他们婚姻中有较多或较少的浪漫爱情？

文献综述

关于浪漫爱的研究很多，我把它分类综述如下：

第一类是关于浪漫爱度量尺度的研究。

要想研究浪漫爱，首先必须确定度量尺度，巴蒂斯 (Bardis, P.D.) 在 1971 年曾设计了一套 82 项的指标来度量浪漫爱，数年后又删节成 50 项 (巴蒂斯, 1971 年, 1974 年)，他采用的是里克特尺度 (Likert - type scale)。卡茨 (Katz, M.) 将浪漫爱的标准概括为以下三项，第一，关注对方，第二，建立在相互了解基础上的亲密感，第三，愿意给予、分享甚至做出牺牲 (卡茨, 1976 年)。诺克斯 (Knox, D.H.) 与同事创造出所谓“诺克斯-斯波拉可夫斯基尺度”，用它在 50 个中学女生、50 个中学男生、50 对结婚不到 5 年的夫妇及 50 对结婚超过 20 年的夫妇中进行了调查。(诺克斯, 1970 年) 斯劳斯基 (Slawski, C.) 在题为《爱情的标志》的研究报告中指出爱情的五大要素：(1) 情投意合，(2) 与对方在一起的欲望，(3) 分享快乐或分担痛苦，(4) 愿作牺牲，(5) 欣喜 (快乐)。他还将相爱双方的感情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分享双方的社会属性，第二阶段是双方在一些主要的爱好上相辅相成，在第三阶段，双方能够同享社会与人格的需要。(斯劳斯基, 1975 年)

第二类是关于浪漫爱与现代化关系的研究。

兰茨 (Lantz, H.R.) 在《前现代时期的浪漫爱：社会学评论》一文中指出，现代化理论忽略了浪漫爱这一重大内容，仅仅将其归结为都市化与工业化。文章认为，浪漫爱的发展是现代化过程的一部分，受到现代化过程中经济、政治和社会诸因素的影响，许多关于浪漫爱的研究因忽视了现代化过程这一因素而误入迷途。(兰茨, 1982 年)

奥庞 (Oppong, C.) 的一项研究发现了同一般浪漫爱与现代化关系理论相对立的证据，值得注意。他在研究报告中指

出，一般认为，婚姻是由以下两种力量之一缔结起来的：一个是夫妇在维持生活基本需要上的相互依赖，另一个是浪漫爱情。前者属于传统社会的婚姻，后者属于现代化社会的婚姻，二者是此长彼消的关系。但是在他所做的一项非洲阿肯母系社会的调查中发现了与上述理论不符的事实，从而对这一理论提出了挑战。阿肯母系社会有 400 万人口，占加纳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二。在这个社会中，两性十分平等，社会规范一向认为妇女应当经济独立，而婚姻应当建立在双方自愿和浪漫爱情的基础上。妇女在举行过成年仪式后所生的子女即属合法，并不一定是婚生子女，离婚也很容易，因为夫妻的结合并不意味着（像西方基督教文明中那样）二人合为一人。兄妹关系反而比夫妻关系更为亲近。现代化过程并未使阿肯社会广泛接受合法的或基督教式的婚姻形式，在这一社会的上层女性中反而出现了在经济上更加依赖于男性的倾向。（奥庞，1980 年）怎样看待这一研究的理论挑战呢？如果严重地对待它，将得出浪漫爱与现代化关系的理论不够准确或根本不存在这样一种因果关系的结论。但或许这只是一个例外。库恩在《科学理论的结构》一书中曾用大量篇幅讨论这种例外现象，认为当某种现象只是零星的例外发现时，还不足以威胁到整个理论结构，而一旦这种“例外发现”越来越多，旧的理论结构无法加以解释时，则一种能对其加以解释的更能自圆其说的理论结构将取而代之。不知中国社会的研究是否可容纳于浪漫爱与现代化关系的理论结构，这正是我的研究要探讨的问题。

第三类是关于浪漫爱作为婚姻主要原因的研究。

罗布津斯卡（Lobodzinska, B.）在题为“现代波兰作为婚姻决定因素的爱情”一书中指出，在现代波兰，婚姻的决定因素是爱情，其基本目标在于满足双方的感情需要。这一结论

是通过《华沙青年日报》读者及其他来源的 1648 名调查对象的分析得出的。（罗布津斯卡，1975 年）

苏联拉里科夫（Rurikov, K.）将自己的研究报告题名为“仅仅靠爱情？”。他发现，在 1.5 万名调查对象中有 70—80% 是因爱情而结合的，15—20% 是因为人人都结婚才结婚的，3—10% 是因个人利益而结婚的。进一步的调查发现，因爱而结合的人百分之百感到不幸福，因人人如此而结婚的人中幸福者占十之四五，因利益而结合的人中十个幸福对七个不幸福。作者从而得出结论，因爱情而结合并不能保证婚后幸福。研究还发现，在年龄较大的人当中，因浪漫爱而结合的较少，寻找生活伴侣的动机较多。（拉里科夫，1974 年）

在这一类研究中还应提到朗格（Leung, A.K.）的《爱情在中国：13 与 14 世纪的社会关系及实践》。文章提出，虽然中国历史上的节妇是孔教理学褒赏的形象，但这种理想化的形象与现实中的中国妇女形象有区别。通过对 43 出元剧的分析，作者将这些作品中中国妇女的形象及其对爱情的态度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赞赏肉体美和婚前浪漫爱情的，另一类是儒教理想中的贞节、孝顺、绝对服从的女性。研究认为，虽然社会舆论偏爱后者（即使是第一类情况也往往要加上一个幸福的结局），但还是可以看出，在理学正盛的年代人们已经对浪漫爱有所认识（朗格，1983 年）浪漫爱应当说在中国早有萌芽，但真正成为受社会规范赞许的婚姻动机还是到近现代才有的。目前的具体情况究竟如何正是本文要加以探讨的问题。

研究设计

这项研究的样本是根据简单随机抽样的原则从北京一千万

人口中抽取的，其中不包括农村户口和 16 岁以下的人口。具体地说，我们首先在全北京 16 岁以上人口每人一张的户口本中随机抽出 1550 人（遇农村户口即换抽紧邻其后的城市户口），在发放问卷之前，由于考虑到有些年龄小的人可能尚未结婚，难以回答我们的一些问题，所以去掉了 1961 年以后出生的 500 多人。在实际寄出的 1000 份问卷中，147 份问卷因地址不详或搬迁被邮局退回，还有 4 人因未婚退回了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 547 份，回收率为 64%（547/853）。这在社会学的调查中已经可以被用作推论总体的依据（一般认为 50% 的回收率即可使用，60% 的回收率已属上乘）。因此可以有把握地说，由这个样本所得到的数据能够推论到北京已婚的全体非农业人口。

样本的基本组成情况如下，男性占 54.5%，女性占 45.5%。1919 年以前出生的占 2.4%，1920—1929 年出生的占 8.0%，1930—1939 年出生的占 22.2%，1940—1949 年出生的占 23.1%，1950 年以后出生的占 44.3%。汉族人占 94.3%，少数民族的人占 5.7%。籍贯为北京的占 38.7%，北京以外的占 61.3%。出生地为北京的占 55.6%，北京以外的占 44.4%，共产党员占 30.1%，民主党派及非党群众占 69.9%。教育程度：文盲占 1.8%，小学程度 14.8%，中学程度（包括初高中、中专中技）57.9%，大学程度占 24.4%。职业：无工作的占 3.1%，工人占 51.6%，知识分子占 15.9%，干部占 24.7%，军人占 1.1%，农民占 0.4%。收入在 100 元（月）以下的占 47.3%，100 元以上的占 52.7%。以上为研究中的自变量。

依变量共 39 个，它们是对“下列因素在你们的结合中重要性如何”这一问题的选择答案（“重要”或“不重要”）。这

39 个依变量是 (1) 对方的教育程度 (2) 对方的容貌 (3) 对方的身材 (4) 对方的健康程度 (5) 对方的年龄 (6) 对方的住房条件 (7) 对方是否初婚 (8) 对方是否有孩子 (9) 对方是否初恋 (10) 对方是否童贞 (11) 对方的民族 (12) 对方的职业 (13) 对方的家庭状况 (14) 对方的收入 (15) 对方的存款数目 (16) 对方的性格 (17) 对方的智力 (18) 对方的幽默感 (19) 对方是否城市户口 (20) 对方的政治面目 (21) 对方的政治表现 (22) 对方的政治观点 (23) 对方的宗教信仰 (24) 对方历史是否清白 (25) 对方事业是否成功 (26) 对方的才能 (27) 对方的抱负 (28) 对方的理家能力 (29) 对方的办事能力 (30) 对方的社交能力 (31) 对方的忠实程度 (32) 对方有无海外关系 (33) 对方有无生育能力 (34) 对方是否勤俭节约 (35) 对方的身高 (36) 对方的爱好 (37) 对方有无家庭负担 (38) 双方感情 (39) 双方共同语言。调查对象被要求在封闭式选择答案的“重要”与“不重要”两项中选择一项，因此这些依变量都是定类变量。

数据分析采用两种方法：第一种是卡方检定，看每个依变量受到哪些自变量的影响，从而确定是哪些因素在决定着人们浪漫爱情及其他方面的考虑。第二种方法是对数线性回归分析，用以确定几个主要自变量对依变量影响的程度。

研究的一个基本假设是：生存环境越是接近现代化，则人们越看重浪漫爱情。这里面包括三项尺度：第一是时间尺度，即假设年轻者比年长者更看重浪漫爱情，第二是空间尺度，即假设越是生活在大都市中的人越看重浪漫爱情；第三是社会生存条件或社会经济地位的尺度，即假设那些社会经济地位（教育程度、职业等）较高的人比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更看重浪漫爱情。

研究结果

数据分析的第一步是通过卡方检定确定各主要自变量对依变量的影响。

1. 出生年的影响

受出生年这一自变量影响（显著程度超过 .05）的有 19 个依变量，如表一，其中年长者指 1947 年以前出生者，年轻者指 1948 年以后出生者。

从表一可以看出，样本中的年轻者注重的多为对象自身的肉体特征（身材、身高等）和精神特征（性格、智力、幽默感、才能等）；而年长者则更注重对象的社会特征，诸如收入、政治面目、历史清白、有无海外关系等等。虽然在“双方感情”这一因素上年轻者与年长者并无显著区别，我们仍可得出年轻者比年长者更注重对象的自身素质，因而更具浪漫气质这一结论。它与年轻者比年长者更重浪漫爱情这一研究假设相符。

表一 出生年的影响

	X ²	DF	P	答“重要”超过期望值者
身材	4.80	1	.0285	年轻者
性格	7.60	1	.0059	年轻者
智力	8.58	1	.0034	年轻者
幽默感	10.90	1	.0010	年轻者

城市户口	23.62	1	.0000	年轻者
才能	4.47	1	.0346	年轻者
社交能力	4.21	1	.0401	年轻者
身高	12.90	1	.0003	年轻者
年龄	6.78	1	.0092	年长者
是否初恋	4.74	1	.0295	年长者
民族	6.03	1	.0140	年长者
收入	22.42	1	.0000	年长者
政治面目	24.90	1	.0000	年长者
政治表现	11.65	1	.0006	年长者
政治观点	20.71	1	.0000	年长者
宗教信仰	6.38	1	.0116	年长者
历史清白	21.81	1	.0000	年长者
海外关系	33.60	1	.0000	年长者
勤俭节约	6.25	1	.0124	年长者

2. 籍贯的影响

受籍贯影响的依变量有 5 个，如表二：

从表二可以看出，籍贯为北京的人认为双方感情和共同语言以及对方的性格在结合过程中“重要”的频率大大超过了期望值，而外地人则更看重对方有无家庭负担及住房这类实际问题。这一重要发现揭示了都市生活对人们结合过程中是否注重爱情的影响。

表二 籍贯的影响

	X ²	DF	P	答“重要”超过期望值者
感情	38.99	2	.0000	北京
共同语言	22.06	2	.0000	北京
性格	10.03	2	.0060	北京
住房	6.40	2	.0470	外地
家庭负担	8.09	2	.0000	外地

3. 出生地的影响

受出生地影响的变量有 8 个，如表三：

表三 出生地的影响

	X ²	DF	P	答“重要”超过期望值者
感情	7.11	1	.0077	北京
共同语言	4.93	1	.0263	北京
性格	5.42	1	.0199	北京
城市户口	14.30	1	.0002	北京
政治面目	8.83	1	.0030	外地
政治观点	6.19	1	.0129	外地
宗教信仰	8.01	1	.0046	外地
海外关系	6.16	1	.0131	外地

出生地的影响与籍贯的影响呈现相同模式——北京出生的

人更重感情、共同语言及性格等个人气质，而外地出生的人更重政治面目、政治观点等社会属性。同籍贯的影响一样，出生地的影响也反映了都市生活环境（空间）的影响。

4. 教育程度的影响

教育程度对以下 9 个变量有影响（表四）：

表四 教育程度的影响				
	χ^2	DF	P	答“重要”超过期望值者
教育程度	16.09	1	.0001	大学以上
职业	14.34	1	.0002	大学以上
幽默感	7.19	1	.0073	大学以上
住房	5.72	1	.0163	中学以下
是否初婚	7.97	1	.0047	中学以下
是否童贞	7.65	1	.0057	中学以下
有无子女	4.40	1	.0359	中学以下
社交能力	4.06	1	.0440	中学以下
生育能力	11.04	1	.0009	中学以下

从大学以上和中学以下两组人对不同因素的强调可以看出，虽然在许多因素的选择上二者没有差别，但在这些有差别的因素的选择上，教育程度低的人重视的是层次较低、离浪漫情调较远的因素，如是否初婚、是否童贞、有无子女及生育能力等等。这一结果基本上符合社会地位较高者更重浪漫爱情的假设。

5. 职业的影响

职业对 10 个因素有影响，如表五：

表五 职业的影响

	X ²	DF	P	答“重要”超过期望值者
双方感情	5.11	1	.0237	干部、知识分子
共同语言	6.80	1	.0091	干部、知识分子
教育程度	21.89	1	.0000	干部、知识分子
职业	11.69	1	.0006	干部、知识分子
住房	3.96	1	.0466	其他职业
是否初婚	5.48	1	.0192	其他职业
是否童贞	7.75	1	.0054	其他职业
收入	5.96	1	.0146	其他职业
社交能力	9.15	1	.0018	其他职业
生育能力	21.73	1	.0000	其他职业

职业的区别比教育程度的区别对浪漫气质有更明显的影响。干部、知识分子在结合过程中比其他职业的人更注重感情、共同语言等，而其他职业的人则比干部、知识分子更看重住房、收入一类物质因素，或是否初婚、童贞、有无生育能力这一类更实际的因素。

6. 父亲教育程度的影响

调查对象们父亲的教育程度对以下 11 个因素有影响（表

六):

表六 父亲教育程度的影响

	X ²	DF	P	答“重要”超过期望值者
容貌	8.25	1	.0041	中学以上
身材	5.39	1	.0202	中学以上
幽默感	7.77	1	.0053	中学以上
才能	9.64	1	.0019	中学以上
抱负	4.99	1	.0255	中学以上
爱好	11.43	1	.0007	中学以上
教育程度	24.95	1	.0000	中学以上
职业	8.59	1	.0034	中学以上
是否童贞	3.93	1	.0475	小学以下
政治表现	5.72	1	.0168	小学以下
生育能力	5.85	1	.0155	小学以下

父亲教育程度显示出与其他社会经济地位自变量类似的影响模式——父亲教育程度高的人更注重配偶的个人素质及精神方面的因素，父亲教育程度低的人则更注重社会因素如政治表现及更实际的方面如是否童贞、有无生育能力等。

7. 父亲职业的影响

调查对象的父亲的职业对 15 个因素有显著影响，如表七：

表七 父亲职业的影响

	X ²	DF	P	答“重要”超过期望值者
幽默感	10.25	1	.0014	干部、知识分子
能力	4.21	1	.0401	干部、知识分子
爱好	9.72	1	.0018	干部、知识分子
教育程度	6.63	1	.0100	干部、知识分子
年龄	12.12	1	.0005	其他职业
是否初婚	3.93	1	.0476	其他职业
是否童贞	8.06	1	.0045	其他职业
收入	4.41	1	.0358	其他职业
政治面目	6.06	1	.0138	其他职业
政治表现	6.60	1	.0102	其他职业
政治观点	4.97	1	.0258	其他职业
历史清白	6.06	1	.0138	其他职业
理家能力	4.21	1	.0402	其他职业
海外关系	4.23	1	.0392	其他职业
勤俭节约	5.40	1	.0400	其他职业

我们在这里再次看到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对浪漫气质的影响模式：父亲为干部、知识分子的人比父亲为其他职业者更注重的是精神方面的因素，而后者则相反。

数据分析的第二步采用对数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对主要自变量（出生年、教育程度、职业）对主要依变量的影响程度作量的分析。三个最有代表性的依变量被选出来做分析。这三个依

变量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感情的因素，以对“双方感情”在结合过程中重要与否的回答为代表；另一类是“实际”的因素，以“收入”作为经济因素的代表，以“政治面目”作为政治因素的代表。

1. 关于“双方感情”这一因素的分析

通过统计软件 SPSS 对数线性回归分析的筛选，发现解释出生年（Y）、教育程度（E）、职业（O）和双方感情（L）这四个变量的最佳模型为：

YO, EO, OL

其中调查对象回答双方感情这一因素在结合中是“重要的”与“不重要的”之比为依变量，出生年、教育程度和职业为自变量。经运算的筛除只余职业的影响，所得参数如下（括号里是从对数还原出来的真数）：

$$O \begin{cases} \omega_1 = .877 & (2.40) \\ \omega_2 = -.877 & (0.42) \end{cases}$$

这一参数首先可以解释为自变量对依变量相对于几何平均值的影响。也就是说：职业为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比值（感情因素“重要”与“不重要”之比）是平均值的 2.40 倍，其他职业者的比值是平均值的 0.42 倍。即一旦研究对象为干部、知识分子，其比值就会升高到平均值的 2.40 倍，一旦研究对象为其他职业者，这一比值就会降到平均值的 0.42 倍。

其次，将自变量的一对取值进行比较，使它对依变量的影响更加一目了然。通过计算得到，在职业对依变量的影响中，干部、知识分子与其他职业者的比值之比为 5.7 (2.40/0.42)，也就是说，干部、知识分子的比值是其他职业者比值的 5.7 倍，即一旦研究对象为干部、知识分子，其认为“双方

感情在结合中是重要的”机会是其他职业者的 5.7 倍。这一分析结果证实了社会地位较高的人更重浪漫爱情这一研究假设，并给出了数量的描述。

2. 关于“收入”这一因素的分析

在回答“收入在双方结合中重要性如何”这一问题时，以选择“重要”，与“不重要”的频数之比（ I ）为依变量，自变量是出生年（ Y ），教育程度（ E ）和职业（ O ）。

对数线性回归分析筛选出来的最佳模型为

YI, YO, EO, OI

经运算筛除教育程度的影响，得到下列参数，

$$\begin{cases} \omega_1 = .486 & (1.63) \\ \omega_2 = -.486 & (0.62) \end{cases} \quad \begin{cases} \omega_1 = -.259 & (0.77) \\ \omega_2 = .259 & (1.30) \end{cases}$$

首先仍看自变量对依变量相对于几何平均值的影响。上述参数显示，年长者的比值是平均值的 1.63 倍，年轻者的比值是平均值的 0.62 倍，干部、知识分子的比值是平均值的 0.77 倍，其他职业者的比值是平均值的 1.30 倍。

再看自变量的一对取值对依变量的影响：在出生年对依变量（收入重要：收入不重要）的影响中，年长者与年轻者的比值之比为 2.63 ($1.63/0.62$)，即一旦个案为年长者，则其认为“收入重要”的机会是年轻者的 2.63 倍。在职业对依变量的影响中，其他职业者与干部、知识分子的比值之比为 1.69 ($1.30/0.77$)，也就是说，一旦个案为其他职业者，其做出“收入重要”这一选择的机会是干部、知识分子的 1.69 倍。这一分析结果证实了社会地位较低者和年长者更注重实际且较缺

乏浪漫气质这一研究假设。

3. 关于“政治面目”这一因素的分析

在回答“政治面目在双方结合中的重要性如何”时，选择“重要”与选择“不重要”的频数之比（P）是这一分析中的依变量，自变量仍是出生年（Y）、教育程度（E）和职业（O）。

对数线性回归筛选出的最佳模型为

YEP, YO, EO

经运算筛除职业的影响，得到下列参数：

$$\begin{aligned}
 Y & \begin{cases} \omega_1 = .642 & (1.90) \\ \omega_2 = -.642 & (0.53) \end{cases} \\
 E & \begin{cases} \omega_1 = .129 & (1.14) \\ \omega_2 = -.129 & (0.88) \end{cases} \\
 Y \cdot E & \begin{cases} \omega_{11} = .242 & (1.27) \\ \omega_{12} = -.242 & (0.79) \\ \omega_{21} = -.242 & (0.79) \\ \omega_{22} = .242 & (1.27) \end{cases}
 \end{aligned}$$

将自变量对依变量的影响与几何平均值相比：（1）出生年：年长者的比值是平均值的 1.90 倍，年轻者的比值是平均值的 0.53 倍；（2）教育程度：中学以下者的比值是平均值的 1.14 倍，大学以上者的比值是平均值的 0.88 倍。

在出生年对依变量（政治面目重要：政治面目不重要）的影响中，年长者与年轻者的比值之比为 3.58 (1.90/0.53)，也就是说，一旦个案为年长者，则其认为“政治面目重要”的机会是年轻者的 3.58 倍，在教育程度对依变量的影响中，中学以下教育程度者与大学以上教育程度者的比值之比为 1.30

(1.14/0.88)，即一旦个案为中学以下教育程度者，则其选择“政治面目重要”这一答案的机会是大学教育程度以上者的 1.3 倍。

这一分析中，二阶的影响也较显著，对它的解释是：在相同的职业中，年长年轻的区别对依变量的影响是教育程度区别对依变量影响的 1.61 倍 (1.27/0.79)。

这一分析结果再次证实了研究假设，即年轻者更注重浪漫爱情，而年长者更注重实际，教育程度高者更富浪漫气质，而教育程度低者在配偶身上更看重那些实际的因素。

结论

这项研究所获得的数据证实了最初的研究假设：生活环境越是接近现代化，人们越看重浪漫爱情。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浪漫爱与现代化关系的理论。这种现象是否反映出一种文化趋同的趋势呢？

谈到这个问题，我想引用费孝通先生最近一篇讲话中对这一问题的见解，他说，“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的多样性是会像经济不平衡性一样在发展过程中逐步淡化么？望文生义地想，现代化既是全世界人民面临的共同趋势，应当包括经济的趋平和文化的趋同。事实可能比这种看法要复杂得多。”在同一篇讲话中他还说：“我还没有被人们的理想最后会趋同的理论所说服。”《从小培养二十一世纪的人》为了追求舒适的物质生活，世界上各种文化的人都致力于经济的发展，因为发展经济是人们达到物质富裕的惟一途径。人们在这点上绝不会做出其他的选择。但是文化的问题却不同，由于并没有像经济的富裕与贫困这样一个明显的尺度（标准），就不能像说富裕是好

的、贫穷是不好的那样说这种文化现象是好的、那种文化现象是不好的，或说浪漫爱是好的、讲求实际是不好的。美国人可以做出浪漫爱的选择，中国人也可以做出居家过日子、传宗接代的选择。很难说前者就是好的、后者就是不好的。

话又说回来。我们虽然不能评论文化趋同的好与坏，却可以客观地描述趋同是否在发生。在浪漫爱这个纯属文化范畴的问题上，根据我的调查，文化趋同的现象确实在发生，而且对它的解释很可能是在与现代化过程有关的因素之中，如时间的远与近，空间是否在大都市，以及社会经济地位等等。北京市民的看重浪漫爱与否如果是同这些因素联在一起的，那么当现代化和都市化过程进一步发展，人们教育程度进一步提高之后，是不是会有更多的人在结婚过程中更看重浪漫爱情而不是居家过日子的实际考虑呢？从这项研究的结果看，现代化过程与浪漫爱的这种关系确实存在。换言之，如果中国要继续提高现代化的水平，则结婚看重浪漫爱情的倾向也会发展。这项研究也许可以作为文化趋同论的一个证据吧。

参考书目：

- 巴蒂斯 (Bardis, P.D.) :《异性爱的度量技巧》，《国际社会学》，1974 年总 12 期，第 189—202 页。
- ② 弗艾和多内沃斯 (Foa, U.G. & Donnenwerth G.W.) :《现代文化中爱的贫困》，《社会学研究》，1971 年总 41 期，第 149—160 页。
- ③ 海恩克和斯波拉可夫斯基 (Hinkle, D.E. & Sporakowski, M.J.) :《对爱情的态度》，《婚姻家庭杂志》，1975 年总 37 期，第 764—767 页。
- 卡茨 (Katz, J.M.) :《你对我爱到什么程度》，《社会学研究》，1976 年总 46 期，第 17—22 页。

- 诺克斯 (Knox, O.H.Jr.): 《三种发展水平上的爱情概念》, 《家庭合作》, 1970 年总 19 期, 第 151—157 页。
- ⑥ 兰茨 (Lantz, H.K.): 《前现代时期的浪漫爱》, 《社会历史杂志》, 1982 年总 15 期, 第 349—370 页。
- ⑦ 李 (Lee, J.A.): 《浪漫爱情》, 《加拿大社会学人类学杂志》, 1975 年总 12 期, 第 514—528 页。
- ⑧ 朗格 (Leung, A.K.): 《爱情在中国: 13、14 世纪的社会关系与实践》, 《社会与宗教》, 1983 年总 28 期, 第 59—76 页。
- ⑨ 罗布津斯卡 (Lobodzinska, B.): 《现代波兰婚姻决定的爱情因素》, 《家庭比较研究》, 1975 年总 6 期, 第 56—73 页。
- ⑩ 奥庞 (Oppong, C.): 《从爱情到制度 阿肯婚姻的变化》, 《家庭史杂志》, 1980 年总 5 期, 第 197—209 页。
- ⑪ 拉里科天 (Rurikov, Y.): 《仅仅靠爱情》, 《文学杂志》, 1974 年总 29 期, 第 13—28 页。
- ⑫ 斯康洛克 (Schonrock, G.G.): 《爱的概念及其与婚姻关系的变化》, 宾西法尼亚社会学会, 1979 年。

第四篇 独身

引言

文化最奇妙的力量在于，它能使生活在这个地球某个角落的某一群人以为天经地义的事情在另一群人（生活在同一地球之上）眼中变作惊世骇俗；使某一群人以为不可或缺的东西，在另一群人那里变得可有可无。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中国，人人都要结婚。谁也不问为什么，谁也不知为什么，总之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似乎别无选择。即使是结婚年龄偏离中位值前后三年这样的区区小事，也会引起大量猜测和议论，给当事人带来忧虑和忙乱。与此同时，生活在地球另外地方的一些人中就有故意选择独居的，就有三四十岁才结婚的（萧伯纳 59 岁才结婚），也没有人说他们是找不着对象故意在充硬汉。在这里，我们无意评判二者孰优孰劣，只是感慨于文化塑造社会规范和风习的神力罢了。笔者留学美国时，有一次问起一个美国中年男子为什么没有结婚，答曰不知怎么就耽搁下来，并淡淡地加了一句：也许还是该结婚，结了婚的人责任感会强些。我问：此话怎讲？答：听说结了婚的人去投票选举的比单身者多。如果这就是应当结婚的理由，那结不结婚真是无

所谓了。目前美国每四个家庭中就有一个单身家庭，独居的人口正在迅速膨胀。1970至1978年间，美国14至34岁之间的独身人数几乎增长三倍——从150万增加到430万。据统计，加拿大的单身家庭在家庭总数中也占到五分之一。这些人中许多并非被迫独居，而是自愿的。当然，结婚的重要性在中西两种文化中的差别还同许多其他条件联系在一起，例如，在西方，单身并不意味着没有性生活，但在中国，婚姻几乎是性生活惟一被允许的途径，这恐怕也是在中国人人要结婚的原因之

这项研究以独身者为研究对象，内容包括他们的组成成分，他们的生活经历，独身的原因，他们对自己生活方式的感觉和看法以及周围环境的压力等等。在中国独特的社会环境中，他们还会遇到一些独特的问题，文中还包括他们对这些问题的态度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期望。

文献综述

1. 关于独身原因的研究

凯斯(Keith, P.M.)的研究报告指出，尽管独身者的比例在上升，社会科学和家庭社会学家却往往忽略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或者只将独身现象当做婚姻的剩余或异常行为来看待。他认为，独身现象有两个模式，一个是传统模式，一个是先锋模式。(凯斯，1980年)显然，这两种模式中，前者是指想结婚而没有结成婚的，后者则指故意(或自愿)选择不结婚这种生活方式的。

康纳尔(Cornell, L.L.)在西欧社会与日本社会的比较

研究中发现，西欧独身女性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因经济状况困窘难以出嫁的，另一种是故意选择了事业而放弃了婚姻的。对日本前工业化时期（1671 至 1871 年）的研究却呈现出另一图景：那时独身女人是极为少见的，并没有人因经济原因嫁不出去，妇女也没有什么事业可作，于是她们全部都结婚。作者认为应当对欧洲为什么会出现相当数量的独身者做进一步的研究。

斯泰因（Stein, P.L.）的专著提到，在 1970 年，美国研究生毕业或肄业及收入年均二万美元以上的女性中有五分之一没结过婚，而这个比例在没上过大学的女性中仅占二十分之一（斯泰因，1976 年）。由此看来，独身女性在教育程度和经济收入上均高于一般女性。

施莱辛格（Slesinger, D.P.）等人将独身女性分为两类，他们发现在老年女性组中以寡居者为主，而年轻女性多为独身者和离婚者。单身者有 25% 生活在贫困中，其中住在小城镇和农村的比住在大城市的更为贫困，而以往在大城市郊区的最为富有，有色人种比白种人更为贫困，在小于 20 岁和大于 80 岁的年龄组中，有 66% 的人陷于贫困。对于年轻女性来说，有无工作、教育程度和年龄可以解释其经济状况，对于老年妇女来说，是否有一处以上的生活来源、种族和教育程度可以解释其经济状况。总的看来，女性独身者比男性独身者更为贫困，她们大多收入较低或依靠前夫生活。（施莱辛格，1986 年）

2. 对单身者生活满意度的调查

洛温斯坦（Loewenstein, S.F.）等人的抽样对象为 35 至 65 岁的单身女性，包括三种情况：离婚者、寡居者和从未结

过婚的人。调查发现影响独身者生活满意度的 5 个主要因素是：（1）健康状况，（2）自我感觉不孤独，（3）有女邻居，（4）短期朋友较多，（5）工作专心努力。调查还表明，样本中 50% 的调查对象承认有性要求（已得满足或未得满足），另外 50% 说自己没有性要求。两种人在生活的满意度上并无显著区别。在无子女的单身女性中，有 25% 的人表示遗憾，但并不一定影响生活满意度。总的看来，调查对象中生活满意度低的占 15%，这一比例同全国抽样（即一般人）的这一比例相似。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有些女人在没有性生活、婚姻和作母亲这些一般认为不可缺少的需要的情况下仍然可以过她们自己认为满意的生活。（洛温斯坦，1981 年）

考克拉姆（Cockrum, J.）等人的研究证明，影响从未结过婚的人的生活满意度的最重要因素为：（1）自我评价，（2）社会支持，（3）孤独感。男女略有区别，对单身女性影响最大的是孤独感和有无其他社会关系，对男性最重要的因素是自我评价和社会交往。（考克拉姆，1985 年）鲍克特（Borchert, S.D.）则发现，单身女性比单身男性对生活的满意程度要高，只是从未结过婚的人除外。原因是单身女性比单身男性有更多的朋友和社会支持。此外，研究还发现，年龄和工资的增长对独身者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比预期的要大。（鲍克特，1982 年）

卡甘（Cargan, L.）等人将调查对象分为从未结婚者、离婚者和再离婚者三组。研究发现，再离婚与从未结婚的男性孤独感和与世隔绝感最重。解决孤独的途径各不相同：再次离婚的女性倾向于参加社会运动，男性则倾向于寻找新的伴侣，而从未结婚者倾向于保持现状，不作任何改变。最使人减少孤独感的事情对男性单身者来说是性，对女性单身者来说是工作和事业。此外，再次离婚女性中有过抑郁症经历的最多，女性哭

泣的频率较高，男性患有性病和血压病的较多，吸毒者较多。但是总的看来，独身者吸毒酗酒的现象并不普遍。（卡甘，1984 年）

3. 独身者与已婚者的区别

卡甘曾研究过独身者同已婚者及其他社会人群的区别。从家庭背景上看，独身者比已婚者的家庭和谐程度要差些。从生活方式与闲暇时间的支配上看，独身者每周出门的次数比已婚者要高，主要内容为看朋友、下饭馆和看电影，但很少串亲戚。已婚者出门的主要内容依次为看朋友，下饭馆和串亲戚，却很少看电影，两种人共同的日常娱乐都是看电视。（卡甘，1979 年）

摩根哈根（Mergenhausen, P.M.）等人的研究指出，过去的研究证明，已婚者的死亡率比起各类单身者为低。1959 至 1961 年的一项调查表明，死亡率按高低排列依次为：（1）离婚者，（2）寡居者，（3）从未结婚者，（4）结婚者。1979 年的调查发现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中主要是离婚者的健康状况比过去提高了，但寡居者的健康状态比过去下降了，从未结婚者的健康状况也比过去有所下降。（摩根哈根，1985 年）

4. 对独身者的看法

斯托克（Stolk, Y.）等人以澳大利亚已婚男女为对象，调查他们对 30 岁以上未婚女人的看法。35% 的调查对象称她们为“老处女”，同时，认为别人会使用这种称呼的占 66%。男性调查对象的态度比女性更加严厉，认为“到 30 岁还没有男人”，一定是有什么缺陷。但是，有 31% 的研究对象认为，有些女人对有没有男人、婚姻和子女是不看重的。（斯托克，

1981年)

波尔纳 (Pollner, M.) 以“宁死不结婚”为题, 阐述了大众传播媒介对青少年产生的一种影响: 由于在大众传播媒介中, 英雄人物多为单身男人, 致使男青年们容易把英雄与独身者联系在一起, 而同结婚相对立, 因而激发对婚姻的否定态度。(波尔纳, 1982年)

调查的样本、方法及结果

由于独身者在人口中所占比例甚小, 难以使用随机抽样的方法, 这项研究是采用非随机抽样方法取得样本的。具体做法是, 在报刊上刊登广告, 征求志愿者参加调查。用这种方法共征集到 47 位独身者, 全部是北京市民。调查采用深入访谈、了解个案史的方法进行, 因而属于定性的研究。

经过对调查得来的资料所作的分析研究, 我们将目前的独身现象概括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是对男女两性均无兴趣的独身, 第二类是对异性有兴趣的独身, 第三类是对同性有兴趣的独身。第一、三两种类型属于选择性质的独身, 即真正的独身, 第二种类型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被迫性质的独身, 即假性的独身或暂时的独身。第二种类型的独身又可细分为两类, 即 (一) 浪漫型 (先锋型) 独身, (二) 保守型 (传统型) 独身。

独身 (一): 对两性均无兴趣

调查对象中有一部分人属于这个类型。他们有的已届中年, 有的还很年轻, 他们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 家庭背景既有干部, 知识分子, 也有工人、农民, 本人工作有科技人员、公司职员、药剂师、司机等。

这类独身者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当听到“独身”这个字眼时首先联想到的词是“轻松”、“自由”，而不是“孤独”、“痛苦”等等。

他们为什么选择独身？高度概括地说，是为了保存一个完整的独立的内心世界和生活天地。一位 23 岁的独身女性说：看到大多数父辈的人们终日为子女忙碌，失去了自己的生活目标，我不愿走他们的路，不愿为孩子牺牲自己的生活。她补充说：有人劝过我可以只结婚不生孩子，但我认为两个人的生活和一个人的生活还是有质的不同，即使只有两个人生活在一起，仍会有受打扰的感觉。他们把结婚视为负担和枷锁。一位年仅 20 岁但自称确经深思熟虑做出这种选择的男性将独身的好处概括如下：“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自己到哪里去了，既可以尽情纵容自己的陋习，又不需要容忍别人的坏习惯，有更多的私人权利，有更多的自由培养个人兴趣，有更多机会了解自己的需要，当你疲倦或情绪不稳时，没有人会骚扰你，有较多的宁静，没有摩擦，比婚姻生活有较多尝试新体验的机会，可以随意花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没有小孩在你身上撒尿。”

这种类型的独身者“自我”的意识十分强烈，他们给人的印象是有一个不容第二个人随意涉足的一个人的世界。一位独身女性说，“我需要安宁，需要一个孤独的人生，需要一个美丽的天地。孤独是一种至高无上的美。”他们特别看重这个一个人的世界，绝不愿意任何外人——哪怕是最令他们崇敬、喜爱和亲近的人——走进这个世界。

据观察，这种类型的独身者的内心世界绝不是悲惨的、痛苦的、孤寂的，他们兴致勃勃地生活着，轻松愉快，怡然自得，具有一种常人中见不到的“仙气”，一种清静、淡泊的内心世界，心理显得很平衡。他们陶醉于这个世界的恬静、安

适，自得其乐。有一位被调查者写道：“我纳闷，人们为什么看不到婚后的不幸，而总以为单身生活是一个悲惨无比的世界。”他们的主张和做法虽然在多数人看来是“走极端”的，但从他们身上完全看不到极端分子常有的焦躁、激烈、严厉和过分的狂热，有的却是丰满、完善、恬淡和祥和。他们不像世上许多人那样，或者还在上下求索，寻找关于人生道路的答案，或者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而像是解开了这个斯芬克斯之谜，因而沉浸在获得答案后的满足、喜悦之中，没有还在追寻答案的人们的焦虑和彷徨。

这类独身者如何对待情欲和性欲？调查发现，两性之间的感情在此类独身者心目中被放在极不重要、可有可无的位置上，不会超过友谊，他们对性欲也看得很淡漠，不会超过其他欲望，如食欲、求知欲等等。有一位男性独身者说：“这种欲望不是离不了的，它只是生理反应的一部分，不是生活的全部，没什么了不起的。”一位女性独身者说：“我认为性欲不太重要，我没有什么欲望。”另一位女性说，“这种事与我无缘，我不向往这种事。这种事在我心中没有位置，我即使成家也是为了双方互相照顾，我确实没有这种欲望，不能因为别人都这样做我也这样做。”女性未经开启的欲望或许能永远处于未知状态，而男性从心理上可以对两性均无兴趣，但生理的欲望还是会有。一位男性独身者承认：“我是凡人，欲望有时是强烈的，但我的理智能够克服我的本能。”另一位男性也用了“克制”这一字眼。他们当中有的研究过人类性心理和性生理方面的资料，知道男性在 20 岁时性欲达到最高峰，以后即使不会下降也不会再超过 20 岁了。一位男性独身者带着如释重负的神情说：“我已经过了 20 岁了，欲望最强的时间都过去了，以后就更不成问题了。”这一类的独身者几乎都是童男处

女，而且希望终生如此。

独身（二）：对异性有兴趣

1. 浪漫型（先锋型）独身

对异性有兴趣的人能否做到终生独身？在西方国家，人口中相当一个比例的人有可能做到这种选择，他们与异性或发生偶然的亲密交往或建立短期的亲密关系（包括性关系），但在中国社会中却很难做这种选择，因为婚姻几乎是与异性建立亲密关系（包括性关系）的惟一合法途径。因此，在中国的独身者中，选择真正的（不是暂时的）终生独身同时又对异性很感兴趣的人只能是人口中的极少数。

调查对象中有表明这种意向的人。他们抱着浪漫主义、理想主义或唯美主义，不愿结婚。此类独身者往往在感情上比较浪漫，一位独身女性说：“我为自己设计的生活挺浪漫，尽是想美好的东西。”另一位女性解释自己为什么选择独身生活时明确地说：“我不愿尽家庭义务，不愿下厨房，嫌炒菜油腻腻的。”“看到家庭婚姻不幸福的多，幸福的少，因此我不愿结婚。”还有一位女性说：“到什么年龄就做什么年龄的事——找朋友——结婚——家庭——丈夫——孩子，在我看来这是女人的错误，也是男人的错误。”一位学哲学的男性独身者说：“我觉得婚姻对人是一种限制，就人的本性来说，不应受婚姻形式的限制。也许到了一定的历史阶段，婚姻会消亡，人们将自由地交往。”

一位年轻美貌的独身女性一再称自己为唯美理想主义者，她把男性归纳为数种类型，一种她称为大海型的，深沉、浑厚，自我中心，由于她个性太强，不能嫁给这种男性，第二种

是白鹤型的，有才华、有教养，生活富裕，有欣赏价值，但不能预知在遇到艰难困苦时他们是否会改变，因此也不能嫁，第三种是雄鹰型的，总是像保护小妹妹一样保护妻子，女性在这种男性面前无法显示出个性，因此也不能嫁。选来选去，几种类型的男子都不能作丈夫，而只能作好朋友，于是她说：“所以我不得不被迫独身。”她还将自己的两难处境精辟地概括为：“浪漫的婚姻不稳定，稳定的婚姻不浪漫”，“世俗的丈夫缺乏诗意，有诗意的丈夫不现实”，结论是：理想的丈夫是没有的，所以独身。这种类型的独身者极其看重浪漫情调和感情，而浪漫爱情的原型正是 12、13 世纪欧洲的骑士爱，这种爱情从一开始就不属于已婚夫妇，而属于情人。

浪漫型的独身者还特别害怕有后代，一位女性说：“家庭不和可以出走，朋友不义可以断交，工作不好可以调动，实在绝望可以自杀，但有了孩子就什么也不能去做了，连死的自由都没有了。”

有些浪漫型的独身者生活在回忆或幻想的世界中。一位独身女性说，她常常在回忆往事时“哭得一塌糊涂”，有一阵几乎“每天哭一回”。她惟恐别人打破她回忆的天地。她并不认为自己孤独，甘愿活在自己的天地里，活在回忆中。她认为同一个平庸的男人一起生活没有意思，失去的多，得到的少，“得到了现实，失去了幻想的多彩多姿”。

这一类独身者中有些是在爱情受挫之后才决定独身的。有一位男青年就是这样产生独身意愿的。他在高中时代陷入狂热的恋爱，结果导致女方怀孕，事情败露后，在各种打击之下，女孩又忽然移情别恋，他大受刺激，“觉得世界末日到了”。后来感情又几经反复，终于使他彻底心灰意冷。他陷在痛苦之中考虑独身，说：“我怕重新选择别的姑娘，感情上再受挫

折。”他甚至陷入一种激烈的自我否定的情绪中。每当他想接触异性时，就“觉得自己太丑恶、太虚伪”，他一度要求自己在街上作到“目不斜视”，但发觉自己仍“不由自主地注意漂亮的异性”时，就觉得“自己太坏了”。这是一种受挫后退却式的独身选择。

还有一种受挫后进攻式的独身选择。一位独身女性曾因意外原因失身，后来的多次恋爱均因丧失处女之身受挫，精神受到很大刺激。她虽然没有结婚，但总使自己身边围着一群追求者，希望以此证明自己的魅力。有时她甚至故意使一个男性对她产生幻想，然后折磨他，她说，“我常常处心积虑好几天整一个男人”，把男人弄得痛苦不堪，她却因此十分开心。

浪漫型独身者当中有些人是为了事业而选择独身生活的。例如一位年轻的电影工作者说：“我对名誉地位看得特别重要，要出人头地。我想让人们崇拜我、议论我。”

浪漫型独身者的共同特点是，他们绝没有世俗所谓“找不到对象结不成婚”的问题，只要他们愿意，就可以很快结婚，但是他们不愿放弃对爱情、对理想、或对事业的渴求，宁愿独自一人生活，也不愿向世俗的压力屈服，凑合结婚。

多数浪漫型独身者的性规范是：只要两人相爱就可以发生两性关系，不论结婚与否。他们往往都有与异性亲密交往的经历，其中也包括性关系。一位独身女性说：“有了三个男人的经验就没有贞节观念了。”另一位女性说：“贞操是送给男人的礼物，如男人因女人失贞而不爱她，那么这个男人也不值得爱。女人是否失贞男人连问都不该问。”他们不认为性欲是罪恶的，一位女性甚至强调性生活的“药用”作用，因为她曾看到有的书上写到，为了抗衰老就得有性生活。后来看到其他书上有性生活与健康无关的说法后，又有点后悔，觉得自己“浪

费了时间”。他们的性行为规范同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性行为规范相去甚远，前者随心所欲而把性看得比较轻；后者压抑严谨，但同时又把性看得极重。

2. 保守型（传统型）独身

保守型独身者（亦称传统型独身）往往是一般人眼中“找不到对象”的老姑娘或单身汉。他们或因本人“条件”较差，如相貌欠佳、家庭经济困难等难以成婚，或因客观原因，如上山下乡、工作调动等误过了适当的结婚年龄而结不成婚，陷入了所谓“大男大女”的窘境。

例如一位 42 岁的前女知识青年，1968 年去山西农村插队，当时“对结婚，恋爱这两个问题，甭说去实践，就是连想都不敢想。一个连自己生计都成问题的人，怎么能考虑成家的问题呢？”许多同她有相同经历的人们“就这样在人生最美好的青年时代远离了正常人的恋爱、结婚应有的欢乐，而且这种欢乐永远一去不复返了。”插队近 7 年后，好不容易都快 30 岁了，她才进厂当了一名学徒工，第一次领到了不到 20 元钱的工资，起码吃饭不再向家里伸手了。可是年龄比她小的知青也陆续找对象结婚了，她比他们大几岁，又多念了几年书（1966 届高中生），这对成家来说，反倒成了障碍。她几经努力，由县城调省城，直到落实政策回到北京。然而，“人是在年轻的时候恋爱结婚，就像花一样在暖和的季节里开花，到冷天就开不了花了”。她的婚姻生活就这样成了一片空白。这是典型的外因促成的独身。

我们的社会中也确有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难以成婚的独身者。不仅在农村有大批这类“光棍汉”，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的底层市民中也有这种情况。一位男性独身者因父母收入少，

家庭兄妹多，长期处于经济十分拮据的境地。他举例说，年轻时想谈恋爱，真的就连请女朋友吃顿饭、买张影剧入场券的钱也没有，还谈什么朋友呢？他心中曾有婚恋的“偶像”，但明知找她谈恋爱“不现实”，只好忍痛作罢。属于这类情况的在大城市中毕竟只是少数。

还有一种情况是因数次恋爱不成功耽搁下来，难以成婚。有一位男性独身者谈过三次恋爱，但都没有成功，他并非没有后悔感，说：如果那次我答应了那个姑娘，也许早就结婚了。一位女性独身者曾与一个小她 9 岁的男性恋爱，曾决定嫁给他，但遭到家长的坚决反对，加上她一时成了单位的新闻人物，各种非议和压力压得她抬不起头，甚至一度想过轻生，终于“非常不争气地放弃了此人”。她悲愤地说：“结婚是为了完成一项任务，要让双方父母、让周围人、让社会满意了，最后才能轮到自己！”

此外还有一种由性意识晚熟和为事业献身造成的独身。有一位近 50 岁的女同志，年轻时“全力以赴投入工作”，对别人介绍的对象从不放在心上，“觉得是累赘、麻烦”，工作时想好好工作不愿谈恋爱，学习时想好好学习也不愿谈恋爱，认为年纪轻轻的惦记着搞对象是“没志气、没劲”，因此至今未婚。她对单位某些人居然造谣说她结过婚，大为光火，说：“我 48 年一直堂堂正正，是个纯洁的姑娘，为什么遭此诽谤？”

保守型独身者大多认为，只有已婚者才能与异性建立亲密关系，不结婚理所当然不能发生性关系。他们当中有的已是性欲全无，他们说：“人何必非要这样，为这个找对象太无聊”，但也有人渴望温情，希望满足欲望，但又受到自己严格的性行为道德规范的束缚，不得不采取自慰的方法，而对这种方法同样存在矛盾心理，不断受到内心道德观念的折磨，心理难以取

得平衡。这种人是独身者中最感痛苦凄凉的一群。然而，如果以为独身者的境况全都如此凄惨，那就是以偏概全了。

独身（三）：对同性有兴趣

调查对象中有几位之所以选择了独身生活方式是由于他们只对同性有兴趣而对异性无兴趣。由于不像在某些社会中两个同性可以缔结婚约，他们只好保持独身。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这种由于对同性有兴趣对异性无兴趣而保持独身的人当中，有些是有意识地做出这种选择的，有些则是无意识或下意识地做出这种选择的。

一位有意识做出这种独身选择的男性在回答“你最早是什么时候想到要终生不结婚的”这一问题时说：“当我意识到自己对男性比对女性感兴趣时就想到了，那时是 20 岁上下。”

有些人或者是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兴趣的性别指向，或者是由于这种倾向过于为一般社会规范所不容而有意无意地压抑了自己的意识。我们可以从他们的个案生活史中分析出这种或许连他们自己也没有明确意识到的倾向。例如有一位独身男性说：“我认为跟那些女流之辈生活在一起是不会幸福的。”他将女性概括为几种类型：一种他称为“隐瞒型”的，即用艺术加工美化自己，掩饰自己的真实面貌，以为自己漂亮就会招男人喜欢，他嫌恶地说：“看到她们描眉画眼圈我简直要呕吐！”另一种是“外热内冷型”的，用人时才对人好，不用人时对人不好。第三种是“逢场作戏型”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无视双方友情的珍贵而滥用之。上述类型概括中肯与否另当别论，这位男性独身者对女性的厌恶之情却溢于言表。与此同时，他视为知音的最好的朋友是一位同性。在回答“谁最理解你的独身选择”和“谁最支持你这样做”这两个问题时，他都答是这位

同性朋友，还说：“他想和我一样过独身生活，如果走投无路就一起去出家。”

这类独身者有时也会去会见异性，但多是为了敷衍家人或朋友。例如一位独身女性说：“我和不少异性见过面，多是男方不同意，我不遗憾——反正不是我不同意”。在一般两性接触情况下，如果是男方不同意继续谈下去，女性会觉得自尊心受伤害，甚至会有受辱的感觉，但这位女性非但没有受辱感，反而因对方不同意感到如释重负，可见她去见异性并不是真对他们感兴趣，想谈成，于是，谈不成对她来说是正中下怀。这位女性还提到不能接触异性身体，一旦接触（哪怕是无意）“就觉得毛骨悚然”。而她最好的朋友也是同性，在她那里“感觉到一种异乎寻常的默契和温暖”。这种情况在我们看来属于下意识的同性恋倾向，虽然当事人本身也许尚未明确意识到这一点。

结论

这项调查以独身者与独身现象为观察对象，概括地描述了三种主要类型的独身现象，其中包括对男女两性均无兴趣的独身，对异性感兴趣的独身和对同性感兴趣的独身。调查发现，对异性感兴趣的独身很有可能是暂时的假性的独身。这类独身中又可分为浪漫型（先锋型）和保守型（传统型）两种。用世俗的话来说，前者是不愿结婚的，后者是结不成婚的。

由于独身现象是一种偏离主流文化和主流生活模式的选择，人们往往视之为怪异。善良的人对独身者持同情怜悯的态度，不那么善良的更有持蔑视的居高临下态度者。然而，无论是鄙视还是同情都不是对待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的选择的正确

态度。正确的态度是平等地看待它，因为人有权利做出不同的选择。

目前的一些做法助长了对独身者的偏见和歧视。例如住房政策。不少单位让独身者长期住单身职工宿舍，至少要等到某个岁数（40岁或45岁）才能像结婚的人那样分配到住房。这种政策虽然表面上看是住房紧张所致，实际上却含有深刻的文化（观念）内容。在中国人看来，没有结婚的单身者就没有“成家”，单身家庭这个在家庭社会学中被广泛采用的词组（而且这种家庭形式在其他许多文化中占相当大的比例）在中国人看来是由两个互不相容的字眼组成的，因而自相矛盾：是单身就不是家庭，是家庭就不是单身。这种观念不仅落伍且十分残酷，它剥夺了单身者建立家庭生活的基本权利，剥夺了他们建立一个不受他人干扰的单身生活小天地的起码条件：一小块属于自己的空间。大多数独身者（除了住房无困难者）对此感到十分悲愤，认为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有一位42岁的独身女性写道：“生活上的最大困难是住房问题，连鸟还有个窝，何况人呢？难道只有结婚成家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惟一途径吗？”

独身者做出的选择对他人对社会均无损害，他们应当得到物质上的公平待遇和观念上的平等对待。尤其在我国存在严重人口问题的现状中，更应考虑到独身生活方式的正面价值。就像一位独身者所说的那样，“我们这些人没给国家庞大的人口大军增添负担，社会给我们的待遇反而不如给社会多增加人口负担的人，这难道公平吗？”一个文明程度较高的社会是能够平等对待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的现象和人的社会，而对这些现象和人们的任何不公正、不宽容只能是野蛮和不文明的证据。这一点也可以说正是我们做独身现象研究的初衷和归宿。

参考书目：

- 奥斯特姆 (Austrom, D.R.)：《独身的后果》，朗彼得出版社，1982 年。
- ② 巴奎特 (Bequaert, L.H.)：《独身女性》，比肯出版社，波士顿，1976 年。
- 鲍克特 (Borchert, S.D.)：《单身者组织中与单身身份及母亲身份有关的两性区别》，《密西根学会会员》，1982 年总 14 期，第 369—378 页。
- 卡甘 (Cargan, L.)：《单身与已婚 它们是不同的》，为北中部社会学会 1979 年会提交的论文。
- 卡甘等：《对单身者中从未结婚者、离婚者与重复离婚者孤独状态及健康状况的比较研究》，为社会问题研究协会第 34 届年会提交的论文，1984 年。
- ⑥ 考克拉姆 (Cockrum, J.) 等：《影响从未结过婚的男性和女性的生活满意度的因素》，《家庭关系》，1985 年总 34 期，第 551—556 页。
- ⑦ 康纳尔 (Cornell, L.L.)：《日本为何没有老处女》，《家庭史杂志》，1984 年总 9 期，第 326—335 页。
- ⑧ 丹次格 (Danziger, S.E.)：《独身身份：独身成年人及独身者社会组织的利用》，为北中部社会学会 1981 年会提交的论文。
- ⑨ 海洛德 (Herold, E.S.)：《年轻单身女性的避孕行为》，《青少年杂志》，1981 年总 10 期，第 233—242 页。
- ⑩ 凯斯 (Keith, P.M.)，《两种独身模式》，《国际家庭社会学杂志》，1980 年总 10 期，第 301—310 页。
- ⑪ 洛温斯坦 (Loewenstein, S.F.) 等：《对中年独身女性满意度和紧张度的研究》，《性角色》，1981 年总 7 期，第 1127—1141 页。
- ⑫ 摩根哈根 (Mergenhausen, P.M.) 等：《尽我们的本分：婚姻状态与死亡率之间的近期变化》，《社会学与社会研究》，1985 年

- 总 70 期 ,第 53—56 页。
- ⑬ 波尔纳(Pollner, M.):《宁死不结婚》,《社会政策》,1982 年总 13 期 ,第 28—31 页。
- ⑭ 塞梅诺尔(Simenauer, J.)等:《独身者;新型美国人》,西蒙与斯库斯特出版社,纽约,1982 年。
- ⑮ 施莱辛格(Slesinger, D.P.)等:《使单身女性陷入贫困的决定因素》为乡村社会学会 1986 年会提交的论文。
- ⑯ 斯泰因(Stein, P.J.):《独身》普莱梯斯公司,新泽西,1976 年,
- ⑰ 斯泰因:《独身生活:社会中的非婚成人》,圣马丁出版社,纽约,1981 年。
- ⑱ 斯托克(Stolk, Y.)等:《对独身女性的看法》,《性角色》,1981 年总 7 期 ,第 73—78 页。
- ⑲ 孙晓:《中国婚姻小史》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 年。

第五篇 婚前性行为规范

引言

婚前性行为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都是一个敏感的题目。在中国做这一研究恐怕比在西方更困难一些，这是历史、文化传统以及事态发展的现状造成的。在西方国家，虽然一般的社会规范是不赞成婚前性行为的，欧洲的中世纪和美国的清教时期对这种行为的制裁也是相当严厉的，但欧洲经过了文艺复兴，美国的清教时期也早已成为历史。社会舆论对婚前性行为比其他越轨行为，如婚外性行为、同性恋行为等等要宽容得多。因此，当调查者向研究对象询问对婚前性行为的看法以及他自身的经验时，就比较容易得到真实的情况。显然，当人们对某一行为的好坏并无明确看法或看到周围许多人都有这一行为时，则较易提供自己关于这一行为的真实看法及自己的真实情况，反之，当舆论对某一行为有苛刻的评论或人们以为只有少数人像自己一样时，则不愿讲真话，我想这会是研究将遇到的一个重大障碍。

然而，婚前性行为在中国社会中是存在的，因此应当研究这种现象。此外，正因为我们对中国人行为的这个方面的基本

情况还几乎一无所知——例如有多大比例的人有过这种行为，造成这一行为的原因、对这一行为的看法如何等等——这个研究就显得更有必要而且更有意思了。

在国外有大量关于婚前性行为的研究，它们普遍采用的一个度量术语为 Sexual Permissiveness，可译作“性容许程度”，意为对性行为的容许程度。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可大略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态度的研究，即人们对婚前性行为的看法，另一类是关于行为的研究，即人们的亲身经历。（此外也有少量将态度与行为加以比较的研究，因为二者往往存在差异，态度开放而行为却比较拘谨。）本篇计划就这两个方面进行研究。

阅读有关这一问题的文献时发现，70年代美国学术界曾有过关于美国社会是否在经历一场“性革命”的争论。一些学者持肯定态度，如克里斯坦森（Christensen, H.T.）在国际社会学会第九届会议上提交了以“美国性革命的最新数据”为题的研究报告，以中西部大学1956年、1968年和1978年的三次调查为依据提出：第一，“性革命”在美国不但正在延续而且可能加速，第二，女性的性开放速度超过男性，最终可能达到与男性相仿的开放程度，而过去一向是女性比男性保守的（克里斯坦森，1978年）

另一派意见否认美国存在“性革命”。戴波蒂（Diepold, J.h.）等人在综合分析了20项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后得出结论：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间，青少年的性行为有所改变但相对稳定。虽然有婚前性经验的人比例大了一些，年龄提前了一些，但并不存在什么“性革命”。（戴波蒂，1979年）艾丽亚斯（Elias, J.E.）以印第安那大学性研究所（这个研究所是由著名的金西博士创建的）1974至1978年的调查数据为依据，研究了青少年是否在经历“性革命”、色情传播媒介对青少年的影响，

及性教育与青少年态度行为模式的关系等问题，得出以下结论：第一，青少年在性态度上比父辈更开放了一些，但行为上区别不大，第二，对色情传播媒介的接受程度男性比女性大得多，且接受程度受社会阶层的影响，即社会阶层越低的人接受程度越高，第三，同性伙伴群是性教育的主要来源，异性伙伴群次之，再次为学校教师，家长的作用很小——母女关系例外，母亲对女儿的主要做法是告诫她们婚前性行为是罪恶的。总的来说，青少年对婚前性行为的态度是健康的。（艾丽亚斯，1978年）

中国的情况如何？中国人对婚前性行为的态度是始终如一的还是有了改变？行为方面又有哪些特点？这些态度和行为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这些就是本项研究要探讨的问题。

文献综述

1. 关于态度的研究

在对婚前性关系态度的研究中，瑞斯（Reiss, I.L.）的理论引人注目，这是因为：第一，他研究做得早，早在 60 年代就指出这是一个被社会学界所忽略的问题，第二是因为他提出了比较“漂亮”的理论，并因而引起许多争论。在一门科学研究的初创阶段，理论往往容易“漂亮”，那是因为它离实际情况距离较远，可以做出“漂亮”的抽象与概括。一旦研究深入之后，实际情况知道得多了，理论往往就不那么“漂亮”了。瑞斯的理论有两个命题：第一，婚前性容许程度与社会地位有相关关系，他假定社会地位越高者婚前性容许程度越低，但后来的研究并未证实这一假设。第二，婚前性容许程度与一

个人政治观点上的开放程度呈正相关关系，与保守程度呈负相关关系。（瑞斯，1965 年）在后来的研究中，他的理论被许多人反复提及，其中不乏支持者，但持反对意见的人更多。如贝叶（Bayer, A.E.）的研究表明，性容许程度与社会经济地位无关。（贝叶，1976 年）弥顿道普（Middendorp, C.P.）也声称自己的研究数据与瑞斯理论不相符。（弥顿道普，1974 年）

辛格（Singh, B.K.）将自己的研究报告题名为“对婚前性关系看法的变化趋势”，这项研究是在全国民意测验中心 1972 至 1978 年的五次调查数据的基础上进行的。他发现，对婚前性关系的肯定态度呈上升趋势，各个社会阶层、性别，种族之间的态度差异在缩小。他因此提出，应当重新考虑关于婚前性容许程度的理论框架，他预言了婚前怀孕与人工流产的上升趋势（辛格，1980 年）

马霍尼（Mahoney, E.R.）在一项关于不同年龄组婚前性容许程度区别的研究中发现，最年轻的年龄组（18—29 岁）性容许程度最高，而 30—39 岁年龄组的态度变化幅度最大，向接近 18—29 岁年龄组的方向发展。他在另一项研究中检定了以下三项假设：第一，婚前性容许程度在 1972—1975 年间有所提高，这一假设得到了证明，第二，社会阶层越高婚前性容许程度也越高，这一假设没有得到证实，第三，女性与男性相比，性容许程度提高得快些，结果是这一点并不明显。只在某些社会阶层中才存在这种关系。（马霍尼，1978 年）

安东诺夫斯基（Antonovsky, H.F.）等人在对以色列青少年的调查中特别研究了吉布兹人（Kibbutz）与非克布兹人的区别。他们发现克布兹人的婚前性容许程度较高：76% 的男青年认为，只要有感情即可发生性关系，55% 的女青年亦持此观点。而在非克布兹人中，有 66% 的男性认为，只有已婚或

即将成婚的人之间发生性关系才是正确的，其他情况下是错误的。（安东诺夫斯基，1980年）

纳米洛夫斯基（Nemirovsky, D.E.）于1978和1979年在苏联所做的一项抽样调查表明，38%的调查对象对婚前性关系持肯定态度，58.4%的人反对，3.1%的人不置可否。其中男性有43.6%持肯定态度，女性有33.5%持肯定态度。作者认为最富启发性的回答来自那些把婚前性关系与爱情的表达联系在一起后才对这一行为加以肯定的人。（纳米洛夫斯基，1982年）

拉斯科（Raschke, V.）的研究对比了中、美两国青少年对婚前性关系的态度。他使用了三个样本，一个是香港的大学生，一个是美国大学生，第三个是在美的中国留学生。研究假设有三：一是中国学生比美国学生性容许程度要低，二是中国学生比美国学生婚前性行为活跃程度低，三是中国学生的男女双重标准比美国学生程度高。三项假设全部得到证实，并且发现留美中国学生的观点有向美国学生靠拢的趋向。（拉斯科，1976年）

在关于婚前性容许程度的研究中，人们常常提到“双重标准”这一概念，即对男女的不同标准，认为男人可以比女人更开放一些。例如泽曼（Szeman, Z.）在对匈牙利北部一个村庄的研究中发现，那里的传统习惯是严格禁止女性婚前性行为的，但对男性却很宽容。这一双重标准的维护和传播不是靠学校，而是靠家庭。调查还表明，城市比农村更快地消灭了这种双重标准。（泽曼，1985年）

2. 关于行为的研究

瑞凯特（Reichelt, P.A.）在1979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中

宣称，美国有 350 万性生活活跃的未婚女人（15—19 岁），她们多数属于中产阶级。他的样本中的未婚女性有 92% 发生过性关系，86% 在调查时还有性生活，60% 以上在 15 岁和 16 岁发生第一次性交（瑞凯特，1979 年）

科肯戴尔（Kirkendall, L.A.）在《婚前性行为与人际关系》一书中采用深入访问个案史的方法对 200 名 17 至 20 岁的男性做了调查。他将婚前性行为分为六个层次来研究：（1）嫖妓，（2）pick-up，指随便找一个伴，纯为性交，没有感情卷入，（3）偶然相识者，双方以性交为主，男方无感情卷入，（4）恋爱对象，先交朋友之后才想到性交可能性，（5）关系很深的恋爱对象，性交时有大量感情卷入，（6）未婚夫妻，有强烈感情联系。（科肯戴尔，1965 年）

汤玛斯（Thomas, D.R.）在澳大利亚大学生中的抽样调查表明，45% 的男性与 27% 的女性有婚前性行为。他还发现，影响婚前性行为的因素包括较低的保守程度、较高的性容许程度，以及较少参加教堂活动和较低的宗教信仰程度。（汤玛斯，1975 年）

克莱门特（Clement, U.）等人 1984 年在西德的 13 所大学就男女在婚前性行为上的区别做了一次调查，这是继 1966 年一次类似调查之后的重复调查。调查结果发现：（1）在手淫行为上男女的区别降低了，（2）在性交行为上男女颠倒过来，女性比男性开始的时间早并更为活跃，（3）在同不确定关系者发生性行为方面男女的区别消失了，（4）女性婚前性容许程度比男性高，而在 1966 年是男女持平。（克莱门特，1984 年）

斯科特（Scott, R.A.）在以“婚前性关系：社会心理分析”为题的博士论文中研究了婚前性行为与宗教信仰，家庭关系、性欲、个性，教育程度及年龄的关系。（斯科特，1960

年)在我对影响婚前性行为的因素的研究中参考了这一研究。

研究设计

我所从事的这项研究的样本是根据简单随机抽样原则从北京 1000 万人口中抽取的,但不包括农村户口及 16 岁以下的人口。具体地说,我们首先在北京 16 岁以上人口每人一张的口卡中完全随机地抽出 1550 人(如抽中的人为农村户口则取离其最近的非农业户口者)。在问卷发放前,由于考虑到有些年龄小的人可能尚未结婚,难以回答关于婚前性行为的问题,所以又剔除了 1961 年以后出生的 500 多人。在实际寄出的 1000 份问卷中,其中有 147 份问卷因地址不详或搬迁被邮局退回,还有 4 人因未婚或年龄太大退回了问卷,共收到有效问卷 547 份,回收率为 64%。这在社会学的调查中已经达到可被用作推论总体的依据的要求(一般认为 50% 的回收率即可使用,60% 的回收率已属上乘)。因此可以有把握地说,由这个样本所得到的数据能够推论到北京 1961 年以前出生的已婚的全体非农业人口。

样本中调查对象的基本状况被当做此项研究的自变量,共 16 项,其中主要变量的分布状况如下:

1. 性别	男	54.5%
	女	45.5%
2. 出生年	早于 1919 年	2.4%
	1920 ~ 29 年	8.0%
	1930 ~ 29 年	22.2%
	1940 ~ 49 年	23.1%

	1950-60 年	44.3%
3. 民族	汉族	94.3%
	少数民族	5.7%
4. 籍贯	北京	38.7%
	北京以外	61.3%
5. 出生地	北京	55.6%
	北京以外	44.4%
6. 政治面目	共产党员	30.1%
	民主党派和非党群众	69.9%
7. 教育程度	文盲	1.8%
	小学	14.8%
	中学（初高中、中专，中技）	57.9%
	大学以上	24.4%
8. 职业	无工作	3.1%
	工人	51.6%
	知识分子	15.9%
	干部	24.7%
	军人	1.1%
	农民	0.4%
9. 收入	每月 100 元以下	47.3%
	每月 101 元以上	52.7%

依变量共 15 个，其中包括 9 个婚前性容许程度的变量和 6 个自身行为变量。

9 个婚前性容许程度变量是对“您认为男女在婚前可不可以有下列行为？”这一问题的封闭式选择答案：

1. 如果两人已经确定关系（决定要结婚），可不可以接吻？（可以，不可以）
2. 如果两人相爱（还没决定结婚），可不可以接吻？（可

以，不可以)

3. 如果两人偶然互相吸引，可不可以接吻？（可以，不可以）
4. 如果两人已经确定关系，可不可以拥抱？（可以，不可以）
5. 如果两人相爱，可不可以拥抱？（可以，不可以）
6. 如果两人偶然互相吸引，可不可以拥抱？（可以，不可以）
7. 如果两人已经确定关系，可不可以发生性关系？（可以，不可以）
8. 如果两人相爱，可不可以发生性关系？（可以，不可以）
9. 如果两人偶然互相吸引，可不可以发生性关系？（可以，不可以）

6个自身行为变量包括调查对象同爱人之间在婚前有无约会、交换情书、拉手、接吻、拥抱或发生性关系等行为。

数据分析采用三种方法。第一种是对人们婚前性容许程度及自身行为的基本描述（变量分布）。第二种是卡方检定，看每个依变量都受到哪些自变量的影响，从而确定是哪些因素在决定着人们的婚前性容许程度及自身行为。第三种方法是对数线性回归，用以确定几个主要自变量对依变量影响的程度。

研究的基本假设为：(1) 出生年越晚的人婚前性容许程度越高，且婚前性活动越多，(2) 社会经济地位（包括职业、教育程度，家庭状况等）越高的人婚前性容许程度越高，且婚前性活动越多。

研究结果

第一部分 基本状况描述

关于婚前性容许程度的状况见表一：

表一表明：第一，总的看来人们对婚前性活动的态度相当严厉，也就是婚前性容许程度相当低。有 68.7% 的人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即便确定了关系准备结婚）都不能有婚前性行为，有 14.3% 的认为连拥抱接吻也不可以。第二，人们对婚前拥抱和接吻比对发生性关系的容许程度要高得多。第三，对拥抱比对接吻的允许程度略高一些，这一点同西方人的顺序不同，西方人一般认为拥抱比接吻更严重，而中国人似乎持相反态度。第四，婚前性容许程度在两人确定关系的情况下最高，两人相爱但尚未决定结婚者次之，而对两人偶然互相吸引这种情况要比前两种情况的态度严厉得多。有 30.5% 的人认为在两人关系确定后可以发生性关系，而能够容忍偶然互相吸引的情况下发生的性关系的人只有 2.7%，也就是说，虽然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并不绝对反对婚前性行为（只要随后结婚就可容忍），但几乎所有的人都反对不以结婚为目的及没有爱情的婚前性行为。上述回答反映了中国社会在婚前性活动问题上的规范。

表一 婚前性容许程度（比例）

		可以	不可以	不置可否
两人确定关系	——接吻	84.8	14.3	0.9
	——拥抱	84.8	14.8	0.4
	——发生性关系	30.5	68.7	0.7
两人相爱	——接吻	53.6	46.1	0.4
	——拥抱	66.5	33.1	0.4
	——发生性关系	11.3	88.1	0.5
两人偶然互相吸引	——接吻	12.2	87.0	0.7
	——拥抱	14.3	85.0	0.7
	——发生性关系	2.7	96.7	0.5

表二是人们自身的婚前性活动：

表二 婚前性活动（比例）

婚前性活动	有	没有	不回答
约会	86.1	13.2	0.7
交换情书	48.6	49.5	1.8
拉手	79.0	20.5	0.5
接吻	63.8	35.3	0.9
拥抱	68.0	31.4	0.5
性关系	15.5	83.0	1.5

从表二可以看出：第一，大多数人在婚前都有约会和拉手

的行为，这至少表明，在北京这样的中国大都市中，传统的男女授受不亲和婚前双方根本不见面甚至不认识的情况已经基本改变了。第二，半数以上的人在婚前有拥抱接吻的行为，其中拥抱比接吻的比例略高。即使如此，仍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在婚前没有拥抱和接吻，这在西方文化中是难以想象和根本没有的。第三，男女双方交换情书者不到一半，这一点也许受到教育程度的影响。是否如此，在第二部分的相关分析中可加验证。第四，尽管有 30.5% 的人持容许婚前性行为的态度，但在行为上这个比例减了一半——只有 15.5% 的人承认自己有过婚前性行为。这个数字有可能比实际的情况低，因为社会规范和道德标准对婚前性行为一般是持反对态度的，这就会导致某些人不愿承认自己有过此类行为。从另一角度看，15.5% 这个比例虽然不很大，但是在严厉的道德环境压力下，特别是与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道德标准相比，还是相当惊人的。

第二部分 卡方检定

经过卡方检定，在 16 个自变量中发现有 5 个对依变量的影响最大，它们是出生年，教育程度，职业，母亲教育程度和母亲职业。现分别叙述如下：

1. 出生年的影响

卡方检定的结果表明，出生年对 15 个依变量中的 14 个都有影响，其影响具有统计的显著性 ($P < .05$)。

表三 出生年对婚前性容许程度及行为的影响

态度及行为	X ²	DF	P
态度：确定关系后可接吻	47.08	1	.0000
相爱可接吻	45.71	1	.0000
偶然吸引可接吻	12.05	1	.0005
确定关系后可拥抱	44.28	1	.0000
相爱可拥抱	58.85	1	.0000
偶然吸引可拥抱	13.20	1	.0003
确定关系后可发生性关系	40.17	1	.0000
相爱可发生性关系	25.85	1	.0000
偶然吸引可发生性关系	10.15	1	.0014
行为：约会	54.50	1	.0000
拉手	82.71	1	.0000
接吻	88.00	1	.0000
拥抱	81.22	1	.0000
性关系	23.97	1	.0000

出生年的分组是以 1947 年为界，将样本分为 1947 年以前出生的年长组和 1948 年以后出生的年轻组。细看卡方检定的数据，14 项相关关系无一例外是年轻组超过了期望值（二变量不相关的期望值），也就是说，在婚前性容许程度的 9 个问题中，年轻组中持容许（选择“可以”）态度的大大超过期望值，而年长组中持不容许（选择“不可以”）态度的大大超过期望值，在 5 个自身婚前性行为的变量中，年轻组中有过此类

行为的人数超过期望值，而年长组中没有过此类行为的人数超过期望值。

这一分析结果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年轻人对婚前性行为的容许程度大大超过年长者，而且其婚前性活动的开放程度也大大超过了年长者。也许有人会对这一发现兴高采烈，以为中国人（确切地说是北京人）终于有了现代的味道，也许有人会因此痛心疾首，以为是礼崩乐坏、人心不古。但事实毕竟是事实，对它做出的价值评价不能掩盖事实本身的绝对重要性。

2. 教育程度的影响

不失为一个有重要影响的自变量。

表四 教育程度对婚前性容许程度及行为的影响

态度及行为	χ^2	DF	P
态度：确定关系后可接吻	10.26	1	.0014
相爱可接吻	11.20	1	.0008
确定关系后可拥抱	11.13	1	.0009
行为：约会	7.49	1	.0065
交换情书	48.35	1	.0000
拉手	12.20	1	.0005
接吻	17.83	1	.0000
拥抱	14.76	1	.0001

教育程度的划分是以大学以上为一组，以中学（包括初

中、高中、中专、中技) 以下为另一组。表四中显示出来的相关关系都是教育程度高的一组超过期望值, 也就是说, 在婚前性容许程度上, 教育程度高的人与教育程度低的人有显著差异, 前者持宽容(“可以”) 态度, 后者持严厉态度。在自身婚前两性交往活动方面, 也是教育程度高的人比教育程度低的人开放。一个有趣的现象是, “交换情书” 这一变量的卡方值特别大, 其中大学以上教育程度的人有这种行为的大大超过了中学以下教育程度的人。可以由此得出教育程度高者在婚前更注重精神交流的结论。

3. 职业的影响

职业这一变量的划分是以干部、知识分子为一组, 其他职业为另一组, 所得分析结果如表五:

表五 职业对婚前性容许程度及行为的影响

态度及行为	X^2	DF	P
态度: 确定关系后可接吻	5.28	1	.0210
确定关系后可拥抱	6.78	1	.0092
行为: 约会	11.42	1	.0007
交换情书	30.97	1	.0000
拉手	11.10	1	.0000
接吻	13.87	1	.0002
拥抱	11.01	1	.0009

在职业与婚前性容许程度及行为的相关关系中, 干部知识

分子一组中持宽容态度的人超过期望值，有此类行为的人也超过期望值，而其他职业者中对婚前性关系持严厉态度及有过上述种种与异性接触行为的人数则低于期望值。

4. 母亲教育程度的影响

母亲的教育程度是以中学以上为一组，小学以下为另一组划分的。母亲的教育程度对调查对象的婚前性容许程度及行为有重大影响：

表六 母亲教育程度对婚前性容许程度及行为的影响

态度及行为	X^2	DF	P
态度：确定关系后可接吻	22.35	1	.0000
相爱可接吻	26.77	1	.0000
确定关系后可拥抱	16.95	1	.0000
相爱可拥抱	26.12	1	.0000
偶然吸引可拥抱	4.73	1	.0296
相爱可发生性关系	7.65	1	.0057
行为：约会	26.98	1	.0000
拉手	23.95	1	.0000
接吻	34.40	1	.0000
拥抱	36.96	1	.0000

在母亲教育程度较高的人中，婚前性容许程度高于期望值，婚前两性接触行为的频数也高于期望值，母亲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则相反。这说明，家庭的教养、特别是母亲对子女道德

观念及行为的影响是相当大的。

5. 母亲职业的影响

母亲的职业以干部知识分子、工人为一组，其他人为另一组。这一自变量对依变量影响极大，仅次于年龄的影响（表七）：

表七 母亲职业对婚前性容许程度及行为的影响

态度及行为	X^2	DF	P
态度：确定关系后可接吻	22.38		.0000
相爱可接吻	39.71	1	.0000
偶然吸引可接吻	22.69	1	.0000
确定关系后可拥抱	14.92	1	.0001
相爱可拥抱	36.72	1	.0000
偶然吸引可拥抱	22.32	1	.0000
确定关系后可发生性关系	22.80	1	.0000
相爱可发生性关系	26.06	1	.0000
偶然吸引可发生性关系	3.85	1	.0499
行为：约会	24.75	1	.0000
拉手	40.37	1	.0000
接吻	63.56	1	.0000
拥抱	57.78	1	.0000
性关系	8.51	1	.0035

母亲职业地位高的人一般家境较好，而家境较好的人比起家境差的人婚前性容许程度高，自身各种婚前性活动的频数也高于期望值。这一发现说明，在我们的社会中，大体上说，社会地位越高家境越好的人越倾向于对婚前性活动持宽容态度。

第三部分 对数线性回归分析

对数线性回归分析的三个自变量为出生年（Y）、教育程度（E）和职业（O），依变量分为态度和行为两类。从第一、二部分分析的 9 个态度变量中选取最有代表性的三个，即对在双方相爱的情况下可不可以接吻（A）、拥抱（B）或发生性关系（C）这三个问题的回答，从 6 个行为变量中也选取了最有代表性的三个，即有无接吻（K）、拥抱（H）和婚前性关系（S）这三个变量。

使用统计软件 SPSS 对数线性回归程序筛选出来的 6 个最佳模型及其参数如表八。有关最佳模型及对数线性回归的推导公式在第一篇附录中已有详细说明，表中最佳模型是通过对数线性回归筛选出来的能够对上述婚前性容许程度及婚前性活动做出最佳解释的数学模型。括号内的数值为从对数还原出来的真数。对表中参数的详细解释见紧随表后的六点讨论。

表八 最佳模型及其参数

1. 对婚前接吻的态度

最佳模型：AYE, YO, EO

$$\begin{array}{l}
 Y \left\{ \begin{array}{ll} \omega_1 = .706 & (2.08) \\ \omega_2 = -.706 & (.49) \end{array} \right. \\
 E \left\{ \begin{array}{ll} \omega_1 = .564 & (1.76) \\ \omega_2 = -.564 & (.57) \end{array} \right.
 \end{array}$$

$$Y \cdot E \begin{cases} \omega_{11} = .207 & (1.23) \\ \omega_{12} = -.207 & (.81) \\ \omega_{21} = -.207 & (.81) \\ \omega_{22} = .207 & (1.23) \end{cases}$$

2. 对婚前拥抱的态度

最佳模型：BYE, EO, YO

$$Y \begin{cases} \omega_1 = .951 & (2.59) \\ \omega_2 = -.951 & (.39) \end{cases}$$

$$E \begin{cases} \omega_1 = .316 & (1.37) \\ \omega_2 = -.316 & (.73) \end{cases}$$

$$Y \cdot E \begin{cases} \omega_{11} = .406 & (1.50) \\ \omega_{12} = -.406 & (.67) \\ \omega_{21} = -.406 & (.67) \\ \omega_{22} = .406 & (1.50) \end{cases}$$

3. 对婚前性关系的态度

最佳模型：EO, CY, CO, YO

$$Y \begin{cases} \omega_1 = .555 & (1.74) \\ \omega_2 = -.555 & (.57) \end{cases}$$

$$O \begin{cases} \omega_1 = .261 & (1.30) \\ \omega_2 = -.261 & (.77) \end{cases}$$

4. 婚前接吻

最佳模型：KYO, KE, EO

$$Y \begin{cases} \omega_1 = .837 & (2.30) \\ \omega_2 = -.837 & (.43) \end{cases}$$

$$E \begin{cases} \omega_1 = .472 & (1.60) \\ \omega_2 = -.472 & (.62) \end{cases}$$

$$O \begin{cases} \omega_1 = .228 & (1.26) \\ \omega_2 = -.228 & (.80) \end{cases}$$

$$Y \cdot O \begin{cases} \omega_{11} = .184 & (1.20) \\ \omega_{12} = -.184 & (.83) \\ \omega_{21} = -.184 & (.83) \\ \omega_{22} = .184 & (1.20) \end{cases}$$

5. 婚前拥抱

最佳模型：HYO, EO, HE

$$\begin{aligned} Y & \begin{cases} \omega_1 = .802 & (2.23) \\ \omega_2 = -.802 & (.45) \end{cases} \\ E & \begin{cases} \omega_1 = .436 & (1.55) \\ \omega_2 = -.436 & (.65) \end{cases} \\ O & \begin{cases} \omega_1 = .221 & (1.25) \\ \omega_2 = -.221 & (.80) \end{cases} \\ Y \cdot O & \begin{cases} \omega_{11} = .225 & (1.25) \\ \omega_{12} = -.225 & (.80) \\ \omega_{21} = -.225 & (.80) \\ \omega_{22} = .225 & (1.25) \end{cases} \end{aligned}$$

6. 婚前性行为

最佳模型：SYO, EO

$$\begin{aligned} Y & \begin{cases} \omega_1 = .337 & (1.40) \\ \omega_2 = -.337 & (.71) \end{cases} \\ O & \begin{cases} \omega_1 = -.204 & (.82) \\ \omega_2 = .204 & (1.23) \end{cases} \\ Y \cdot O & \begin{cases} \omega_{11} = .050 & (1.05) \\ \omega_{12} = -.050 & (.95) \\ \omega_{21} = -.050 & (.95) \\ \omega_{22} = .050 & (1.05) \end{cases} \end{aligned}$$

将各自变量的一对取值的影响做比较，可以对以上数据做出如下解释：

1. 在自变量对“婚前在双方相爱的情况下可不可以接吻”这一问题的回答的影响中，出生年这一变量有很大影响。通过计算得到，年轻者（1948年以后出生者）与年长者（1947年以前出生者）的比值之比为 4.2 (2.08/.49)，也就是说，一旦研究对象为年轻者，其持婚前在双方相爱的情况下可以接吻这一观点的机会是年长者的 4.2 倍。年轻者与年长者的这种显著区别反映了社会价值和道德观念的变化。

在这个态度依变量上，教育程度的影响略次于出生年的影响，大学以上教育程度的人与中学以下教育程度的人的比值之比为 3.1 (1.76/.57)，也就是说，一旦个案为具有大学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其持“婚前可以接吻”态度的机会是只有中学以下教育程度者的 3.1 倍。这说明教育程度越高对这种婚前性活动的容许程度越高。

2. 自变量对“婚前在双方相爱情况下可不可以拥抱”这一问题的回答有着更加显著的影响。其中出生年的影响最为显著，年轻者与年长者在这一变量上的比值之比竟高达 6.6 倍 (2.59/.39)，也就是说，一旦个案为年轻者，其对婚前拥抱持容许态度的机会是年长者的 6.6 倍。教育程度的影响不太明显——教育程度高的人与教育程度低的人的比值之比为 1.9 倍 (1.27/.73)，即一旦个案为教育程度高者，其持容许态度的机会是教育程度低者的 1.9 倍。

3. 在自变量对“婚前在双方相爱的情况下可不可以发生性关系”这一问题答案的影响中，出生年的影响仍较大，年轻者与年长者的比值之比为 3.1 倍 (1.74/.57)，即年轻者持容许态度的机会是年长者的 3.1 倍。教育程度高者与教育程度低者的比值之比为 1.7 倍 (1.30/.77)，即教育程度高者持容许态度的机会是教育程度低者的 1.7 倍。

4. 在自变量对婚前接吻行为的影响中，出生年的影响最大，其中年轻者与年长者的比值之比为 5.2 倍 ($2.30/.43$)，即一旦个案为年轻者，其有婚前接吻行为的机会是年长者时 5.3 倍。教育程度的影响次之，其中教育程度高者与教育程度低者的比值之比为 2.6 倍 ($1.60/.62$)，即一旦个案为教育程度高者，其有婚前接吻行为的机会是教育程度低者的 2.6 倍。职业的影响相比之下最弱，但也有统计学的显著性，其中干部知识分子与其他职业者的比值之比为 1.6 倍 ($1.26/.80$)，也就是说，一旦个案职业为干部知识分子，其有婚前接吻行为的机会是其他职业者的 1.6 倍。

5. 自变量对婚前拥抱行为的影响与对接吻行为的影响模式十分相似，其中出生年两个取值的区别为 2.4 倍，职业两个取值的区别为 1.6 倍。对这两个数字的解释与对接吻行为的解释大致相同。

6. 自变量对婚前性关系（指性交行为）的影响出现了有趣的反常现象。虽然出生年的两个取值的比值之比与前述所有现象一致（年轻者的比值为年长者比值的 2.0 倍），但职业的影响却翻转过来，其他职业者与干部知识分子的比值之比为 1.5 ($1.23/.82$)，即其他职业的人有婚前性行为的机会是干部知识分子的 1.5 倍。这一点与其他所有的分析结果相反。它揭示出，虽然职业地位高的人与职业地位低的人相比，在婚前性容许程度上多持宽容态度，甚至前者的婚前拥抱接吻行为也比后者为多（见表五），但是在婚前性行为这一点上却少于那些职业地位低的人。这说明，尽管婚前性容许程度在我们的社会中有所提高，或许还将继续提高（从年轻者与年长者，社会地位高者与社会地位低者之间的差异可以做出这种推断），拥抱接吻一类行为也为社会地位较高的人们所接纳并实行，但是人

们对婚前性交行为仍十分谨慎，尤其是那些职业地位较高的人更为谨慎。职业地位不同的人在婚前性行为上的区别反映了社会价值观的取向——职业地位高是受到社会价值观肯定的，而他们的行为说明，社会价值观及行为规范选择在婚前性行为上谨慎行事。

结 论

这项研究通过大量定量分析，检验并基本证明了下列研究假设：（1）出生年代越晚的人婚前性容许程度越高且其婚前性活动越多，（2）社会经济地位（包括职业，教育程度、家庭状况等）越高的人婚前性容许程度越高且其婚前性活动越多。惟一的例外是，在两性发生婚前性关系这一点上，职业地位低的人比起职业地位高的人做出这种行为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年轻人和年长的人在婚前性容许程度及婚前性接触活动上的显著差别无疑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首先它说明了社会观念、道德规范的改变，向着对婚前性活动持更宽容态度的方向转变。中国历来是一个规范的力量十分强大的社会，人们往往并不很在意法律（与西方社会相比，那里的人们在“只要不违法的事情都可以做”这一点上比我们强烈），倒会时时处处感到行为规范的压力。婚前性活动就是如此。中国道德中的“男女授受不亲”并不是说一旦接触就违反了法律，而是一种行为规范。研究结果表明，不仅大多数人认为在婚前两性间可以拥抱接吻，而且有近三分之一（30.5%）的人对婚前性行为持容许态度（略低于苏联的38%，见文献综述一节），更有15.5%的人坦直承认自己有过婚前性行为。持宽容态度和由此类行为的人中年轻者大大超过年长者这一事实反映了社会规范的变

迁。其次，它反映了在观念和行为上的代沟。年轻者和年长者之间的巨大差距除了社会观念变迁的因素，恐怕还有个人由年轻到年长后观念转向保守的因素。也许有些人在年轻时婚前性容许程度较高，随年龄增长，渐渐变得严厉起来，并非自始至终都持严厉态度的。

这项研究在婚前性容许程度与社会地位的关系上得到同瑞斯的理论假设刚好相反的结论。他的假设是：社会地位越高的人婚前性容许程度越低，而本项研究却发现，社会地位越高的人婚前性容许程度越高。这一区别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原因。由于中国是一个传统道德规范十分强大的国家，人们容易产生“越轨的冲动”，而与较为迟钝的人群相比，社会地位文化素质较高的人们会显得更敏感些。他们的敏感表现在对压抑的一般反抗。这种反抗在婚前性容许程度上就表现为宽容。

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同社会地位较低的人在婚前性容许程度及自身行为上的差异给我们的启示是：第一，社会价值观在选择对婚前性活动的宽容态度。因为较高的社会地位是全社会的人追求的目标，是得到社会价值观赞许的。处于这种地位的人对婚前性活动持宽容态度就明白无误地表达了社会价值观的选择。第二，社会地位较高的人的生活方式更接近于现代化的生活环境，由此可以做出推论：随着社会现代化过程的推进，婚前性容许程度会越来越高，人们的婚前性接触也会越来越普遍，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趋势（实际上也可以说它正是以全社会的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至于职业地位低的人婚前性关系较多这一现象则比较难于解释，它至少说明，职业地位高的人虽然在观念上较其他人开放，甚至对婚前拥抱接吻这些行为也可接受，但是在要“动真格”的时候却不如其他人那

么不考虑后果。尽管他们可以理解并容忍婚前性行为，但他们对这种行为的后果有更多的顾虑，他们担心的和能够失去的东西比社会地位低的人要多，因此不得不谨慎行事。

我们的社会正在经历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的时代。在婚前性活动这个触动社会道德“神经”的敏感问题上，人们的态度和行为正在向着越来越开放（liberal）的方向发展，这个趋势看来还会继续下去。

参考书目：

- 奥斯顿和塔克（Alston, J.P. & Tucker, F.）：《婚前性容许的神话》，《性研究杂志》，1973年总9期，第34—40页。
- ② 阿德（Ard, B.N.Jr.）：《婚前性经验追踪研究》，《性研究杂志》，1974年总10期，第32—29页。
- 贝叶（Bayer, A.E.）：《性容许程度的互动研究》，《婚姻与家庭杂志》，1976年总39期，第29—40页。
- 贝尔和科菲（Bell, R.R. & Coughy, K.）：《女大学生婚前性经验，1958年，1969年和1978年》，《家庭关系》，1980年总29期，第353—357页。
- 卡宾特（Carpenter, G.R.）：《婚前性关系的不同文化价值观》，普渡大学论文，1960年。
- ⑥ 克利斯坦森（Christensen, H.T.）：《美国性革命的最新数据》，国际社会学会第九届会议论文。
- ⑦ 克里斯托弗和凯科（Christopher, F.S. & Cake, R. M.）：《婚前性决定因素》，《性研究杂志》，1984年总20期，第363—376页。
- ⑧ 克雷顿和波克梅尔：（Clayton, R.R. & Bokemeier, J.Z.）；《七十年代的婚前性关系》，《婚姻与家庭杂志》，1980年总42期，第759—775页。
- ⑨ 克莱门特、斯科密特和克鲁斯（Clement, U., Schmidt, G. &

- Kruse, M.): 《性行为两性区别的变化: 西德大学生的重复研究》(1966 年—1981 年),《性行为档案》, 1984 年总 13 期, 第 99—120 页。
- ⑪ 德马利斯和莱斯利 (Demaris, A. & Leslie, G.R.): 《与未来配偶同居及其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婚姻与家庭杂志》, 1984 年总 46 期, 第 77—84 页。
- ⑫ 艾尔曼 (Ehmann, W.): 《婚前恋爱行为》亨利·豪特公司, 纽约, 1959 年。
- ⑬ 艾森克 (Eysenck, H.J.): 《个性、婚前性容许程度与门当户对的恋爱》,《性研究杂志》, 1974 年总 10 期, 第 47—51 页。
- ⑭ 格兰和卫弗 (Glenn, N.D. & Weaver, G.N.): 《70 年代美国对婚前性、婚外性及同性恋关系的态度》,《性研究杂志》, 1979 年总 15 期, 第 108—118 页。
- ⑮ 科肯戴尔 (Kirkendall, L.A.): 《婚前性关系与人际关系》朱利安出版社, 1965 年。
- ⑯ 马霍尼 (Mahoney, E.R.): 《婚前性交态度变化中的年龄区别》,《性行为档案》, 1978 年总 7 期, 第 493—501 页。
- ⑰ 马霍尼 (Mahoney, E.R.): 《婚前性交态度变化中的性别与社会阶级区别》,《社会学与社会研究》, 1978 年总 62 期, 第 279—286 页。
- ⑱ 弥顿道普 (Middendorp, G.P.): 《进步、保守主义、社会阶级与婚前性容许程度的关系》,《社会学研究》, 1974 年总 21 期, 第 165—182 页。
- ⑲ 纳米洛夫斯基 (Nemirovsky, D.E.): 《青年对婚前性关系的态度》,《社会学论坛》, 1982 年总 9 期, 第 119—121 页。
- ⑳ 拉斯科 (Raschke, V.): 《香港大学生的婚前性容许程度》,《比较家庭研究杂志》, 1976 年总 7 期, 第 65—74 页。
- ㉑ 瑞斯 (Reiss, I.L.): 《社会阶级与婚前性容许程度》,《美国社会学评论》, 1965 年总 30 期, 第 747—756 页。
- ㉒ 瑞斯 (Reiss, I.L.): 《美国婚前性标准》, 自由出版社, 纽约,

1960 年。

- ② 罗依巴克和麦琪 (Roebuck, J. & McGee, M.) :《黑人女中学生对婚前性与性行为的态度》,《性研究杂志》, 1977 年总 13 期 ,第 104—114 页。
- ③ 斯科特 (Scott, R.A.) :《婚前性交 社会心理研究》 斯坦福大学博士论文, 1960 年。
- ④ 沙学汉 (Schak, D.C.) :《台湾求偶方式研究》, 东方文化书局, 1974 年。
- ⑤ 泽曼 (Szeman, Z.) :《婚前性关系变化:匈牙利北部一个村庄的个案研究》,《比较家庭研究杂志》, 1985 年总 16 期 ,第 11—24 页。
- ⑥ 辛 格 (Singh, B.K.) :《对婚前性关系看法的变化趋势》,《婚姻与家庭杂志》, 1980 年总 42 期, 第 387—393 页。
- ⑦ 斯宾聂 (Spanier, G.B.) :《性知识、色情文学和婚前性行为》,《社会学季刊》, 1976 年总 17 期, 第 247—261 页。
- ⑧ 汤玛斯 (Thomas, D.R.) :《保守主义与婚前性经验》,《英国社会与临床心理学杂志》, 1975 年总 14 期 ,第 195—196 页。

第六篇 婚姻支付

引言

当某种社会现象在政令法律三令五申加以禁止的情况下依然故我，那么在这种现象背后就可能有着一种令其不能不如此的原因，换言之，这一现象很可能有其合理的社会功能。结婚过程中的金钱财物的支付与收受就具有这种性质。不论政令如何禁止，宣传媒介如何抨击，人们还是照做不误。有些社会学家将结婚过程中各种形式的支付统称为婚姻支付，就像在真正的市场上一样，人们或付钱取物、或以物易物，虽然有人出于无奈，但许多人确实心甘情愿，视为天经地义。随着“行市”的涨落，婚姻支付或高或低，但人们的动作是那么相似，在背后导演着这一切的力量之强大，实在令人惊讶。

婚姻支付的种类有哪些？有人简单地按最为常见的现象分为彩礼与嫁妆两类。这方面的权威是斯皮洛（Spiro, M.E.）的四分法，关于他的分类方法文献综述一节还有详述。他的分类思想的主旨在于将婚姻支付的收受者是新婚夫妇，还是他们的家庭加以区分。这一区分相当重要，因为对中国婚姻支付状况的研究表明，正是在收受者是新婚夫妇，还是他们的家庭这

一点上，现代人所处的环境与传统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差异，尤其在大城市当中。

这项研究试图探讨我国大城市中婚姻支付的状况，其中包括谁是支付者，谁是收受者，支付的数量和形式等。这一研究还将探讨影响人们婚姻支付行为的因素，如结婚年代、职业、收入、教育程度等因素对婚姻支付行为的影响，并尝试从我国大城市婚姻支付的状况及其变化找寻其文化含义。

文献综述

社会学者对婚姻支付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婚姻支付的分类标准，其中最重要的文献是上文提到的斯皮洛的四分法。他将婚姻支付按支付者与收受者的差别分为如下四类（注：有些婚姻支付形式因在中文中无现成的对应词汇，只得按其义制造几个术语，后注英文。好在一看定义，词义就清楚了）：（1）男方彩礼（*bride-price* 或 *bridewealth*），指新郎或新郎家支付给新娘或新娘家的财物，（2）女方彩礼（*groom-price* 或 *groomwealth*），指新娘或新娘家支付给新郎或新郎家的财物，（3）嫁妆（*dowry*），指新娘家支付给新娘和新郎的财物，（4）喜钱（*dower*），指新郎家支付给新郎和新娘的财物（斯皮洛，1975年）中国传统的婚姻支付形式当是男方彩礼与嫁妆，这一传统在大城市中有了什么样的变化、现状如何，正是这项研究所关注的问题。

研究文献中的第二类是关于婚姻支付实际状况的调查研究。

（1）彩礼。根据费拉罗（Ferraro, G.P.）在东非斯瓦西里语地区的调查，在20世纪70年代，80%至85%的婚姻

是付过彩礼的，但彩礼的形式不是货币而是牲畜，且“行市”即交付牲畜的头数在近百年间没有大的改变。（费拉罗，1983年）此外，还有许多关于非洲婚俗的研究，如库波（Kuper, A.）的《以畜易妻：彩礼与婚姻在南非》，都是研究彩礼现象的。希科斯（Hicks, D.L.）在印尼东部的一些地区发现一种婚俗：那些支付彩礼的婚姻实行父系继承制，新婚夫妇在新郎父母家居住，夫妻关系十分紧密，那些没有支付彩礼的婚姻则实行母系继承制，新郎住新娘父母家，夫妻间没有法定关系。（希科斯，1975年）费尔（Feil, D.K.）在新几内亚的调查也发现，彩礼是确定夫妻关系的第一步。（费尔，1981年）不少研究揭示出一个规律，即彩礼往往存在于比较贫困的国家和地区，其原因还有待继续探索，这一假设本身也有待检定。

（2）嫁妆。关于嫁妆的研究也有许多，对当代嫁妆状况的调查多集中于印度，因为在那里这一现象盛行。根据希德（Siddh, K.K.）的研究，在印度的传统婚俗中，嫁妆原本并不占很重要的地位，由于近代男方家庭需要女方家庭分担供养儿子的费用，特别是儿子在国外学习的费用，对嫁妆的要求才日益成为缔结婚姻不可或缺的条件。没有嫁妆的女子变得难以出嫁，过去没有嫁妆已经出嫁或嫁妆太少的女人则面临被杀、受虐待或被迫自杀的危险。分居或离婚的女人不为社会所容，法制也难以控制事态。（希德，1981年）

文献中的第三类是关于婚姻支付社会功能的研究。斯皮洛是将婚姻支付形式用支出——收益法则加以研究的第一人。他认为，婚姻支付这一现象产生于支出——收益比重不平衡的婚姻关系之中。婚姻支付采取哪种形式取决于在这一结合中谁得益谁吃亏——是新郎？还是新娘？是新郎家？还是新娘家？在经过对支出——收益的计算之后，由收受一方或支付一方提出

要求，以便（1）向获得利益的一方索取费用，（2）预防潜在的损失（如离婚时女方的生活费），（3）补偿实际的损失。（斯皮洛，1975年）帕波斯（Papps, I.）根据他在巴勒斯坦一个村庄的调查，对婚姻支付进行了经济学的研究，甚至做出了婚姻市场上的供求曲线。他指出，虽然婚姻支付现象在西方并不盛行，但也时有新人接受巨额结婚礼物的现象。他发现，彩礼和嫁妆常常是作为一种交换而共存的。影响婚姻支付现象的因素有：新娘作为劳动力的价值，新娘婚后的居处（一般住婆家），新娘在新家庭中的花费（帕波斯，1983年）

（1）关于彩礼的功能。阿肯森（Atkinson, M.P.）等人认为，彩礼现象是两个家庭间的财产转移，可从经济学角度和社会结构角度加以解释。他们对莫达克的世界民族志上列举的845个文化做了分析，发现其中382个有彩礼这一婚俗，这些文化还往往实行一夫多妻制，女人婚后在婆家居住。此外，女性在家庭收入和维持生计上所做贡献的比例与这一婚俗也有弱相关关系。他们还发现，只是在农业社会中才有这种婚俗，决定性因素是女人作为劳动力的价值，婚龄妇女在数量上的短缺程度以及女人出嫁后给娘家劳力及其他方面带来的损失程度。作者还特别指出，不可用西方的标准来判断以家庭为经济生产基本单位的社会。（阿肯森，1984年）

哈菲斯（Hughes, D.O.）是从另一角度来论述彩礼的社会功能的。通过对中世纪欧洲的研究，他得出结论说，彩礼是丈夫对妻子婚前保持处女贞节的奖励，并与财产继承有关。（哈菲斯，1978年）

（2）关于嫁妆的功能。海瑞尔（Harrell, S.）等人指出，关于嫁妆现象的现存理论没有对造成嫁妆婚俗的原因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仅仅将嫁妆视为对女子婚后花销的补偿是远远不

够的。他们根据对莫达克世界民族志中 58 种文化的研究得出关于嫁妆功能的下列结论：第一，嫁妆是向公众显示家庭财富的媒介物，因此在贫富不均的社会里这一现象最为盛行。在地位悬殊的人家中结成的婚姻、在社会地位主要由财富来决定的社会中，以及人们为地位而竞争的社会中，嫁妆的婚俗就会盛行。第二，在某些社会中，嫁妆是作为父母给女儿的遗产而存在的。（海瑞尔，1985 年）

奥梅达（Almeida, A.）对印度种性制度中嫁妆婚俗的研究认为，嫁妆的社会功能之一是作为在种性制内部进行流动升迁的手段。（奥梅达，1978 年）克莱索（Kressel, G.M.）在对阿拉伯穆斯林社会的研究中也得出类似结论，他认为嫁妆的主要功能，一个是作为地位身份的象征物，另一个是在社会分层体系中实现流动的工具。（克莱索，1977 年）

卡瓦拉洛（Cavallaro, R.）通过对意大利婚俗的研究，将嫁妆的功能概括为保持社会整合的因素。他特别指出了嫁妆的象征性意义：第一，它使婚姻合法化，第二，它反映了家庭内部的权力结构，第三，它强调了女性对娘家的经济依赖，第四，它标志着女人婚后的新角色。例如，嫁妆中床上用品是最基本的内容，它预示了女人未来的性角色，其次是厨房用具，强调了女人婚后在厨房中的责任。总之，他认为嫁妆制是为确立女性在婚后的特殊作用服务的，它在现代的式微与妇女的社会解放和性角色解放相吻合。（卡瓦拉洛，1979 年）

麦可瑞利（McCreery, J.L.）研究了中国婚俗之后，对以嫁妆为女人继承娘家财产的一种形式的理论提出质疑。他指出，在中国，根据清朝的法律，女人是无财产权的，娘家是否为女儿办嫁妆多出于财产继承之外的考虑，如家庭的富裕程度，对女儿在婆家地位的考虑等等，他认为，女人有无财产继

承权与嫁妆完全是两回事，不应混淆。（麦可瑞利，1976 年）

（3）关于喜钱的功能。萨罗汉尼（Saroukhanni, B.）研究了伊朗社会中存在的结婚送喜钱的婚俗，认为喜钱象征着新娘的购买价值，它在现代伊朗社会中的功能是保障妇女离婚后的生活费用。直到 1968 年，伊朗法律规定只有男方可以提出离婚，这一法律随着妇女在经济上的独立而产生了变化，女方也可提出离婚了，但是，作为传统婚俗的喜钱仍旧存在。（萨罗汉尼，1979 年）徐（Hsuu, F.L.K.）的一本专著中也谈到中国结婚送喜钱的风俗。（徐，1971 年）

文献中的第四类是关于影响婚姻支付现象的因素的研究。莱奥（Rao, V.V.）夫妇对印度婚俗的研究涉及了这一问题。他们的研究以大学生为对象，初始假设为教育程度对此有重大影响，但研究结果并非如此。在研究中意外地发现，在非印度教学生中、来自城市的学生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学生以及医学院学生中对嫁妆的期望特别高。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虽然多数学生认为嫁妆对于婚姻并不重要，现行作法应当废止，但多数学生的兄弟结婚时收受了嫁妆，姐妹出嫁时家里也送了嫁妆。（莱奥，1978 年）他们在另一项研究中发现，除性别外，宗教、种性、专业、父亲教育程度、本人职业和收入等因素对嫁妆婚俗均有显著影响。总的看来，青年一代对传统婚俗的否定态度是明朗、强烈的。作者认为，这种态度是对传统嫁妆制度的挑战，青年是婚制改革的潜在力量。（莱奥，1977 年）

研究设计

这项研究采用北京市随机抽样样本，样本容量为 547 人。调查对象自填问卷，共有与婚姻支付有关的变量 20 个，还有

调查对象自身状况变量 15 个，如结婚年、教育程度、职业、收入等。婚姻支付变量在数据分析中为依变量，调查对象自身状况变量为自变量。

自变量的基本分布与“婚前性行为规范”一篇相同，其中特别值得提醒读者注意的是，样本中调查对象的出生年代分布在本世纪初年至 1960 年之间，出生年代的时间跨度对造成婚姻支付行为的差异有很大影响。如果忽略了这一点，就难以理解调查结果与目前社会上流行的婚俗状况之间的差异。

数据分析手段共三种。第一种是比例分布及均值、中位值、标准差等；第二种是对定类变量所做的卡方检定；第三种是对定距与定序变量所做的方差分析。分析遵循的原则是，尽量保留和利用各种类型的数据，使分析过程中丧失的信息量减到最低程度。

研究结果

1. 金钱支付

研究发现，在北京市民的婚姻支付中，纯粹的金钱支付已极为少见。在全部调查对象中，有 79.3% 的人结婚时没有纯粹金钱支付的做法，17.2% 的人有金钱支付，其余 3.5% 的人没有回答这一问题。

经过对纯粹金钱支付这一变量与 15 个自变量之间的卡方检定，获得如下结果：

表一 对纯粹金钱支付的卡方检定

自变量	X ² 显著程度 P 值
1. 民族	.8593
2. 籍贯	.2395
3. 出生地	.1462
4. 党派	.0037
5. 教育程度	.0472
6. 职业	.0032
7. 父亲教育程度	.5385
8. 母亲教育程度	.1545
9. 父亲职业	.0610
10. 母亲职业	.5028
11. 结婚年	.0006
12. 出生年	.0000
13. 收入	.1622
14. 婚后居处	.1963
15. 现在居处	.0055

从卡方检定的结果看，纯粹金钱支付这一依变量同 15 个自变量中的 6 个相关（ $P < .05$ ），它们分别是党派、教育程度、职业、结婚年、出生年和现在居处；婚姻中的纯粹金钱支付同 15 个自变量中的其余 9 个不相关，即北京人在结婚时是否有纯粹金钱支付行为不受民族、籍贯、出生地、父亲教育程度、母亲教育程度、父亲职业、母亲职业、本人收入及婚后居

处这 9 个变量的影响。

在 6 个对金钱支付行为有影响的自变量中 (1) 党派划分为共产党员、群众和其他党派。从原始数据看, 党员结婚有纯粹金钱支付行为的低于期望值, 群众中有这种做法的高于期望值。(2) 教育程度划分为文盲、小学、中学 (含中专、中技) 和大学 (含大专、研究生)。原始数据表明, 中学教育程度的人有纯粹金钱支付的高于期望值, 大学以上者有这种做法的低于期望值。(3) 职业划分为无工作者、工人、知识分子、干部。工人中结婚有纯粹金钱支付做法的超过期望值, 干部、知识分子则低于期望值。(4) 结婚年划分为 1922—1949 年, 1950—1965 年, 1966—1976 年, 1977—1988 年四段。数据表明, 1977 年以后结婚的人有纯粹金钱支付做法的超过期望值, 1976 年以前结婚的低于期望值。(5) 出生年划分为 1907—1930 年, 1931—1940 年, 1941—1950 年, 1951—1960 年四段。结婚时有纯粹金钱支付的人数在 1951 年以后出生的人群中大大高于期望值, 1950 年以前出生的低于期望值。(6) 现在居住划分为住男方父母家、住女方父母家和与父母分开另住三种。结婚有纯粹金钱支付做法的在分开另住的夫妇中大大低于期望值, 而在与父母同住的人们当中则高于期望。总而言之, 党员、教育程度高者、职业地位高者、年岁较长者以及现在夫妇与父母分开另住者比起其他人群在结婚时有纯粹金钱支付的可能性较小; 反之, 非党员、教育程度低者、职业地位低者、年龄较轻者以及现在同父母一起居住的人们当中, 在结婚时有纯粹金钱支付做法的可能性较大。可以由此得出结论, 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中, 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在结婚时较少有纯粹金钱支付的做法, 而在社会地位较低的人当中才更容易见到这一传统婚俗。

在纯粹金钱支付行为中有四种不同的支付形式，即（1）男方给女方家长（男方彩礼），（2）男方给新婚夫妇（喜钱），（3）女方给男方家长（女方彩礼），（4）女方给新婚夫妇（嫁妆）。调查数据表明，这四种婚姻支付方式的状况如表二：

表二 婚姻中纯粹金钱支付状况

金钱支付方式	有此种行为人数比例	钱数中位值
男方给女方家长	2.4%	100 元
男方给新婚夫妇	13.1%	200 元
女方给男方家长	0.7%	40 元
女方给新婚夫妇	8.0%	100 元

由此可见，在北京市民中，男方彩礼性质的纯粹金钱支付是微不足道的（只有 2.4%），女方彩礼更为罕见（0.7%）。男女方家庭在结婚时的纯粹支付主要是给新婚夫妇的，其中男方比女方作这种支付的更常见些，但值得注意的是，保持这种做法的人在整体中所占比例甚小（13.1%）。这说明，纯粹的金钱支付在北京市民的婚姻中已不是带普遍意义的做法了。

2. 置办结婚物品

置办结婚物品是结婚花费的大宗，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中，婚姻支付收受行为已经从在两个家庭之间进行转向基本上在双方长辈与新婚夫妇之间进行了。这种支付或许已不符合“婚姻支付”的本意，而只是一种“婚姻花费”了。

在由谁出资置办结婚物品的问题上也有四种形式：（1）男

方家长出资，（2）男方本人出资，（3）女方家长出资，（4）女方本人出资。其基本情况如表三：

表三 结婚物品资金来源（N=544，单位：元）

资金来源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男方家长	347.31	684.69	0	7,000
男方本人	381.17	1408.18	0	30,000
女方家长	250.70	962.86	0	20,000
女方本人	213.14	440.33	0	4,000

表三标准差之大表明置办结婚物品的出资数量差异极大。为了进一步了解出资数量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影响到何种程度，数据分析以四种出资形式的数量为依变量，以结婚年、收入、教育程度、职业、父亲教育程度等5个变量为自变量，采用方差分析方法，获得如下数据：

表四 对购置结婚物品出资数的方差分析（F值显著程度）

影响因素	男方家长	男方本人	女方家长	女方本人
结婚年	.000	.000	.000	.000
收入	.003	.035	.295	.809
教育程度	.390	.319	.860	.464
职业	.950	.299	.764	.776
父亲教育程度	.245	.059	.267	.084

从方差分析所得结果看，本人的教育程度、职业及父亲的

教育程度对购置结婚物品的出资数量均无显著影响；本人收入同男方家长及男方本人出资数有显著的相关关系；结婚年对购买结婚物品四种形式的出资数量均有显著影响。

在那些显著的相关关系中，结婚年与男方家长出资数是正相关关系，其回归系数（ β 值）为 23.6，即结婚每向后推迟一年，男方家长出资数增加 23.6 元，本人收入与男方家长出资之间是负相关关系，回归系数为 -1.4 元。

结婚年与男方本人购置结婚物品出资数呈正相关关系，回归系数为 28.0，即结婚每向后推迟一年，男方本人出资数增加 28 元；本人收入与男方本人出资数亦呈正相关关系，回归系数为 2.4 元，即本人收入每增加 1 元，男方本人出资数增加 2.4 元。

结婚年与女方家长购置结婚物品出资数呈正相关关系，回归系数为 12.5，即结婚每推迟一年，女方家长出资数增加 12.5 元。结婚年与女方本人出资数亦呈正相关关系，回归系数为 14.7，即结婚每推迟一年，女方本人出资数即增加 14.7 元。

从购买结婚物品的整个出资情况看，结婚年代是最显著的影响因素，结婚的年代越靠后，四种形式的出资数就越高。本人收入对男方家长和男方本人的出资数也有一定影响，但对男方本人出资数是正影响，即收入越高出资数越高；对男方家长出资数是负影响，即收入越高男方父母出资数越低。总的看来，北京人在购置结婚物品上的花费是越来越高了，但是本人工资越高的人越依靠本人出资，本人工资越低的人越依赖父母出资。

3. 婚宴

北京人的结婚费用除置办结婚用品外，婚宴也要算较大的一宗。婚宴分为男方婚宴和女方婚宴两种形式。调查结果表明，有 60.4% 的调查对象在结婚时举行过男方婚宴，30.0% 举行过女方婚宴。结婚时是否举办婚宴这一行为受到了某些因素的影响，如表五：

表五 对婚宴的卡方检定 χ^2 之 P 值

自变量	男方婚宴	女方婚宴
1. 民族	.0518	.8558
2. 籍贯	.0004	.0014
3. 出生地	.0000	.0000
4. 党派	.0003	.0189
5. 教育程度	.0046	.0000
6. 职业	.0005	.0160
7. 父亲教育程度	.0655	.5561
8. 母亲教育程度	.4137	.0066
9. 父亲职业	.0889	.0033
10. 母亲职业	.0486	.0450
11. 结婚年	.0000	.0000
12. 出生年	.0000	.0000
13. 收入	.0791	.0009
14. 婚后居处	.0492	.4281
15. 现在居处	.0187	.0507

看来，一个北京人是否在结婚时办婚宴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在男女两类婚宴形式中，有 8 种因素对二者均有显著影响，而且影响的方式相似，它们是：（1）籍贯：其影响方式从原始数据看，籍贯为北京的在结婚时举办两种婚宴的人数高于期望值；籍贯为外地的这一人数低于期望值。（2）出生地：在北京出生的举办两类婚宴的人数均高于期望值，在外地出生的低于期望值。（3）党派：党员举办两类婚宴的均低于期望值，群众高于期望值。（4）教育程度：中学程度的人举办两类婚宴的均高于期望值，大学以上教育程度的低于期望值。（5）职业：工人举办两类婚宴的均高于期望值。（6）母亲职业：母亲职业为工人的举办两种婚宴的均高于期望值，无工作者和农民低于期望值。（7）结婚年：1977 年以后结婚的举办两类婚宴的均大大超过期望值，1976 年以前结婚的低于期望值。（8）出生年：1951 年后出生的举办两类婚宴的人数高于期望值，1950 年以前出生的低于期望值。

此外还有一些因素对男方婚宴或女方婚宴有着显著影响：（1）婚后居处：住在男方父母家的在结婚时举办男方婚宴的人数高于期望值，分开另住者低于期望值。（2）现在居处 影响方式同上。（3）父亲职业：父亲是工人的举办女方婚宴的人数高于期望值，父亲为农民的低于期望值。（4）母亲教育程度：母亲为文盲的举办女方婚宴的人数低于期望值，母亲是小学教育程度的高于期望值。（5）收入：本人收入每月低于 90 元的举办女方婚宴的人数高于期望值，高于 91 元的低于期望值。

关于婚宴地点。男方婚宴中有 63.9% 是在家中举行的，14.4% 在饭店，2.1% 在单位，19.6% 在其他地点。女方婚宴的地点更偏重家里，有 74.7% 是在家里举行的，4.5% 在饭店，1.3% 在单位，19.5% 在其他地点。

关于来宾人数和宴会费用。男方婚宴来宾人数最多的为 200 位，平均为 29.5 位，花费最多的 3000 元，平均 204.2 元；女方婚宴来宾人数最高值也是 200 位，平均 10 位，花费最多的为 1300 元，平均 63.5 元。

概括地说，在影响男女两类婚宴的诸因素中，有两大类因素在起作用，一是社会经济地位，一是时间因素。社会地位较高的人举办婚宴的可能性较小，而社会地位较低的人举办婚宴的可能性较大，这一点是有中国特色的，说明传统文化在社会的下层较上层更浓厚些，越是社会地位低的人越容易大办婚宴，以此补偿其社会地位低下所造成的损失，以此获得心理平衡。关于时间因素，解放后出生、1977 年以后结婚的人举办婚宴的可能性较大，出生、结婚年代早的人则举办婚宴的可能性较小。由此即可看出，“文化革命”结束之后，人们对从解放后近 30 年所倡导的“革命”标准的偏离——不再坚持勤俭办婚事。这也可能反映了 1977 年后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

4. 结婚总费用

根据调查数据，北京人结婚的总费用以及男女方费用状况如下。

	表六 结婚总费用		单位 元	
	均值	标准	最低值	最高值
男方费用	935.95	1833.88	0	30000
女方费用	510.00	1159.07	0	20000
总费用	1475.92	2814.78	0	40000

由于结婚费用属连续型变量，对其影响因素的分析采取方差分析的方法，其结果如表七：

表七 对结婚总费用的方差分析（F 值显著程度）

影响因素	男方费用	女方费用	总费用
结婚年	.000	.000	.000
收入	.890	.731	.841
教育程度	.411	.585	.283
职业	.322	.322	.214
父亲教育程度	.086	.070	.280

从方差分析的结果看，对结婚总费用有显著影响的只有结婚年，其回归系数为 57.9，即结婚每推迟一年，结婚总费用增长 57.9 元。即使扣除了通货膨胀的因素，结婚费用的上涨仍是引人注目的。

结婚花费中男方明显高于女方，方差分析表明，对男方费用具有显著影响的也只有结婚年这一变量，其回系数为 37.1，也就是说，结婚时间每向后推迟一年，男方费用增加 37.1 元。女方费用虽然不如男方费用高，但也呈逐年增长趋势，其回归系数为 20.9，即结婚每推迟一年，女方费用增加 20.9 元。

虽然结婚费用在解放后 40 年间呈增长趋势，但如果以每 10 年为一段划分，还是可以看出增长速度并不平均。在 50 年代（1950—1959 年），平均结婚总费用为 247.7 元；60 年代（1960—1969 年）为 376.2 元；70 年代（1970—1979 年）结婚平均费用翻了一番还多，达到 885.0 元；而在 80 年代（1980—1988 年）又比 70 年代激增 4 倍，高达 4325.3 元。尽

管这里有 1986 年物价增长的因素在内，但近年结婚费用的暴涨仍是不容忽视的事实。

分析与结论

这项调查旨在了解北京市民婚姻支付——结婚费用的基本状况，并从中找寻一些有意义的理论命题。通过数据分析得到一个基本结论是，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中，婚姻支付行为已经从主要是在两个家庭之间进行的支付收受行为，演变成主要是在两家家长与新婚夫妇之间进行的支付收受行为。因此，这种婚姻支付已大多不属于彩礼（包括男方彩礼和女方彩礼）的性质，而具有喜钱（dower）和嫁妆（dowry）的性质。由于钱物的收受者基本上是新婚夫妇，这种婚姻支付的形式更确切地说是双方家庭（包括父辈和新婚夫妇）付出的结婚费用。

婚姻支付形式的这一深刻变化具有重大的社会和文化意义。它表明，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中，传统文化中那种结婚时在两个家庭之间进行的交易——其基本形式是男方家庭得到新娘，女方家庭得到出嫁女儿的补偿（彩礼）——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为一个独立的新家庭的诞生给予钱物上的支持。婚姻支付形式的这种变化同人们婚后的居住形式密切相关。数据显示，虽然在婚后还有 39.5% 的人与男方父母同住，但已有过半数（52.6%）的人与双方父母家庭分开，单独居住；而结婚一段时间之后，有更多的夫妇与父母分开，单独居住的夫妇在整个样本中占到 79.1%。这种婚后分开居住的做法与婚姻支付形式的变化显然有着密切的关系（数据分析也证明了这一点），因为一桩婚姻的缔结不再意味着男方家庭得到一个新的成员，也不再意味着女方家庭丧失一个成员，而是双方家庭各自丧失了一个成员。这一重大变迁不能不对旨在平衡两家损

失程度和获益程度的婚姻支付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传统婚姻支付形式的变化及婚后居处的变化又与城市人普遍享受的养老金制度密不可分。由于老年生活来源有了保障，可以不再依靠子女供养，北京这类大城市中的婚姻支付的性质已经从老一辈子“养儿防老”在子女身上所做的投资（男方家长出钱买到儿子和媳妇的供养与侍奉；女方家长则因丧失女儿得到一笔补偿），改变为一种基本上是出于感情的支付。这两种支付的区别在于，前者的重心在于其经济功能，后者的重心在于其感情色彩；前者有一种强迫的力量（就像在贫困的农村地区的情形那样），后者则大多出于自愿。关于后者的自愿性质有一个有力的证据：样本中有 37.5% 的男方家长和 38.6% 的女方家长完全没有为子女的婚事出钱。

婚姻支付从两个家庭之间的交易演变为父辈与子辈之间的馈赠这件事还有更深一层的文化意义，即我们的社会——至少在城市中——已经在经历着一个从重亲子关系到重夫妻关系的变化过程。亲子关系这一在中国文化中一向最受重视的关系已经逐渐变得松散了。传统上那种父辈出资给儿子“买”媳妇，儿子婚后终身与父母住在一起，为父母养老送终的家庭模式，在大城市中已经演变为一种子女结婚后立即或随后与父母分开，另立新的家庭，父辈在子女结婚时不一定非“投资”不可，子女也不一定要供养父辈的新格局。一些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如台湾学者孙隆基、陈其南）曾提出“西方重夫妻关系、中国重亲子关系”的看法，从我的调查结果看，中国大城市的家庭关系中也开始出现越来越看重夫妻关系而不看重亲子关系的趋向，这一变化对中国的社会关系、民族性格及道德伦理观念均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其重要性是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分的。

参考书目：

- 奥梅达 (Almeida, A.): 《嫁妆作为在印度种性制中社会流动的工具》,《社会学研究》,1978 年总 9 期,第 239—260 页。
- ② 阿肯森(Atkinson, M 筹):《婚姻支付中的结构原因》,《国际家庭社会学杂志》,1984 年,总 14 期,第 67—79 页。
- 卡瓦拉罗 (Cavallaro, R.): 《女性角色与嫁妆》,《社会学》,1979 年总 13 期,第 51—86 页
- 卡玛罗夫 (Camaroff, J.L.): 《婚姻支付的意义》,学术出版社,1980 年
- ③ 费尔 (Feil, D.K.): 《新娘与彩礼》,《人种学》,1981 年总 20 期,第 63—75 页
- ⑥ 法拉罗 (Ferraro, G.P.): 《斯瓦尔西里彩礼的持久性》,《国际家庭社会学杂志》,1983 年总 13 期,第 1—16 页。
- ⑦ 海瑞尔(Harrell, S.) 等:《复杂社会中的嫁妆体制》,《人种学》,1985 年总 24 期,第 105—120 页。
- ⑧ 希科斯(Hicks, D.L.): 《彩礼》,《人种杂志》,1975 年总 15 期,第 55—56 页。
- ⑨ 许 (Hsu, F.L.K.): 《在祖宗的阴影下》,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1 年。
- ⑩ 哈菲斯(Hughes, D.D.):《从彩礼到嫁妆 中世纪欧洲》,《家庭史杂志》,1978 年总期,第 262—296 页。
- ⑪ 克莱索 (Kressel, G.M.): 《对彩礼的重新思索》,《当代人类学》,1977 年总 18 期,第 441—450 页。
- ⑫ 库波 (Kuper, A.): 《以畜易妻:南非的彩礼与婚姻》,洛莱支与克根保尔出版社,1982 年。
- ⑬ 麦可瑞利 (Mc Creery, J.L.): 《中国与南亚的妇女财产权与嫁妆》,《人种学》,1976 年总 15 期,第 163—174 页。
- ⑭ 帕波斯 (Papps, I.): 《彩礼的作用及决定因素:巴勒斯坦的一个村庄》,《当代人类学》,1983 年总 24 期,第 203—209 页。

-
- ⑮ 莱奥(Rao, V.V.)等:《印度婚姻中的嫁妆:态度、期望及实践》为1978年国际社会学年会提交的论文。
- ⑯ 莱奥:《印度大学生对嫁妆的看法》为1977年西南社会学会第52届会议提交的论文。
- ⑰ 萨罗汉尼(Saroukhani, B.):《喜钱 伊朗择偶传统》,《国际家庭社会学杂志》,1979年总9期,第17—25页。
- ⑱ 希德(Siddh, K.K.):《嫁妆价值观的变化》,《新兴社会学》,1981年总3期,第101—107页。
- ⑲ 斯皮洛(Spiro, M.E.):《婚姻支付》,《人类学研究杂志》,1975年总31期,第89—115页。
- ㉑ 古迪(Goody, J. 筹):《彩礼与嫁妆》。剑桥大学出版社,1973年。

第七篇 自愿不育

引言

社会学界一般将不育现象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自愿不生育，第二类是不能生育，第三类是暂时不育或延期生育。在西方，随着现代化进程和六七十年代兴起的妇女解放运动，自愿不育成为一种可供选择的新的生活方式，因此又有人称其为“选择性的不生育”。

西方社会毕竟与东方不同，它们脱离农业的宗法社会已有几百年了。而在中国，五分之四的人口仍生活在农业社会中。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行为规范又是特别的强大、整齐、划一，在世界上很难再找到一种文化如中国那样家家都要生孩子，而且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们的民族和文化就靠着这种强大而固定的行为规范而延续下来，成为世界上仅存的几个从未中断的文化之一。

第一次听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句话的人会感到突兀，因为此话的逻辑不是十分直观的。孝的内容首先是对长辈的恭敬和侍奉，最大的不孝按逻辑应当是不孝敬父母，为什么不生孩子反而比不孝敬父母更重要了呢？当本尼迪克特讲到日

本人以生养子女为报答上代的养育之恩时（参见《菊与剑》），她也只是将这种在西方人看来十分奇特的逻辑当做一种既存事实来描述的，至于这种现象的成因她也未说清，所谓“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典型的文化现象：延续种族的本能与需要被抽象为一种固定的行为规范，使人们在害怕陷于不孝的恐惧中达到了延续种族的目的。不知作为炎黄子孙对于这种文化传统是该庆幸呢，还是该叹息？难道弄得今天人口爆炸的不也是它吗？尤其不幸的是，它绝了我们选择的可能性。这实在有点不公平：同样的人，白皮肤蓝眼睛的就可以选择不结婚或不生孩子这样一种生活方式，黄皮肤黑眼睛的就不让选择。如果有人选择了就要遭人议论，硬说不是选择的，而是找不到对象或生不出孩子。生育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吗？许多低等动物也会生，而且比人生得更多更快，它们因此比人更高级吗？写文章说气话本属禁忌，但因一件往事耿耿于怀，心中忿忿，不能不说几句气话。那是 1973 年，我在山西农村插队，一位中年妇女常被丈夫痛打，原因是没生孩子。且不说责任是否在她，即使她真不能生育就当受此虐待吗？我敢说，能否生育在 1973 年的那个小村庄的文化标准中是衡量妇女价值的一个重要标准。这个标准在其他文化中人看来或许是又可怜又残酷的，可是对于生活在这一文化中的人来说又是那么无可奈何！她有什么选择的余地呢？

本篇用意并非希望中国人都选择不育，而是希望中国人达到这样一种境界：他之生育是他选择了生孩子这种生活方式；他之不育是他选择了不要孩子这种生活方式。这篇文章就是以选择不育这种生活方式的人为研究对象，内容将涉及他们的现状、促成此种选择的原因及其他有关问题。

文献综述

1. 关于自愿不育状况的研究

根据威尔克 (Wilkie, J.R.) 的调查, 在 70 年代的美国, 自愿不育呈上升趋势。1967 年, 18 至 34 岁的妇女中有 3% 的人自愿不育, 到 1980 年时, 这个年龄组中自愿不育者占已婚女性的 6%, 占全部女性的 11% (威尔克, 1984 年)。派克 (Peck, E.) 等人对 1965 年至 1970 年间自愿不育现象的变化模式的研究得到下列结果: 在较为保守的大学中, 自愿不育者从 1965 年的“无”增长为 6%; 在较为激进的大学中, 这一比例在 1965 年为 10%, 1970 年增长为 18%。(派克, 1974 年)

波尔 (Pol, L.G.) 研究了人们的意愿与实际做法的关系。在他的样本中, 1970 年曾表示自愿不育意愿的人基本上是言行一致的; 而 1970 年表示有生育意愿的人中却有 30% 没有生育, 其中有 33% 的人从要孩子转变为不要孩子, 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 具有较高的教育程度、较高的收入以及较低的宗教信仰程度。(波尔, 1983 年)

2. 关于影响自愿不育的因素的研究

鲍姆 (Baum, F.E.) 将人们选择自愿不育生活方式的动机概括为四大类: 第一类是出于享乐主义的动机; 第二类是出于理想主义的动机; 第三类是由于感情的动机; 第四类是出于实际的动机 (鲍姆, 1983 年)。这种动机分类法有助于对自愿不育行为的理解, 并有助于对其发展趋势做出预测。他在另一项研究中发现, 在选择自愿不育生活方式婚姻中, 夫妻关系更

加平等（但也有例外），他们比一般夫妻更加珍重夫妻之间的亲密关系，认为孩子会威胁他们婚姻的质量。此外，他们更重视保持个人旧有的身份和角色。这项研究预言，自愿不育的现象将会更加普遍。（鲍姆，1982 年）

凯兰（Callan, V.J.）对 50 名母亲和 50 名自愿不育的妻子做了比较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虽然这两组调查对象都声称自己的父母是勤奋而耐心的，关心子女的，同子女感情很好，但是自愿不育者更倾向于用“传统的”和“严厉的”这一类用语来形容她们的父母。此外，自愿不育组与母亲组相比，具有下列突出特征：她们更不驯顺，更看重自我实现，更重物质，更重才智，且个人主义程度较高。（凯兰，1983 年）

威尔克的研究发现，自愿不育者有下列特点：单身女性和晚婚者居多，她们有较高的教育程度和较高的参加工作的比例。从他的样本（18—34 岁的女性）看，自愿不育者在上过大学的人中占 14%，在参加工作的人中占 14%，在独身女性中占到 20% 以上。在参加工作的女性中，职业等级越高及其收入在家庭收入中所占比例越大者，越倾向于选择自愿不育的生活方式。作者因此认为，妇女的工作角色与家庭角色之间是存在矛盾的，那些看重工作的人更倾向于选择不育。（威尔克，1984 年）

拉姆（Ramu, G.N.）等人分析了人们愿意要孩子和不愿意要孩子的原因，其中愿要孩子的主要原因是满足父母的感情需要和维系家庭的姓氏延续；不愿要孩子的主要原因则是认为生育会影响自己教育和事业上的成功，因而是人的自我实现的障碍，他们还担心孩子会成为以夫妻为中心的婚姻关系的障碍。（拉姆，1986 年）

派克等人的研究排列出人们选择不育的头三位原因，它们

依次为自我中心（31%）、为了妻子的事业（22%）以及经济压力（16%）。其他比较重要的还有健康原因（9%），不喜欢孩子（8%），优生学的考虑（5%）和婚姻不和谐（3%）。（派克，1974年）

坎贝尔（Campbell, E.）将自愿不育者分为婚前决定和婚后决定两组，二者比较的结果表明，婚前决定不育者多来自有特殊情况的家庭，这种家庭与一般核心家庭有这样那样的不同，致使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对作父母这件事本身有反感，持否定态度；婚后决定不育者则更倾向于追求不同的生活方式及这一生活方式带来的种种益处。研究的结论是，自愿不育的夫妇会增加。（坎贝尔，1983年）

此外还有一些零星的发现。例如，施亚（Shea, G.A.）发现，参加妇女解放运动对自愿不育的选择无论从期望上还是实际行动上都有影响，二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施亚，1983年）格林格拉斯（Greenglass, E.R.）等人的研究表明，从传统的男性度、女性度标准来看，自愿不育的女性与愿作母亲的女性相比，男性度较高而女性度较低。（格林格拉斯，1985年）

3. 人们对自愿不育的看法

根据凯兰的调查，自愿不育者往往被视为自私和反常，对他们的同情多于赞许。（凯兰，1983年）布雷克（Blake, J.）的调查结果也表明，多数人视自愿不育为无益有害。他们认为，生儿育女虽非经济投资，却是一种社会投资，并非单纯的消费。属于社会下层的人们更容易将生育视为社会投资，这就解释了社会经济地位越低的家庭人口越多这一普遍存在的现象。（布雷克，1979年）

劳伦斯 (Laurance, J.) 抱怨, 在英国, 自愿不育者遭到社会的和经济的种种压力, 他们被视为自私、冷淡、不负社会责任的人; 同时还要受到经济上的损失, 因为医疗福利等等首先为生养孩子的人服务, 而忽略了自愿不育者。此外, 自愿不育的男性与女性相比受到更大的压力, 虽然传统上一向认为生儿育女对女人来说比对男人来说更重要。(劳伦斯, 1982 年)

豪斯奈克 (Houseknecht, S.K.) 的研究发现, 选择自愿不育这种生活方式的人大多在亲友中有支持者。他们充分意识到来自传统社会规范的压力, 因此极其需要这种支持 (豪斯奈克, 1977 年)。自愿不育者本人对这种生活方式的看法一般认为它并无害处, 但也存在某些缺点, 如缺乏对孩子的正面看法、孤独感和老年无助、脱离社会规范的感觉、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受到歧视等等。(鲍姆, 1980 年)

中国的自愿不育者现状如何? 他们做出这种选择的动机与其他文化中的人有无区别? 他们的特征与上述社会中的自愿不育者是否相同? 做出这种选择的意义在中国现状、文化传统及社会背景之下又有哪些特异之处? 这些都是这项研究意欲探究的内容。

研究设计

由于自愿不育者在人口中的比例太小, 这项研究不得不放弃随机抽样的方法, 而采用非随机抽样方法进行。具体做法是, 首先在报纸上刊登广告, 征集自愿不育者参加调查, 由于这些人的朋友熟人中往往有做出相同选择的人, 再通过他们的介绍找到好些人。采用这种方法, 这项调查共征集到 45 对已

婚夫妇，此外还有数名未婚男女青年，他们或已经同未婚朋友商定终身不育，或决心在婚后做这种选择。因为征集启事是在《北京晚报》上刊登的，所以应征者基本上都是北京市民。样本中还有一些人是笔者的私人朋友，以及这些朋友的朋友，他们也都是北京市民。

调查方法采用了访谈与问卷两种形式。调查的第一阶段采用当面访谈方式，以便发现问题并进一步完善调查提纲，然后根据在访谈基础上形成的比较完备的调查框架设计了问卷，将与自愿不育有关的问题全部包容在内，并尽量多采用开放性提问方式，以使被调查者有发挥思想的余地，畅所欲言。

调查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自愿不育者的社会经济地位及家庭背景；第二，选择不生育这一生活方式的原因；第三，自愿不育者受到的社会压力；第四，自愿不育者对有关现行政策的看法及建议。

研究结果

1. 自愿不育者的基本状况

自愿不育者的社会地位及家庭背景同一般人有着显著的差异。

先看本人职业。自愿不育者中职业为干部、知识分子的比例占样本的 73.7%，而在北京市随机样本的一般人当中，这两个阶层的人仅占 40.6%。由此可以得出自愿不育者在职业地位上显著高于一般人的结论。

再看教育程度，自愿不育者也显著高于一般人。在北京市随机抽样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水平的人仅占样本的 24.4%，

而北京的自愿不育者中，男性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水平的占到样本的 65.8%，女性占 68.4%。

从收入上看，北京市随机样本中月薪低于 100 元的占 47.3%，而自愿不育者中，男性月薪低于 100 元的仅占 31.6%，女性占 44.7%。

家庭背景用父亲职业、父亲教育程度、母亲职业、母亲教育程度这四个指标来度量。父亲职业为干部、知识分子者在北京随机抽样中占 24.3%，在自愿不育者当中，男性的父亲职业为干部、知识分子者占 65.8%，女性的父亲属于这两个阶层的比男性更多，竟高达 78.9%。

父亲教育程度为大专以上者的北京随机样本中仅占 8.3%，而在男性自愿不育者当中，父亲教育程度为大专以上者占 34.2%，女性自愿不育者中这个比例高达 44.7%。

母亲职业为干部、知识分子者在北京随机样本中占 8.2%，而在自愿不育者当中，男性的母亲为干部、知识分子者占 44.7%，女性的母亲职业属这两类者高达 68.4%。

母亲教育程度为大专以上者在北京随机样本中仅占 0.9%，而在自愿不育者中，男性的母亲受过大专以上学历的占 21.1%，女性的母亲受过大专以上学历的高达 31.6%。

由此可见，自愿不育者的社会经济地位、教育程度及家庭社会地位都远远高于一般居民。调查中还发现一个特殊现象，即在外资企业的中国雇员中，自愿不育者人数很多（据一位调查对象估计，高达 50%）。这一现象是发人深省的。是他们事业心更强？是他们比一般人更多地接触西方文化？还是由于他们所处的环境对自愿不育的压力较一般环境微弱，致使他们做出了这种选择？

2. 选择不生育这一生活方式的原因

从调查对象的回答中看出，选择不生育这一生活方式的主要原因中占第一位的是对中国人口问题的忧虑；第二位是为了使自己生活得更轻松；第三位是为了自我实现。

中国的人口问题是自愿不育者最感痛心疾首的问题。他们说：“人口使我们的国家拖着沉重的步伐去追赶发达国家，太难了！”“我国之所以发展缓慢当然有多种原因，但人口太多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对此感到万分忧虑。”有人提出，毛泽东在 50 年代批判马寅初，鼓励生育，对今天的人口爆炸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除了人口基数过大，许多人不约而同地谈到人口素质太低的问题，他们说，“素质越差的人生小孩子越多，恶性循环，导致人口素质越来越低”，为此有人提议政府应考虑采取像新加坡政府那样的对策，以立法形式控制素质差的夫妻的生育数量。还有人提出，为了提高人口素质，不应让怪胎、先天性缺陷、弱智残疾婴儿存活。这一建议虽然听去过于激烈，但他们对国家人口素质的忧虑之情却跃然纸上。这些选择不育的人们或则有意识或则在无意之中为解决我国的人口过剩问题做出了贡献。以前者为例，有一对夫妇写道：“中国人口实在太多了，我们就不再给它增加人口了，既然我们也做不到别的。”还有一位写道：“现在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的宣传很多很多。我不想发表什么看法。我想，只要我们坚定不生育的信念，为控制人口增长作一点小小的贡献，这比什么都实在。”后者的例子：有一位自愿不育者写道：“我们无形中给社会减少了负担，减少一个孩子就是为社会造一份福。”

选择不生育这一生活方式的第二位原因是为了生活得更轻松些。不少人认为周围的人和父辈生活得太累了。有一位被调

查者说：“人生贵轻灵、忌滞重，如有选择机会，就要选择轻灵。米兰·昆德拉曾感叹于‘生命难以承受之轻’，但还有‘生命难以承受之重’，选择了‘轻’的还可以再选择‘重’，而已经陷入‘重’的就难以再选择‘轻’了，终日为抚养子女辛劳不是一个合理的选择。人活着不是为了过艰辛的生活，应当尽可能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虽然有人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的选择是享乐主义的（人生很短，应尽量享受人生），但许多人将追求享乐同追求轻松作了区分。一位被调查者说，追求享乐是追求刺激、追求瞬间的忧愁。但追求轻松却是逃避罪恶，追求一种适意、淡泊、优雅的生活，二者是有区别的。尽管有这些差异，自愿不育者给人总的印象是摒弃了传统中国人的忍辱负重、无条件地为后代作牺牲的生活模式，更看重自身的快乐，不愿以牺牲个人的幸福、快乐和轻松为代价去换取被他们称为“身外之物”的传宗接代。

选择不生育这一生活方式的第三个主要原因是自我实现。自我实现这一目标与寻求轻松的生活相比有较多的积极意味。有些调查对象提到生孩子会毁了自己的事业和成功的机会，尤其是一些中年夫妇，他们痛惜在文化革命中被白白耗去的青春，想在事业上有所成就，不愿为生养后代浪费自己的宝贵精力与年华。

在上述三个主要原因之外，还有大量较为次要的原因使他们做出不育的选择。这些原因计有：对中国的传统观念反感（68.4%）；怕增加家务劳动负担（60.5%）；希望更多享受人生乐趣（57.9%）；怕孩子过不上好的生活（55.3%）；现代意识比一般人强烈（52.6%）；为避免妻子生育的痛苦（52.6%）；怕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47.4%）；西方许多家庭都不要孩子，中国人也可以做这种选择（47.4%）；为了事业

(44.7%) ; 享乐主义比一般人多 (36.8%) ; 追求不同的生活方式 (26.3%) ; 优生学的考虑, 怕孩子有缺陷 (23.7%) ; 经济上确实负担不起 (18.4%) ; 不喜欢孩子 (18.4%) ; 不愿作父母 (18.4%) ; 怕孩子分去了爱人的感情 (15.8%) ; 怕妻子变成家庭妇女 (15.8%) ; 想做与众不同的事情 (13.2%) ; 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 (7.9%) ; 妻子男性度较高 (7.9%) ; 妻子缺少母性 (2.6%) 等等。

3. 自愿不育者所感到的社会压力

选择不育生活方式的人们当中近半数是在婚前做出决定的, 另外一半是婚后决定的。他们这一决定往往是在相当强大的社会压力下做出的。样本中有 39.5% 的人在做出不生育决定时遭到过父母的反对; 23.7% 遭到过兄弟姐妹的反对; 39.5% 遭到过来自其他亲属的反对; 34.2% 遭到过朋友们的反对; 65.8% 遭到过同事的反对。有 42.1% 的自愿不育者遭到过人们的公开讽刺, 说他们不是不想生育, 而是没有生育能力, 有的被人疑为“有病”不能生育, 甚至有的女同志被讥为“母鸡不下蛋”。当然这些讽刺或暗示并非全是恶意的, 有时不过是善意的揶揄, 但它同样伤害人。对于这些讽刺挖苦, 许多人持不屑一顾的态度。有一位说, 说我有病就有病吧, 不能损害我分毫。有人愤愤地说, 别说自己确有生育能力 (样本中有 48.7% 的人因避孕失败做过人工流产), 就是真的不能生育又有什么了不起。生育难道是什么不得了的能力吗? 他们感慨于束缚中国人多种选择的心理定式 (stereotype) 之强大, 这种心理定式过于看重生死和传宗接代, 忽略了人的快乐的自我实现。然而也有人不那么超脱, 样本中有 23.7% 的人承认自己担心过别人会以为自己不是不想生育, 而是没有生育能力。在

这个问题上，认为丈夫感到压力更大的占 10.5%，妻子感到压力更大的占 10.5%，夫妻感到压力同样大的占 7.9%，夫妻二人都未感觉到这种压力的占 57.9%。

在我们的调查中，问及对于中国人传宗接代的传统观念（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看法时，大多数人使用了“陈旧”、“愚昧”、“愚不可及”一类字眼，表示对传统观念极为反感，有几位不约而同地用了“嗤之以鼻”、“不屑一顾”这类激烈用语。态度比较温和的人们则认为，传宗接代的传统观念纯属中国人加在自己身上的枷锁，有一位写道：“人死后两眼一闭还能知道什么？死后又能带走什么？”有人说，“人类的财富与事业不一定由我们个人的后代来继承。”有人说，“我们都是工资收入的人，不靠别人生活，也不想建立一个几世同堂的家庭。”还有人说：“为什么女人就必须生孩子作母亲？我目睹许多作了母亲的人变得越来越俗气，毫无事业心，我不愿步她们的后尘。”

在我们的调查对象中，除了有用传宗接代观念带来的实际危害对之加以否定的观点外，还有不少明显具有现代意识，他们的思想同传统观念格格不入。例如有人简单地写道：“没有这种意识”，“传统观念对我没什么影响，我不想为传统观念生活，我只按我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有些人写得比较详尽：“在我看来，这种观念毫无意义，‘孝’我理解为‘压抑’，是自我的丧失。”“在这种观念束缚下，每个人都活得太沉重，属于自己的东西太少。”看来，现代观念与传统观念的根本差异在于对“属于自己的东西”所持的态度。传统观念轻视自我，以某种责任（如繁衍后代）为生活的基本目的；而现代观念却重视自我，时时关注自我的实现，强调那些“属于自己的东西”。

选择不育生活方式的人感到的社会压力不仅来自精神（观念）方面，而且来自物质（经济）方面。例如住房问题和晚年生活保障问题。虽然有些人还没有考虑过老年在精神肉体方面可能遇到的困难，只是想着“车到山前必有路”（有几个人不约而同地谈到“安乐死”准备在生活不能自理时实行“安乐死”，不给亲属和社会增加负担），但也有不少人对晚年生活感到忧虑甚至害怕。有一位写道：“未来也许很可怕，我们的晚景也许会很凄凉，但我们别无选择，不能为了 70 岁而活。”他们自己攒钱准备年老体衰时雇人照顾，此外还希望社会能够增加老年服务设施（如养老院等）。住房问题是自愿不育者反应最为强烈的问题之一。根据许多单位的不成文规定，无子女的夫妇只能分配到一居室的住房，这种分配住房的土政策使自愿不育者深感不公。一位自愿不育者反映的情况带有普遍意义，他说：“我们结婚已经 10 年了，但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孩子，一直忍气和别人住在一个单元里，我们现在真有些受不了了，但又没有地方去说理。”许多年轻人 20 岁一过就赶快结婚生子，于是分得两居室住房，而那些学历、工龄都高于他们的 30 多岁还未生育的夫妇却只有一居室住房。一位自愿不育者写道：“我们单位有一个女同志，刚毕业分到单位就怀孕四个月，经常请病假，紧接着休了半年产假，随后就是没完没了的事假，为了家务和照顾孩子。她的岁数比我小得多，但是分房时，只因为她有一个不满周岁的孩子，她就分到了两居室。而我们终日兢兢业业地工作，从不请病、事假，更没休过产假，论对社会的贡献，自然要数我们大，但只因为我没要孩子，我就只能分到一个一居室。我们永远不要孩子，也许就会永远让我们住一居室。我认为这样是很不公平的”这种政策不但没有鼓励不生育，对不育者不啻是惩罚性的不育者受到的待遇不仅为

他们个人生活带来不便，而且使其他不愿生育的人望而却步不敢轻易做这样的选择。

4. 对有关现行政策的看法与建议

首先，自愿不育者发现目前根本没有关于这群人的政策，他们对此感到十分不满，称自己为“被遗忘的一群”。他们一个起码的要求是，即使不能对他们采取更加优惠的政策，至少应当与独生子女家庭得到同等的待遇。现实却是独生子女家庭得到了物质的补贴和精神上的鼓励，而自愿不育的家庭不但没有得到丝毫物质上的补贴，反而成为条文上的（事实上的）惩罚性措施（如前述住房问题）的受害者。他们在精神方面也得不到舆论导向的支持和谅解，被人视为怪异，承受很大压力。

他们提出的建议大多类似独生子女家庭已经享有的待遇，其中包括（1）类似于“独生子女费”的经济上的奖励补贴，用于提高生活水平和老年生活储备，（2）优先考虑住房，（3）享受 100% 退休金，（4）增加老年服务，（5）每年享受一次带薪假，（6）成立有关协会或福利娱乐，组织旅游参观活动，（7）提高医疗保健的待遇，（8）在调级、提升和在职学习机会方面将不生育作为加分因素考虑，（9）舆论宣传上的支持、表扬，至少是理解，（10）正式颁布有关措施，以促使更多的人做出这种选择。有些人还提出，可以将从超计划生育者那里获得的罚款用作不育者的奖励基金。除此之外，国家应当拨款奖励不生育者，造成“不生育最有利，独生子女次之，超生最不利”的赏罚格局。

自愿不育者高兴地得知，最近湖北省 53 名政协委员提出建议，应大力提倡不生孩子，并对不生孩子的夫妇采取优惠政策。在对自愿不育的政策上算一笔细账，可以概括出上、中、

下三策。上策是对不生育家庭采取比独生子女家庭更加优惠的待遇，即使这样做了，全国人口中不生育的比例也不会很高，如果能达到全国有 5%至 10%的人口不生育，每年就会减少几百万新生人口，国家用于奖励这些人的资金可以得到多倍报偿。中策是对不生育家庭采取与独生子女家庭同等的待遇（改只鼓励独生子女为鼓励 0—1 个子女）。这种物质和精神上的奖励仍足以促使人口中相当一部分人选择不生育的生活。下策是目前的做法，即对不生育者实行事实上的惩罚性措施，使愿意做这种选择的人望而却步，使国家坐失每年少出生数百万人口的良机，增加了财政负担，使国民生活总值中的很大一部分被人口增长所抵消，以致人均 GTP 长期徘徊不前。

鉴于中国人口爆炸的真正威胁来自农村，笔者有一个更加大胆的创议：国家财政拨出一笔资金为农村户口居民中终身不育者开办养老金制度，使他们在丧失劳动之后能得到一笔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养老金。在 1958 年时，毛泽东主席曾设想把全体农民的生活包下来，这是目前的国力绝对做不到的，但是为了鼓励不生育，将终生不育的农民包下来是可能的，因为在每一个不育者身上所花费的那笔钱都至少可以减少一个新生人口（农村一对夫妇通常要生育两个子女，甚至更多），从经济上算是合算的。事实上，目前的“五保户”制度已经这样做了，但它无论在经济上还是观念上只能算是消极防守型的（可怜这些人），而不是积极进攻型的（奖励这些人）。同样花了钱，前者事倍功半（使人更加望而生畏），后者却会事半功倍（使人羡慕这些人），至少在心理方面如此。

结论

这项调查旨在了解目前我国自愿不育者的现状，其中包括他们的社会成分，选择这种生活方式的原因，他们感到的社会压力以及对有关政策的看法和建议。

调查的结论是，自愿不育者无论在本人社会经济地位、教育程度还是在家庭背景都高于一般居民。他们之选择自愿不育生活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排在前三位的原因首先是对国家人口问题的担忧，其次是为了自己生活得更轻松一些，第三位的原因是自我实现。他们的选择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社会舆论的否定，甚至遭到讽刺和打击，在物质精神两个方面均未得到鼓励。他们呼吁决策者特别是国家人口的决策者立即制定鼓励不生育的政策措施，为减轻国家日益严重的人口压力另辟蹊径。

自 70 年代以来，我国采取了严厉的限制人口增长的措施，在国际上为某些必不可少的政策做着艰难的辩护。例如，美国曾因我国某些地区出现过强迫堕胎的现象停止给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捐款以示薄惩，他们这种做法是出于西方的人权观念和基督教伦理传统（天主教尤其反对堕胎），对中国的人口问题缺乏设身处地的体谅。而令人惊异的是，我国政府一方面为控制人口增长做着十分艰难的努力，另一方面却在某些具体措施上（如住房分配等）对不结婚和不生育者采取实际上的惩罚措施，也就是鼓励生育的措施，这不能不使有识之士驻足扼腕。

西方国家之所以没有人口问题，甚至在西德、法国等国出现人口负增长这种令我们艳羡不已的现象，正是由于人口中有相当一个比例的人不生育。如果我国能够采取有力措施鼓励处于萌芽状态的自愿不育倾向，使之有一定程度的生长壮大，则不但可以大大减轻我国人口持续增长的压力，而且可望从根本

上动摇国人心中几千年来形成的心理定式，即认为人人都必须结婚生子传宗接代，否则就会香烟断绝。这种心理定式正是目前人口爆炸的基本动因之一。如果人口中能有 10% 的人（希望有更多的人）不再热衷于传宗接代，能够有不惜使自己这一姓氏在自己这一代断绝的勇气，或可为中国的人口问题找到一条真正的出路。在欧洲和日本，只有占人口极少数的贵族家庭才重视将本族的姓氏代代相传以致永远，而中国却是赵钱孙李都怕断子绝孙（在中国“断子绝孙”是最可怕的诅咒），其实这些姓氏的传递有什么意义呢？如果能通过对不生育这一生活的鼓励，使人们逐步摆脱传统心理定式的束缚，使他们转变为更加看重个人现世的幸福，则不但有利于人口问题的解决，对中国人来说也是更加人道的发展道路，即使已经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生活得更轻松更富裕更美好的道路。

我们还应看到，除了生养儿女给人带来的天伦之乐以外，对目前生活在中国城市的居民来说，生育已没有绝对必要——晚年生活来源有保障，大部分家务劳动都是老年人可以胜任的。但是，城市居民毕竟只占人口的 20%，而对目前生活在农村的 80% 中国人来说，生儿育女却还有着经济上的绝对必要性，这里面不仅包括丧失劳动力之后的晚年生活来源问题，还有由增加劳动人手扩大家庭势力这些考虑而产生的实际必要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传宗接代的传统观念是从这种实际需要中衍生出来和抽象出来的，因此农村居民抛弃这一传统观念就比城市居民困难得多。我们极不愿承认，事实正像马尔萨斯所指出的那样，只有战争、饥荒、瘟疫等残酷事变才能最终彻底解决人口问题，认为这一结论实在太残酷了。但是，貌似盲目的生育冲动是有实在的经济原因的。我们在做出一切可能的努力之后（其中包括一胎化、鼓励不生育和为终身不育的农民办

老年保险等)，或许只有等待全国人口的大多数能享有目前城市居民享有的老年保险这一点实现之后，才有可能使我国的人口问题得到彻底的解决。

参考书目：

- 鲍姆 (Baum, F.) 等：《英国自愿不生育的妻子的某些特点》，《生物社会科学杂志》，1980 年总 12 期，第 287—299 页。
- 鲍姆：《自愿不育婚姻》，《国际社会学与社会政策杂志》，1982 年总 2 期，第 40—54 页。
- 鲍姆：《自愿不育倾向》，《生物社会科学杂志》，1983 年总 15 期，第 153—164 页。
- 布雷克 (Black, J.)：《不要孩子？美国人对 70 年代不育倾向的态度》，《婚姻与家庭杂志》，1979 年总 41 期，第 245—257 页。
- 凯兰 (Callan, V.J.)：《生育观念与不育观念：对母亲和自愿不育妻子的比较研究》，《人口与环境》，1983 年总 6 期，第 179—189 页。
- ⑥ 坎贝尔 (Campbell, E.)：《选择自愿不育：对一个苏格兰城市的探索性研究》，《社会生物学》，1983 年总 30 期，第 307—317 页。
- ⑦ 艾文斯塔 (Elvenstar, D.C.)：《孩子要还是不要》，哈伯出版社 旧金山，1982 年。
- ⑧ 格林格拉斯 (Greenglass, E.R.) 等：《与未婚女性生育计划有关的心理因素》，《加拿大行为科学杂志》，1985 年总 17 期，第 130—139 页。
- ⑨ 豪斯奈克 (Houseknecht, S.K.)：《参照群体对自愿不育的支持》，《婚姻与家庭杂志》，1977 年总 39 期，第 285—292 页。
- ⑩ 劳伦斯 (Laurance, J.)，《生育的道德压力》，《新社会》，1982 年总 61 期，第 216—218 页。

-
- ⑪ 派克 (Peck, E.) 等:《国家主义》, 克伦威尔公司, 纽约, 1974 年。
- ⑫ 波尔 (Pol, L.G.):《不育:意愿与行为的研究》,《社会生物学》, 1983 年总 30 期, 第 318—323 页。
- ⑬ 波士顿 (Poston, D.L.) 等:《美国的自愿不育与非自愿不育, 1955—1973 年》,《社会生物学》, 1983 年总 30 期, 第 290—306 页。
- ⑭ 拉姆 (Ramu, G.N.) 等:《加拿大自愿不育夫妇与已生育夫妇对儿童与父母的评价》,《比较家庭研究杂志》, 1986 年总 17 期, 第 99—116 页。
- ⑮ 施亚 (Shea, G.A.):《自愿不育与妇女解放运动》,《人口与环境》, 1983 年总 6 期, 第 17—26 页。
- ⑯ 威沃斯 (Veevers, J.E.):《选择不育》, 巴特沃斯出版社, 多伦多, 1980 年。
- ⑰ 威尔克 (Wilkie, J.R.)《计划不育的倾向及有关因素》, 提交 1984 年美国社会学年会的论文。
- ⑱ 约格夫 (Yogev, S.) 等:《职业妇女母性研究》《性角色》, 1983 年总 9 期, 第 391—396 页。

第八篇 婚外恋

引言

婚外性行为一向被视为比较严重的越轨行为，对它的制裁也比某些其他行为（如婚前性行为）更为严厉。在中世纪的欧洲，通奸的男女甚至有被判死刑的，在这种惩罚中，对女性通常比对男性更严厉，如男子判绞刑，女子则要烧死。

对婚外性行为的研究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人们有种种顾虑。顾虑主要来自两个，一是社会规范的压力使当事人不愿意承认自己有这种行为；二是怕配偶一旦知道后影响夫妻关系。这两种顾虑在中国比在西方国家恐怕还要高些，一则中国社会规范的力量十分强大，二则中国人还不信任社会研究对个人隐私的绝对保密，因而这一研究在中国比在西方国家更加困难。尽管困难重重，研究还是要搞的，只是必须在研究方法上下功夫，并在解释调查结果时慎重考虑上述因素的影响。

这项研究包括三个内容：第一，人们对婚外性行为的看法（态度），或说人们对这种行为的容许程度；第二，婚外性行为状况，例如有多大比例的人曾经历过此种行为；第三，影响婚外性行为的各种因素。

文献综述

1. 对婚外性行为的态度

桑德斯 (Saunders, J.M.) 等人的研究发现, 影响婚外性容许程度的因素有异性关系中的独立性、相对的自由选择程度和婚姻满意程度。(桑德斯, 1984)

詹科斯 (Jenks, R.J.) 对一种特殊形式的婚外性行为——自愿交换配偶——及人们对这种行为的看法作了研究。他发现多数人认为这种行为是越轨行为, 并认为有这种行为的人比较容易接受婚前性行为、同性恋和卖淫行为。认为他们多为黑人、吸毒者、政治上的自由派和没有宗教信仰的人。(詹科斯, 1985)

魏尔 (Weil, M.W.) 对婚外性行为持有宽容得多的看法, 他以自己的研究为依据指出, 人们直观地认为婚外性行为会妨碍婚姻关系, 但他的研究结果表明, 婚外性行为不一定会打扰婚姻关系, 有时反而会巩固婚姻关系, 原因是在婚姻关系中不能得到满足的需要找到了得以弥补的办法。在他看来, 婚外性关系甚至可以是一种令人愉快的经历。在现代社会中, 如果个人能够正视下列事实就不必杜绝婚外性行为, 即 (1) 被配偶发现以后可能产生的后果; (2) 离开原配偶的可能性; (3) 这种关系的存在并不毁掉而是加固婚姻关系的可能性 (魏尔, 1975)。他的观点不仅在中国人听来像是奇谈怪论, 不少西方人也是难以接受的。

2. 婚外性行为状况及分类

汤姆森 (Thompson, A.P.) 将婚外性关系分为三类：(1) 有感情无性 (性关系)；(2) 有性无感情；(3) 有感情亦有性。他在澳大利亚做了一项随机抽样调查，调查对象中 43% 的人承认一生中至少有一次婚外性行为。(汤姆森, 1984)

麦津尼斯 (McGinnis, T.) 在其专著《比朋友更进一步》中对以往关于婚外性行为的研究做了综述。这方面最早的权威当然是金西调查书。在金西样本中 (40 岁以下者)，有过婚外性行为的在女性中占 26%，男性中占 50%。金西的后继者、印第安那大学性学研究所盖哈德博士 (Gebhard, P.) 以 1980 年的研究做出以下估计：美国有婚外性行为的人在男性中占 60%，女性中占 35—40%。在美国近期的一次全国抽样调查中 (样本容量 4000，男性)，43% 已婚男性有婚外性行为，4% 有此类行为的人曾征得配偶的同意，62% 的研究对象说，如果有机会及合适的人选，他们也会做出这种事。贝尔 (Bell, R.) 1974 年在澳大利亚 26 至 50 岁的女性中的抽样调查发现，43% 的人有婚外性行为。1980 年美国的另一项以职业妇女为对象的研究 (样本容量为 106, 000) 结果是：在 18 至 34 岁这个年龄组中，50% 的人有婚外性行为；在 35 岁以上的年龄组中，这个比例高达 69.2%。(麦津尼斯, 1975)

在美国东部社会学会 1980 年年会上，爱特华特 (Atwater, L.) 提交了一篇论文，他指出：过去一向认为女性的生活态度是被动的、有受虐倾向的、以家庭为中心的和较少主动性的，而他对 40 位有婚外性行为的、主张改变女性传统性角色的已婚妇女的调查提供了妇女形象的另一侧面。她们当中承认在丈夫和情人中更喜欢情人的占 60%，23% 认为无所

谓，其余的更喜欢丈夫。在她们的婚外关系中，最主要的内容是性（爱特华特，1980）

托洛斯特（Trost, J）在 70 年代著文指出，关于婚外性行为的研究太少了，其实这种行为并不少见。他在瑞典做了一项 2000 人的抽样调查，发现在到调查时为止的前一年中有过婚外性行为的人占 5%，其中男性比女性多。他认为自己的统计结果代表了此类行为的最低水平（因为有人不愿承认）。比例如此之小是由于时间界限仅限于一年之间。（托洛斯特，1972）

3. 影响婚外性行为的因素

沃斯特（Walster, E.）等人提出“公平理论”作为导致婚外性行为的主要因素。这一理论认为，当人们发现支出与收入不均等时则产生使之平衡的需要。同理，当人们发现自己婚姻关系中的不平等时，则试图（1）通过某种行为上的改变来恢复平衡（如受损害的一方改为较少付出）；（2）恢复心理平衡；（3）解除关系。在婚姻关系中受损的一方容易卷入婚外性行为，以此作为求得平衡的手段。（沃斯特，1978）

辛格（Singh, B.K.）等人发现，能够对婚外性行为做出最佳解释的因素是婚前性容许程度。此外，宗教信仰程度与婚外性容许程度呈负相关关系，其中政治上持强烈自由派观点的人例外。社会阶级基本上不能解释婚外性行为（辛格，1976）。巴可斯泰（Buckstel, L.H.）等人的研究也证实了婚前性行为经历与婚外性容许程度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巴可斯泰，1982）。

魏斯（Weis, D.L.）等人发现另一因素——社区规模对婚外性行为有强烈的正相关关系。他们还注意到婚前性容许程度、教育程度、婚姻幸福程度、婚姻状态及居住在城市还是乡

村等因素对婚外性行为的影响。(魏斯, 1985)

在社会因素之外, 还有人偏重于生理的解释。邦克 (Bnnk, B.) 在荷兰所做的一项研究表明, 在婚外性行为的原因上, 男女没有重大区别, 即主要原因为机遇和对追求新鲜刺激的需要; 而男女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 男性对性的多样性的要求比女性强烈 (邦克, 1984)。诺斯 (North, M.) 等人以《通奸是生理因素造成的?》为题, 专门研究了婚外性行为的生理因素。他们指出, 正统的社会学家只接受对人类社会现象的社会学解释, 但确有必要对婚外性行为的生物的、基因的、生理的和心理的因素加以考虑。在通奸现象上, “心理厌倦”这一生理学动力提供了一种解释。心理厌倦是由单调的重复的刺激导致的, 男性的性冲动和“喜新厌旧”部分地来自“动物性遗传因素”, 因此应当不仅在社会学层次而且在生理学层次对婚外性行为加以研究。(诺斯, 1977)

戴利 (Daly, M.) 等人专门研究了男性的性嫉妒心, 认为它的作用在于保护父权 (确知谁是父亲), 因而在男性心理中普遍存在。跨文化的历史研究证明, 各种不同文化在通奸法上表现出不谋而合的一致性: 以通奸为犯罪行为, 将这项罪行的受害者规定为男方。跨文化的研究还发现, 男性的性嫉妒是情杀案的主因, 男性采用或威胁要采用暴力行动限制女性的性行为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戴利, 1982)

研究设计

研究的样本是根据简单随机抽样原则从北京市一千万居民中抽取的, 但是不包括农村户口及 16 岁以下的人口。具体步骤是, 首先在北京市 16 岁以上人口每人一张的口卡中完全随

机地抽出 1550 人（抽样过程中如遇到农村户口者则取离其最近的非农村户口者）。在问卷发放前，由于考虑到有些年轻人可能尚未结婚，难以回答关于婚外性关系的问题，所以又剔除了 1961 年以后出生的 500 多人。在实际寄出的 1000 份问卷中，147 份因地址不详或搬迁被邮局退回，还有 4 人因未婚或年纪太大记忆不清退回了问卷，共回收得到有效问卷 547 份，回收率为 64%（547/853）。这个比例在社会学的调查中已经达到可被用作推论总体的依据的要求。因此可以有把握地说，由这个样本所得到的数据能够推论到北京 1961 年以前出生的已婚的全体非农业人口。

样本中调查对象的基本状况被当做此项研究的自变量，共 16 项，其中主要变量的分布状况与第三篇相同。

1. 性别	男	54.5%
	女	45.5%
2 出生年	早于 1919 年	2.4%
	1920—1929 年	8.0%
	1930—1939 年	22.2%
	1940—1949 年	23.1%
	1950—1960 年	44.3%
3 民族	汉族	94.3%
	少数民族	5.7%
4 籍贯	北京	38.7%
	北京以外	61.3%
5. 出生地	北京	55.6%
	北京以外	44.4%
6. 政治面目	共产党员	30.1%
	民主党派和非党群众	69.9%

7. 教育程度	文盲	1.8%
	小学	14.8%
	中学（初高中、中专、中技）	57.9%
	大学以上	24.4%
8. 职业	无工作	3.1%
	工人	51.6%
	知识分子	15.9%
	干部	24.7%
	军人	1.1%
	农民	0.4%
9. 收入	每月 100 元以下	47.3%
	每月 101 元以上	52.7%

依变量有 15 个，其中 12 个是婚外性容许程度变量（态度变量），3 个是婚外性活动变量。

12 个婚外性容许程度变量是对下列 12 个问题（分男女两个部分）的回答：

您认为男性在婚后可不可以有下列行为？

1. 如果他爱上另一个女人，可不可以同她接吻？
2. 如果他爱上另一个女人，可不可以同她拥抱？
3. 如果他爱上另一个女人，可不可以同她发生性关系？
4. 如果他受到另一个女人的吸引，可不可以同她接吻？
5. 如果他受到另一个女人的吸引，可不可以同她拥抱？
6. 如果他受到另一个女人的吸引，可不可以同她发生性关系？

您认为女性在婚后可不可以有下列行为？

7. 如果她爱上另一个男人，可不可以同他接吻？

8. 如果她爱上另一个男人，可不可以同他拥抱？
9. 如果她爱上另一个男人，可不可以同他发生性关系？
10. 如果她受到另一个男人的吸引，可不可以同他接吻？
11. 如果她受到另一个男人的吸引，可不可以同他拥抱？
12. 如果她受到另一个男人的吸引，可不可以同他发生性关系？

三个关于婚外性活动的变量是调查对象对“在婚后与爱人之外的异性有无接吻、拥抱和发生性关系”这三个问题的回答。

这项研究采用定量与定性两种方法。对定量方法取得的数据采用两种分析手段：第一种是对人们的婚外性容许程度及自身行为的基本描述（变量分布）；第二种是卡方检定，分析依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从而确定是哪些因素对婚外性容许程度及人们的自身行为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定性的方法是在随机抽样基础上选择部分承认有婚外恋经历的调查对象做深入访谈，以进一步了解婚外恋的动机及特点等，使研究变得更加丰富和生动。

研究结果

第一部分 基本状况描述

关于婚外恋的 12 个态度依变量的比例分布如下（表一）：

表一 婚外性容许态度（比例）

婚外性容许态度		可以	不可以	不置可否
男性爱上另一女性	——接吻	16.3	83.4	0.4
	——拥抱	17.2	82.4	0.4
	——发生性关系	6.4	93.1	0.5
男性受到另一女性吸引	——接吻	10.8	88.7	0.5
	——拥抱	12.8	86.7	0.5
	——发生性关系	4.0	95.4	0.5
女性爱上另一男性	——接吻	13.7	85.7	0.5
	——拥抱	14.8	84.5	0.7
	——发生性关系	4.6	94.5	0.9
女性受到另一男性吸引	——接吻	8.0	91.2	0.7
	——拥抱	9.1	9.1	0.7
	——发生性关系	2.6	96.2	1.3

从表一看，婚外性容许态度的基本特征有：（1）绝大多数人对婚外的一切性活动均持不容许态度。（2）在婚外性活动中，对发生性关系的态度比对拥抱、接吻要严厉得多。（3）对有爱的婚外性活动比对无爱的婚外性活动容许程度要高一些。（4）对拥抱的容许程度比对接吻的容许程度略高。（5）对男性的婚外性活动比对女性的婚外性活动容许程度略高，但二者区别并不太大，即男女双重标准的现象虽然存在但并不太显著。

三个行为依变量的基本状况如表二：

表二 婚外性活动（比例）

婚外性活动	有	无	未详
接吻	5.7	93.6	0.7
拥抱	6.4	92.9	0.7
发生性关系	3.7	96.0	0.3

从表二的情况看，婚外性活动在我们的社会中只是极少数人的行为，这一比例与发达工业国家的比例（40—60%，见“文献综述”一节）差异实在极大。如果除去我们曾经提到的慑于规范压力和对社会研究保守个人隐私的不信任等因素的影响（即在事实上有婚外性活动而不愿承认的假定还有一个相当的比例），中西两种社会在婚外性活动上的差别仍是相当大的。换言之，43%（见“文献综述”一节澳大利亚数据）与 3.7% 之间的区别绝不仅仅是由有过婚外性关系而不愿承认的人造成的，而是因为在实际行为上确实存在差别。退一步说，如果人们对承认自己有婚外性行为是如此谨慎、不情愿，那么这种态度本身也反映了社会规范在这个问题上的严厉，而如此慑于规范压力不敢承认自己有婚外性关系的人群比起社会规范压力较小的人群在行动时更加谨慎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事了。

总而言之，我们的社会对婚外性活动的态度是十分严厉的，或者说容许程度是很低的，有过婚外性活动的人只是极少数。

第二部分 卡方检定

在分析哪些因素对婚外性容许程度及婚外性活动有影响的卡方检定中，我发现影响最大的因素是出生年，其次为母亲的

教育程度和职业，此外，民族也有始料未及的影响。现分别叙述如下。

1. 出生年的影响

出生年对 15 个依变量中的 12 个有显著影响（其影响程度具有统计学的显著性，即显著程度 $P < .05$ ），如表三所示。

表三 出生年的影响

婚外性的态度及行为	χ^2	DF	P
态度：男人爱上另一女人可接吻	37.46		
男人爱上另一女人可拥抱	46.07	1	.0000
男人爱上另一女人可发生性关系	18.16	1	.0000
男人受到另一女人吸引可接吻	15.37	1	.0000
男人受到另一女人吸引可拥抱	23.39	1	.0001
女人爱上另一男人可接吻	28.00	1	.0000
女人爱上另一男人可拥抱	34.48	1	.0090
女人爱上另一男人可发生性关系	8.55	1	.0900
女人受到另一男人吸引可接吻	15.96	1	.9035
女人受到另一男人吸引可拥抱	19.12	1	.0001
行为：婚外接吻	5.16	1	.0000
婚外拥抱	4.64	1	.0231

这 12 个相关关系全部表现为年轻者（1948 年以后出生的人）选择容许态度（答“可以”）或有过此类行为的人数超过期望值，而年长者（1947 年以前出生的人）选择不容许态度

(答“不可以”)或没有过此类行为的频数超过期望值。所谓“期望值”即假定两变量不相关时应当得到的数值。由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年轻者比年长者在婚外性关系的态度和行为上更加宽容和开放这一结论。

2. 母亲教育程度的影响

母亲教育程度的划分是以中学(包括初中、高中、中专、中技)以上为一组,小学以下为另一组,所得分析结果如下:

表四 母亲教育程度的影响

婚外性容许态度	X^2	DF	P
男人爱上另一女人可接吻	16.05	1	.0001
男人爱上另一女人可拥抱	14.10	1	.0002
男人受到另一女人吸引可接吻	6.17	1	.0130
男人受到另一女人吸引可拥抱	6.20	1	.0128
女人爱上另一男人可接吻	9.09	1	.0026
女人爱上另一男人可拥抱	12.49	1	.0004
女人受到另一男人吸引可接吻	5.65	1	.0179
女人受到另一男人吸引可拥抱	7.93	1	.0049

数据表明,全部相关关系均为母亲教育程度在中学以上者选择容许态度的超过期望值,母亲教育程度为小学以下者选择不容许态度的超过期望值。因此结论是,母亲教育程度高的人比母亲教育程度低的人对婚外性关系明显持更加宽容的态度。

3. 母亲职业的影响

母亲的职业是以干部、知识分子和工人为一组、其他人为另一组划分的，卡方检定结果如下表：

表五 母亲职业的影响

婚外性容许程度	X ²	DF	P
男人爱上另一女人可接吻	40.07	1	.0000
男人爱上另一女人可拥抱	37.52	1	.0000
男人爱上另一女人可发生性关系	17.83	1	.0090
男人受到另一女人吸引可以接吻	24.23	1	.0000
男人受到另一女人吸引可以拥抱	21.37	1	.0000
女人爱上另一男人可以接吻	24.66	1	.0000
女人爱上另一男人可以拥抱	23.04	1	.0000
女人爱上另一男人可以发生性关系	7.04	1	.0030
女人受到另一男人吸引可以接吻	18.24	1	.0000
女人受到另一男人吸引可以拥抱	18.86	1	.0000

在母亲职业与婚外性容许程度变量的相关关系中，母亲职业为干部、知识分子、工人的人对婚外性活动的态度明显不同于母亲为其他职业和无职业的人：前者持宽容态度的人数大大超过期望值，后者持严厉态度的人数大大超过期望值，即前者的婚外性容许程度大大高于后者。由于母亲的职业和教育程度能反映一个家庭社会地位的高低和经济状况的优劣，所以可由此推出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婚外性容许程度也较高这一结论。

4. 民族的影响

在自变量同依变量的相关分析中，民族这一因素的影响显得很有特点：在自身婚外性活动里，承认与自己爱人之外的异性接过吻的少数民族人数超过期望值，而汉族的人数则低于期望值（ $X^2=8.81$ ， $DF=1$ ， $P=.0030$ ）；在承认与婚外异性有拥抱行为的人中，也是少数民族超过期望值，汉族低于期望值（ $X^2=6.93$ ， $DF=1$ ， $P=.0085$ ）。这就否定了民族与婚外性活动不相关的假设，由此可以得出少数民族比汉族人在婚外性活动中更加开放这一结论。但应当引起注意的是，这里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性，即汉族同少数民族的人在婚外性活动的活跃程度上并没有显著差别，但少数民族的人愿意或敢于承认自己的婚外性行为，而汉族人不愿或不敢承认。如果这一分析结果中确实包含着这种因素，那么只能说明汉族人不如少数民族的人坦诚，或者说明汉族的道德规范压力比少数民族更强大。

第三部分 个案访谈

在抽样自填问卷的基础上，我又对少数承认有婚外性行为的调查对象进行了深入访谈，以便为这一研究补充一些生动丰富的感性材料。

1. 动机

深入个案研究发现，婚外恋的动机首先有双方相互的感情吸引或一方对另一方的情欲诱惑。在一个个案中，由于男女双方长期在一起工作发生了感情；在另一个案中，由于一方主动发起进攻，另一方难以拒绝情欲的诱惑，于是导致的婚外性关系。

其次是由于夫妻关系有问题。如一个个案中，当事人是因为配偶有外遇在先，而自己采取报复性行为找外遇在后，以便双方“扯平”，也是为了寻求心理上的平衡。尤其当先有外遇的一方是女方时，男方更容易产生此类动机。在我们的社会中，虽然由于男子随意嫖妓纳妾的现象已基本消除，男女在道德上的双重标准的根基已经动摇，但这种双重标准的余威还潜伏在人们的下意识中。表现在婚外恋问题上就是男子可以有外遇，女子有外遇则罪过较大。因此即使女子在男子有外遇的情况下可以不采取报复行动，男子在女子有外遇的情况下却一定要采取报复行动。

还有一类婚外恋的动机是为了取得实际上的好处。如有一个个案中，采取主动的女方向三位男性主动进攻，并发生了婚外性关系，而这三位都曾是她的直接上级。用被调查男子的话来说，她是为了找“保护伞”，虽不一定得到什么具体的好处，但“上边有人”，可以“说了话算话”。像这种以达到某种功利目的而搞婚外恋的行为，中国人一般认为是不道德的，如果造成实际后果（如破坏家庭）则要受到行政处理，甚至追究法律责任。

2. 特征

被调查的婚外恋显示出下列特征：首先，婚外恋双方多是在工作过程中结识的。如一个案，双方在一个工厂工作，工作地点离得不远，可以经常接触。另一个案属同一行业中有领导从属关系的两个单位，双方的联系常以谈工作为借口。

其次，在双方发生感情的婚外关系中，当事人对情人评价比对配偶的评价高，后悔情绪较少；而在双方无感情、以性为主的婚外关系中，当事人在配偶和情人中对情人评价较低，后

悔情绪较多。例如一个属于后者的个案中，当事人一再表示后悔，对自己婚姻的评价是“基本上是幸福的”；而在一个属于前者的个案中，当事人正在做出离婚的最后决定。

第三，性方面的吸引力。在被调查的个案中，当事人一般都觉得情人在性的方面比配偶更“行”，或胆子更大，或技巧更多，更能给自己带来性的满足。而配偶在这一方面往往被描绘为被动、冷淡，缺乏魅力。在社会制裁婚外性行为的强大压力下、在严守秘密的气氛中实行的婚外性关系显然会比婚内性活动更活跃、更能满足双方的性要求，否则为这种行为付出的巨大代价和得到的东西就更不成比例了。

第四，在有感情卷入的婚外性关系中，当事人的道德观念比较激进，如对婚前性关系、再婚、嫖妓、蓄妾等等都持比较宽容的态度，而在没有感情卷入的婚外性关系中，当事人的道德观念则比较保守，对上述那些超越一般道德规范的行为都持较严厉的反对态度。

3. 负罪感问题

马尔库塞曾概括转述弗洛伊德的一个思想，即认为负罪感在文明的发展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文明的进步与负罪感的增强有关。弗洛伊德曾说，他的意图是“要把负罪感作为文化发展中的最重要的问题，并要表明，文明进步所付出的代价就是由负罪感的增强而导致的幸福的丧失。”（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第54页）在关于婚外恋的调查中，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国人对自己的行为极其缺乏负罪感，与西方人重视内心约束的心态相比，中国人更重视外部约束。一位调查对象在评价自己的婚外恋行为时坦然地说，在不破坏双方各自的婚姻的情况下，只要是两相情愿，婚外恋没什么不可以，对谁也没

有损害。他又说，当然，要是破坏了任何一方的婚姻那就不好了。换句话说，对于不为人所知的、没有造成社会后果的行为，人们不会感到内疚，表现为缺乏内心的约束。在这里，要躲避的只是现实社会中的人的眼，而不是冥冥之中的神（如上帝）的眼。在西方人看来，世人的眼往往可以避开，神的眼却能洞察一切。这一点正是中西文化区别的微妙之处——中国基本上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虽然在调查过程中有极少数有点相信佛教的人承认自己束缚自己行为的原因是害怕报应）。在西方人看来，“没有了上帝岂不是什么事都可以做了”（陀斯妥耶夫斯基语，大意），很多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井井有条地生活在一起，没有随心所欲，没有天下大乱，靠的是什么呢？靠一种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纯粹世俗的、不成文的社会行为规范。在西方人行为中由宗教信仰及负罪感来约束的部分，在中国却更多地由社会交往的规范来约束。因此，在婚外恋中，中国人感到的压力较多来自外部的压力——家庭关系的压力，社会舆论的压力、行政处分的压力等等——而较少来自内心的负罪感。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西方人婚外恋就会少——他们一边感到有负罪感，一边还在“犯罪”，而中国人虽然较少受到内心的折磨，却慑于社会行为规范的压力而不敢轻举妄动。在中国，弗洛伊德所谓的“压抑”采取了一种更加纯粹的形式，它甚至没有被人们的内心所内化，只是一味地“弹压”。它激起的不是负罪感，竟是一种近于悲怆的情绪，甚至达到小说家刘恒在《伏羲伏羲》中所描写的“不朽传奇”那种惨烈的程度。那个搞婚外恋的男主角不但不应当受到负罪感的折磨，而且“是一条多么仁义多么厚道多么懂规矩的汉子呀”（《伊甸园里的躁动》第 152 页）。中国人所受到的社会压抑的惨烈使人们摒弃了内心的负罪感，给他们的越轨行为（违反社会道德规范

的行为)涂上了一层“英雄”的色彩。当然,在当代中国人中多数人对婚外恋行为还是持严厉和否定的态度的。

结 论

这一研究采用了定量与定性两种方法。研究的基本结果表明,在北京这个城市中,绝大多数人(80%以上)对任何形式的婚外性活动都持相当严厉的不容许态度。承认自己有婚外性行为的人只占3.7%。我国社会规范对婚外性关系的压抑与发达工业国家相比要严厉得多。这种来自社会规范的压力使人们克制了婚外性活动的欲望。对那些确有此种越轨行为的人来说,规范的压力主要不是来自内心的负罪感,而是来自对外在后果的恐惧。此外,人们对有爱的婚外性关系比对无爱的婚外性关系的容许程度要高一些。这两种婚外性关系的当事人有一些不同的特征,他们对这种越轨行为的看法也不相同。

对婚外性关系的态度有影响的因素主要有年龄和社会经济地位。其中年轻的和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群对婚外性关系的容许程度较高,年长的和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群对婚外性关系持更加严厉的反对态度。二者的区别具有统计学的显著性。这一分析结果揭示了一个重要的趋势:随着我们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人们对婚外性关系将持越来越宽容的态度。虽然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因素,这一态度也许永远不会达到西方发达工业国家的程度,但这一变化趋势确已存在。

我不愿意在此评价中国与西方在婚外性关系现象上的差异孰优孰劣,只是静观其现状及变化趋势。弗洛伊德宣称,人的历史就是人被压抑的历史,非压抑性的文明是不可能建立的,“快乐原则”要屈从于“现实原则”。马尔库塞则认为,尽管在

缺乏的社会只能有压抑的文明，但在富足的社会却可以有非压抑的文明，（“在现实原则背后，存在着一个基本事实，这就是缺乏”。）在富足的社会中，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之间的对抗关系也将朝着有利于快乐原则的方向发生变化。“爱欲，即爱本能将得到前所未有的解放。”（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第 111 页）弗罗姆更是用褒赏的口吻提到“现代年轻人从权威主义的道德观所强加于他们的负罪感下解放出来了”。他指出：“总的来说，他们已经抛弃了负罪感。这种负罪感在犹太—基督教的传统下注入西方人的思想已达两千年之久。他们把超出规范外行动引起的恐惧抛在一边，而这种规范曾在极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的行动。尽管如此，他们并没有变得不道德。相反，他们正探索新的道德准则。”他把年轻人的这种特征称为“一种新的诚实”。（弗罗姆《说爱》第 52—53 页）我们中国人面临着双重的压抑，一重来自时间——传统，从年长者与年轻人在婚外性容许程度上的显著差别可以感受到传统的这重压抑；另一重来自空间——社会，我们生活在一个拥挤和“缺乏”的空间，虽然没有被注入“犹太—基督教”的负罪感，直接的外部压力（社会行为规范的压力）也足以扼杀一切越轨行为。我们也许应当为这个 3.7%（而不是西方的 43%）而庆幸，庆幸我们生活在一个几乎没有婚外恋（或许仅仅是没有人愿意承认有婚外恋行为）的社会中，但是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我们为此付出了“幸福的丧失”的代价。在研究中国婚外恋问题时，虽然应当注意到无爱婚姻所带来的不幸（这常常是造成婚外恋的原因），但婚外恋的负面效应也应予以关注，它为婚姻双方以及当事人三方（有时甚至是四方）带来的痛苦与烦恼往往并不下于无爱婚姻所带来的不幸。

参考书目：

- 爱德华特 (Atwater, L.):《妻子从忠实向不忠实的转变》 社会问题研究会第 27 届年会论文。
- ② 巴塔克(Bartak, V.)等:《捷克与德国青少年性行为的变化》,《社会行为档案》,1971 年总 1 期,第 181—188 页。
- 邦克 (Buunk, B.):《妒忌同配偶行为的关系》,《社会心理学季刊》,1984 年总 47 期,第 107—112 页。
- 戴利 (Daly, M.)等:《男性性妒忌》,《人类学与社会学》,1982 年总 3 期,第 11—27 页。
- ⑤ 弗洛姆(Fromm, E.):《说爱》 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年。
- ⑥ 詹克斯(Jenks, R.J.):《换偶,一个理论的检验》,《性研究杂志》,1985 年总 21 期,第 199—205 页。
- ⑦ 马尔库塞 (Marcus, H.):《爱欲与文明》,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年。
- ⑧ 纽伯克 (Meubeck, G.):《婚外关系》 普兰蒂克出版社,1969 年。
- ⑨ 诺斯 (Norrh, M.)等:《通奸的原因是生物学的吗?》,《新社会》,1977 年总 41 期,第 125—126 页。
- ⑩ 桑德斯 (Saullders, J.M.)等:《婚外性关系:性容许态度的预测模型》,《婚姻家庭杂志》,1984 年总 46 期,第 825—835 页。
- ⑪ 辛格 (Singh, B.K.)等:《婚外性容许程度》,《婚姻家庭杂志》,1976 年总 38 期,第 701—712 页。
- ⑫ 汤姆森 (Thompson, A.P.):《婚外关系中的情与性》,《婚姻家庭杂志》,1984 年总 46 期,第 35—42 页。
- ⑬ 沃斯特 (Walster, E.)等:《公平与婚外性关系》,《性行为档案》1978 年总 7 期,第 127—142 页。
- ⑭ 魏尔 (Weil, M.W.):《婚外性关系》,《门诊心理学杂志》,1975 年第 31 期,第 723—725 页。

- ⑮ 魏斯 (Weis, D.L.) 等 : 《社区规模对婚外性关系态度的影响》, 《婚姻家庭杂志》, 1985 年总 47 期 , 第 173—178 页。

第九篇 离婚

引言

离婚是依照法定手续解除婚姻关系，也可以说是已婚男女的人际关系解体，它往往会给当事人带来痛苦，这种痛苦有时甚至能够达到惨烈的程度。然而没有爱情的婚姻与不和谐的家庭生活给人带来的痛苦往往并不弱于离婚的痛苦，其痛苦程度有的甚至比离婚更加惨烈。近现代历史表明，离婚率将随着社会现代化程度的提高而增长，也就是说，一个步入现代化的社会，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这种痛苦。因此，有必要对离婚现象加以研究。

这项研究旨在了解我国离婚现象的现状，其中包括离婚的原因、过程、后果及人们对离婚所持的观念和态度。过去，我国报刊上关于离婚问题的文章虽然不少，但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学研究并不多见，即使是采用社会学方法的研究也多为问卷方法，缺乏对离婚现象的近距离观察。本文试图用社会学个案深入访谈方法对离婚现象做一番客观的观察和研究。

文献综述

研究离婚问题的社会学者多注重以下几类问题：(1) 离婚率的变化，(2) 影响离婚率的因素，(3) 离婚的原因，(4) 离婚的后果。

1. 关于离婚率的研究

根据斯科恩 (Schoen, R.) 等人的调查，在 1888 至 1945 年间，美国、比利时、瑞士、瑞典等国的离婚率十分接近。随后，结婚率呈上升趋势但已停止，离婚率亦呈上升趋势但未停止，初婚年龄则呈下降趋势。(斯科恩，1984 年)

纳奇斯 (Natsis, M.) 根据在希腊 10 个城市中所作的调查得出结论说，由于保守的家庭传统、过时的离婚法和缓慢的法庭程序，希腊的离婚率是比较低的。计样本中 1962 年结婚的有 1.2% 离婚，1972 年结婚的有 1.8% 离婚，1982 年结婚的有 0.3% 离婚。1983 年家庭法的改革使离婚变得容易一些了，预计可能会使离婚率有所上升，但还是远不及美国及西欧其他国家的离婚率高。(纳奇斯 1985 年)

西森科 (Sysenko, V.A.) 对苏联离婚率的研究报告指出，从 1940 年起，苏联的离婚案件增加了 450%，从 1970 年起增加 45%，每年约有 350,000 儿童与父母（多为父亲）分离。离婚发生于婚后 4 年内的占 36.5%，5—9 年的占 27.3%，10—20 年的占 23.2%，多于 20 年的占 12.6% (西森科，1982 年)。阿里斯托娃 (Aristova, N.G.) 的一项民意测验表明，苏联未婚女青年对离婚持有如下看法：(1) 认为做出离婚决定将会十分困难的人占 56%，(2) 对年轻和无子女者提出离婚这种情况容忍程度较高的人占 70%，(3) 相信只

有发生违反基本婚姻价值观的行为才应离婚的人占 10%。(阿里斯托娃, 1985 年),

罗布津斯卡 (Lobodzinska, B.) 的研究指出, 合法离婚在波兰仅仅是从 1946 年才开始出现的新事物。从那时至今, 离婚率增加了两倍。尤其是大城市居民的离婚率较高, 大概是受了工业化与都市化的影响。(罗布津斯卡, 1983 年)

库玛盖 (Kumagai, F.) 对日本离婚率的研究展示出另一幅画面。日本在 1900 年以前离婚率很高, 而后持续下降, 以 1964 年为转折点, 随工业化与都市化的进程, 离婚率又开始回升。近期由于越来越多的女性提出离婚并在离婚后过独身生活, 离婚率有继续上升的趋势。然而作者认为, 家庭仍然是一个与日本价值观念相符的制度, 它对离婚率上升的反作用会在不久的将来导致离婚率的下降。(库玛盖, 1983 年)

林 (Lin, R.I.) 将台湾地区的离婚率同发达国家做了一番比较。他指出, 一般认为离婚率在新教和东正教国家比天主教和东方国家要高, 在发达国家比在发展中国家要高。台湾地区的离婚率低于多数工业国家, 但高于意大利和墨西哥。在台湾, 从 1947 到 1950 年, 离婚率呈急剧下降趋势, 1950 年后上升, 到 1954 年达到顶峰, 后又开始下降, 到 1968 年, 下降趋势停止, 此后到 1973 年保持平衡, 从 1973 到 1980 年又重新回升。台湾的离婚率以台北市为最高, 此外还有 30 岁以下离婚女性多、30 岁以上离婚男性多的特点。(林, 1982 年)

2. 关于影响离婚率的因素的研究

海德卡 (Haderka, J.) 认为, 过去 20 年间苏联离婚率上升的原因在于 (1) 合法离婚的可能性上升了, 即离婚的手续变得容易了, (2) 人们的家庭责任感及社会关系对家庭的支持

下降了，(3) 人们对用解除婚姻来解决夫妻不和这一方法的心理准备和接受程度提高了，尤其是年轻人，(4) 离婚法庭没有充分发挥其调解作用，原因在于缺少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以及性学方面的知识。(海德卡，1985 年)

坎波 (Kemper, T.D.) 预言，在美国，虽然目前离婚率相当高，但有迹象表明，在不久的将来离婚率将有所下降，促成这种下降趋势的因素有以下 10 种：(1) 结婚率下降，(2) 结婚年龄推迟，(3) 单身者所占比例上升，(4) 人们精神健康程度提高，(5) 妇女就业已达饱和程度，不会再有大的增加，(6) 国内迁移速度下降，(7) 美国“文化革命”时期结束，(8) 所谓“繁荣的混乱状态”结束，(9) 无过失离婚法案的潜在影响已经过去，(10) 对离婚后果的恐惧感上升。作者认为，由于这些因素将在一个时期内保持发展势头，所以离婚率将会出现下降趋势。(坎波，1983 年)

除了对影响离婚率因素的综合研究，还有许多学者做过对单一因素的专门研究。如哈斯基 (Haskey, J.) 关于社会阶层这一影响因素的研究发现，上层社会的离婚率比平均水平低一半，而下层社会中丈夫失业的家庭的离婚率比平均水平高一倍 (哈斯基，1984 年)。兰金 (Rankin, R.R.) 等人则研究了子女因素对婚姻持久性的影响。他们作了两项假设，第一项是有子女的家庭中婚姻关系会持久一些。以 5 年为是否持久的尺度，研究结果肯定了这项假设，第二项假设是，有两岁以下儿童的家庭，婚姻关系会持久一些。但研究结果否定了这项假设，换言之，是否拥有两岁以下儿童与婚姻持久性不相关。(兰金，1985 年)

3. 关于离婚原因的研究

在苏联有不少社会学家做过关于离婚原因的研究。塞维利娜 (Severina, A.) 等人指出, 家庭关系最不稳定的是年轻人和大城市中的家庭。离婚原因中性格不和占 32.1%, 酗酒占 22%, 冲突占 19.8%。作者认为导致离婚的原因大多属于心理方面, 因此建议增强婚姻咨询服务。(塞维利娜, 1983 年) 西森科的研究发现, 在蓝领工人中, 因酗酒导致离婚的比例最高, 而白领工人的离婚原因则多为性格冲突。(西森科, 1982 年) 莫斯科夫 (Moskoff, W.) 将苏联离婚的主要原因概括为酗酒、通奸、感情不和及住房问题。女性性角色的变化也是离婚率提高的原因之一。此外, 丈夫的虐待和婆家方面亲戚对婚姻关系的干涉有时也会成为离婚的原因。(莫斯科夫, 1983 年)

杰科伯逊 (Jacobson, P.H.) 撰写了一部以“美国的婚姻与离婚”为题的社会学专著, 论述了在“无过失离婚法案”颁布之前构成离婚案的主要原因包括: (1) 家庭暴力; (2) 遗弃; (3) 通奸; (4) 酗酒; (5) 拒绝抚养; (6) 综合原因。其他比较少见的离婚理由还有: 重婚、骗婚、恶疾、重罪或其他犯罪行为、性无能、入狱、乱伦、感情不和、婚前受孕及自愿分居等等。(杰科伯逊, 1959 年)

4. 关于离婚后果的研究

邓拉洛克 (Tchong-laroche, F.) 等人的研究将离婚者与结婚者加以比较, 发现前者在生活满意度、性满意度及自我评价诸方面都不如后者, 前者比起后者看心理医生的频率也更高。(邓拉洛克, 1983 年)

西森科指出，离婚给苏联造成的不良后果是导致生育率下降、儿童抚养质量下降以及精神病和酗酒现象的增加。（西森科，1982年）安布罗斯（Ambrose, P.）在1981年对英国男性离婚者的调查表明，67%的调查对象发生过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33%的人出现了新的疾病。67%的人离婚时有小于16岁的子女，但其中55%的人未获得子女抚养权，有的想见子女但由于前妻的仇视而受阻，有的由于住处遥远难以相见。70%的人在经济上受到影响，67%的人刚离婚时感到工作动力不足，但这种感觉随时间的推移有所减轻。许多人由于离婚失去了旧有的朋友或改变了熟悉的社会关系网络。（安布罗斯，1983年）

关于男女两性对离婚的适应能力也有不少研究。泽斯（Zeiss, A.M.）等人的研究发现，离婚的最终决定一般都是女方做出的，而女性对离婚的适应能力比男性强，其标志是女性的自杀欲望显著低于男性。（泽斯，1980年）由于结婚对男性健康的正面影响比对女性明显，有人提出离婚对男性健康更加有害的假设，但实证的研究并没有证明这一假设。（瑞斯曼，Reiessman, C.K., 1980）

还有许多关于离婚对儿童的影响的研究。有统计资料证明，离婚率的提高与儿童精神病发病率的增加有关。（科达克，Kurdek, L.A., 1983年）罗布津斯卡研究了波兰的离婚法，发现它虽然作过几次有利于保护儿童权益的修改，但对母亲的权益考虑不够。由于住房和食物日用品的短缺，在离婚后的一段时间里，离婚的母亲的生活会受到损害。（罗布津斯卡，1983年）

研究结果

由于离婚者在全人口中所占比例甚小，我们放弃了随机抽样的方法，而采用非随机抽样的方法。具体做法是：首先在报刊上刊登广告，征集离婚者自愿参加调查，然后用深入访谈的形式进行调查。由于广告登在《北京晚报》上，34名接受调查的离婚者中除一名系外地借调在京工作人员之外，均为北京市居民，对每位调查对象的访谈时间最少3个小时，多者长达十几个小时，一般4个小时左右。

1. 离婚原因

调查发现，导致离婚的几个主要原因依次为：（1）婚姻基础不好（41.9%）；（2）婚后一方或双方发生过失（35.7%）；（3）性格不合（34.6%）；（4）性生活不和谐（34.4%）。多数离婚者的离婚原因并不限于一项，而往往是多因的，即每一个案的离婚原因可能不只是上述四项中的一项。

所谓婚姻基础不好是指婚姻并非双方充分自愿和自由恋爱的结果，而是或迫于家庭、社会压力勉强凑合，或权衡利弊得失草率成婚，或为结婚而结婚（“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例如有一女性离婚者婚前从未对异性感过兴趣，也从未产生过结婚愿望，但见周围适龄女性都结了婚，只剩她自己，深恐再不结婚将被视为怪异，违心地找对象，谈“恋爱”，匆忙成婚。面对不情愿的既成婚姻，她在新婚之夜便以泪洗面。另一女性离婚者婚前与其夫相识4年，并不相爱，但因“恋爱关系”已定，且同事亲友都已知道，怕再改变“跟对方说不出口，跟大家也无法交待”，于是结婚。婚后终日盼望丈夫出差，形同路人。一离婚者因未能与情投意合的恋人结合，自己又“不

能没有个家”，遂与别人草率成婚，婚后“心中一直抹不掉恋人的影子”，与配偶既无共同的房屋财产，也无共同语言，甚至连性生活也没有。婚姻持续两年，离异时女方仍为处女。还有一位离婚者在并未下决心与女友结婚的情况下，因单位分房，“今天登记明天就可分房，不登记则连正住着的集体宿舍都可能保不住”，于是匆忙登记结婚。结果房子分到了，女儿也出生了，两人却终于分手，不带孩子的一方不得不重新搬回集体宿舍。

调查中我们还发现，在当事人年龄为 40 岁以上的离婚案中，婚姻基础往往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政治色彩，而年轻人的离婚案则个性色彩较浓。例如，一位 42 岁女性离婚者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文革”中其父挨整，家被抄。一位出身工人家庭的男同学同情她的遭遇，将被红卫兵抄走的部分物品偷出归还她家。她为报恩与男方结婚。但由于出身、经历、教养的不同，婚后缺少共同语言，在有了两个孩子的情况下仍不得不离异。另一位 44 岁的离婚者因其父为历史反革命，“文革”初期全家即被遣送兴凯湖劳改农场，因生活所迫与一劳改犯结婚，后终离异。

在当时社会风尚的影响下，有些感情细腻的人故意去找“大老粗”，借以改变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立场和情调”，有些“出身不好”的人设法与“出身好”的人结婚以改变本人和子女的阶级地位。一位离婚者遵从父亲“找对象一定要找出身好且各方面条件不如自己的人，以免受气”的临终遗嘱作为择偶标准，酿成了日后的离婚悲剧。

人们为什么会在婚姻基础不好，甚至根本没有结婚意愿的情况下勉强凑合、草率成婚呢？除去当事人各种各样的个人原因之外，强大而统一的社会规范无疑起着极大的作用。在中

国，到了“岁数”不结婚是违反一般行为规范的，不仅会被视为怪异，而且会在实际利益上受到损害，如住房、入党、提拔、使用（调查中发现，不派未婚女性到国外工作是某些涉外单位的不成文规定）等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一位男性离婚者愤懑地说：“在中国，不结婚就得不到人权！”

因婚后一方或双方发生过失而离婚的我们称为过失离婚。所谓过失，既包括通奸、外遇，也包括一方与第三者有一般异性接触而为配偶所不容者。据一位离婚者称，其夫与第三者姘居达五六年之久，既不回家，也不给孩子生活费，以致六七岁的儿子几乎记不起父亲的模样。一离婚者说，“我与丈夫分手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决定的。我们婚后刚生下孩子，他就开始有了外遇。他根本不管孩子，星期天也不着家，整天像丢了魂儿似的，找情人约会谈情说爱，一好就是一两年。等人家结婚了，他很快又认识一个新的，又是一两年。就这样先后有三次外遇，他无论如何表示痛悔也改不了，我只好带着孩子单独生活，让他接着去做那无休无止的浪漫感情游戏吧！”

在我们调查的个案中，上述典型的确有证据的通奸和外遇只是少数，多数情况是由对配偶的一般婚外异性接触产生猜忌开始，使夫妻关系蒙上阴影。双方的神经都过于敏感，理解宽容程度过低。例如，一位男性离婚者因听说其妻在单位宣称准备离婚而怀疑妻子有了外遇，导致 15 年婚姻的破裂。实际情况是，其妻对单位以男方为主的分房条件不满，便假称准备离婚，意思是“看你还拿什么理由不给我分房”。有多事者传了闲话，加之作丈夫的一向惟恐失去漂亮的妻子，无端的盘问猜疑使妻子难以承受。直到离婚后丈夫才幡然悔悟，妻子却因离婚过程中挨过丈夫的拳脚而心灰意冷，执意不肯复婚。还有一位男性已婚者与单位一年轻女性在暗房里冲洗照片，妻子知道

后无端指责并告领导，婚姻从此产生裂痕，冲突愈演愈烈，终致离婚。

性格不合是导致离婚的又一主要原因。此类离婚者一般都承认对方是好人，也无外遇，但就是合不来。有的是一方喜欢清静，另一方却偏偏喜欢热闹，有的是一方喜欢干净整洁，另一方却觉得过于整洁会减少小家庭亲切随意的气氛，等等。例如，一位离婚者说，“我与丈夫拥抱接吻他总觉得害羞、浪费时间。有时我做好一桌菜叫他来吃，他却说何必费这么大劲，熬一锅粥也照样吃。”另一男性离婚者酷爱大自然，热衷于采集蝴蝶标本，妻子缺乏共同的志趣爱好，受不了丈夫一心扑在蝴蝶上冷落了自己，加上其他原因终于导致离婚。还有一离婚者这样叙述他们分手的经过：“我与丈夫认识 10 年，自由恋爱 5 年后结婚。双方都是大学毕业，又都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彼此非常相爱，性生活也很和谐。但有时会莫名其妙地感到互相不适应，哪里不适应也说不清。经常互相发脾气刺激对方，或赌气谁也不理谁，然后再和好。和好后好像爱得更深了，又好像总也抹不掉互相刺激时的阴影，觉得更伤心了，于是又闹别扭，争吵赌气……冷静下来想一想，什么隔阂也没有，久而久之却又分明产生了不可弥合的感情裂痕，再也提不起情绪，连吵架赌气的情绪也没有了，终于平静友好却又极其痛苦地分了手。直到现在想起来仍像是一场梦。”

性生活不和谐是导致离婚的又一主要原因。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性生活不和谐是不大能说得出口的理由，因此被调查者在这个问题上往往闪烁其词。样本中对夫妻性生活表示满意者仅占 10.1%，感到不和谐者占 34.5%，感觉一般者占 37.7%，其余对此持回避态度。一女性离婚者因丈夫性功能亢进难以承受而提出离婚。一男性离婚者因突发阳痿，多次求医

不果，其妻提出离婚。另一女性离婚者结婚 6 年，对性生活从最初的缺乏兴趣到反感以致不堪忍受，一听丈夫出差要回家神经就开始紧张。一位男性离婚者说，“新婚之夜初次性交时妻子就痛哭不已，随后十几天什么也不说，更不让我碰她，以后的性生活始终缺乏激情，说不出的乏味、别扭、不和谐，直至离婚。”一位女性离婚者在怀孕前与丈夫十分相爱，性生活也和谐甜蜜，怀孕后怕影响胎儿发育即完全中断了性生活。孩子生下后因辛苦劳累对此事兴趣不大，后来竟发展到厌恶反感，于是与丈夫签订“合同”——每月初日过性生活，其他时间一概不接受。双方立下字据，签字画押。此后一到每月第一天，丈夫就又是洗澡更衣，又是打酒买肉，如同过节一般高兴。即使这每月一次的性生活，女方也纯是应付，好像受难，终致双方离异。

除上述 4 项之外，离婚原因还有：无法解决与父母一起生活的矛盾，一方不想要孩子，有恶疾，妻子婚前失身，配偶出国等等。

2. 离婚过程

在样本中，首先提出离婚且对离婚态度更坚决的一方为女性的占 58.3%，为男性的占 26.2%，双方同时提出且态度同样坚决的占 15.5%。婚姻维持时间最长的为 31 年，最短的为半年，平均 10 年。从开始提出离婚到离成婚，最长的 18 年，最短的一个月，平均 3 年。离婚前有过分居经历的占 88.4%，分居时间最长的 7 年，最短的两个月，平均 2 年。对“准备离婚时与哪些人商量过”这一问题，回答“自己作主，没找人商量”的占 59.0%， “和家人商量过”的占 33.8%， “和朋友商量过”的占 12.4%。离婚过程中与配偶商谈最多的问题依次

为：感情（55.5%），孩子（37.1%），房子（26.9%）和财产（18.5%）。最终能在上述问题上达成协议的占 88%，不能达成协议的占 12%。

离婚过程对多数人来说无疑是个痛苦的过程。在回答“离婚之前、离婚过程中和离婚之后这三个阶段中在哪个阶段最感孤独、最影响健康和工作情绪”这个问题时，65%的人认为是在“离婚过程中”由于当事人在这一过程中往往极度痛苦和不理智，对配偶由爱生怨或生恨者有之，采取报复行为者有之。女性往往采取破坏对方名誉的手段，而男性则往往以暴力相威胁。

关于未成年子女的归属问题，有两个以上子女的双方一般各得一个或两个，但也有一方（往往是男方）得不到子女的情况。例如，一位男性离婚者希望得到两个儿子中的一个，但 15 岁和 10 岁的两个孩子均明确选择跟母亲。

独生子女家庭女方得到孩子的比例高达 90% 以上，且多数都是双方同意的。离婚过程中为子女归属问题发生剧烈冲突的在样本中并不多见。对“未得到子女的一方能否看望孩子及多长时间可以看一次孩子”的问题，回答可随时自由看望的占 37.5%，二周至半年看望一次的占 18.7%，有 25% 的离婚者因害怕影响子女与继父母的关系、害怕打乱孩子内心的平静、或想让孩子尽量忘掉自己以及不想看望等理由，在离婚后不看望孩子；尚有 6.1% 的离婚者看不到孩子；其余的人对这一问题未予回答。例如有一位女性离婚者，因离婚后调往异地工作而基本上无法与孩子见面。另外一位女性离婚者，在孩子 18 岁前不准前夫看望，理由是以此惩罚因外遇导致家庭破裂的前配偶。

未得到子女的一方每月（或每季度、每年及一次性）按时

付抚养费的占 93.3%，其数额最多为每月 70 元，最少 17 元，平均 30 元左右。但他们付出的实际数额往往高于离婚协议或法院判决时的规定，最高可达每月 100 元，平均 40 元左右。一般是付费一方自愿这样做的。

在财产的分割上，样本中有 36% 的人认为这不是重要问题，不愿斤斤计较而愿做出让步。28% 的人甚至表示随对方挑选或只带走自己简单的衣物。其中多数是因孩子归了对方而不争甚至不要财产的。还有一些人或因自己一方外遇造成离婚，心里有负疚感，或因系主动提出离婚的一方，只求能遂愿而别无他求，或有过失，被对方“扫地出门”。样本中认为财产分割合理的占 43.4%，不合理的占 17.4%，无所谓的占 39.2%。

离婚过程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住房问题。在住房普遍紧张的情况下，离婚后一方往往失去住房，或回父母家中，或住集体宿舍，还有人无固定住处，被戏称为“马路天使”，在亲友处借宿。例如，有一位女性离婚者因无房而不得不放弃子女抚养权，以致对方再婚后孩子得不到良好照顾，自己也无法要回。

离婚过程中，当事人有时还要面对社会舆论的干预，其中包括双方家长、亲友及同事的各种反应。从我们的样本看，除一方有通奸或外遇提出离婚、另一方坚决不同意离的情况外，行政领导、家长亲友及社会舆论强烈干预离婚事件的情况已不多见。对离婚当事人的行动更为理解的多为朋友，而不是家人。

3. 离婚后果

离婚后果包括离婚对当事人精神状况、身体状况、经济状

况的影响，以及对孩子心理、抚养、教育等方面的影响。

当事人对离婚总的感觉有：认为离对了、必须离并有轻松感、解脱感的占 54.5%；认为不是好事但面对现实别无选择的占 36.3%；认为自己倒无所谓但对孩子不好的占 22.7%；认为不该离、离了不好的占 9.1%，等等。多数人在离婚后孤独感 69.1%。一位女性离婚者说，“离婚后的家就像一片废墟”。一位男性离婚者说，“31 年的夫妻一朝分手，过去的生活就如同是一场梦。自己硬挺着，精神尚未失常，已是勉为其难”。

将近半数的离婚者由于没有一个可说心里话的朋友圈子，更使其孤独难以排遣。离婚后无孤独感的在样本中仅占 30.9%。据一位女性离婚者说，自己从原来两人终日缠绕不清的感情痛苦和烦恼中解脱出来，“眼界开阔了，对生活的理解也加深了。”一位男性离婚者说，离婚后自己懂得了许多人生道理，好像一下子就成熟了。无论在工作学习还是业余活动中都更加坚强和自信了。

离婚者是否较快地摆脱了离婚所造成的感情痛苦可从对前配偶的感觉上反映出来。样本中对前配偶感到憎恨、厌恶、反感的占 36%，怀恋、思念的占 4%，一般友好的占 16%，冷漠、无所谓占 28%，有又恨又想又悔等矛盾心理的占 16%。换言之，有 56% 的离婚者对前配偶仍难以释怀，不能摆脱感情的折磨。

离婚者还要面对周围的舆论。在回答“别人对你离婚的看法”这一问题时，76.1% 的人认为自己处于猜疑、议论和讥讽之中，感到有压力。据被访谈者说，人们对其离婚有如下反应，“人们对我有千奇百怪的看法和猜疑”、“看法不好了”、“认为离了婚的女人就像犯了罪”、“不理解、莫名其妙”、“看

我的眼光都跟以前不一样了”、“有可怜的、同情的，还有幸灾乐祸的”、“怀疑我生理有缺陷，被当成谈资笑料”等等。一位男性离婚者说自己“被那些给‘大女’们介绍对象的人包围着，被周围所有的目光紧盯着，仿佛去谁家都是要把人家老婆抢走似的”，以致好几次动了复婚以摆脱这种尴尬处境的念头。

关于健康状况的变化，认为离婚后比离婚前好的占 33.3%，恶化的占 19.1% 无变化的占 47.6%。

关于经济状况的变化，认为离婚后比离婚前好的占 36%，恶化的占 36% 无变化的占 28%。

离婚后有再婚意向的占 55.1%，无再婚意向的 31.9%，准备复婚的 7.1%，其余的人回避了这一问题。到我们调查时已再婚者占 16.3%，未再婚者 83.7%。再婚后感觉幸福的占 74.8%，不幸福的 25.2%。有再婚意向者遇到的一个普遍问题是接触人的机会太少，缺少可供他们与人沟通、重新选择的渠道。据一位高级工程师说，“我是搞技术的，平时很少接触人。我想再婚，也不相信那么多的离婚女性中就没有愿与我接触交往的人，但苦于没有渠道结识她们，又实在不愿去婚姻介绍所，结果落到一筹莫展的境地。”一位女性离婚者则说，“想再婚可机会太少。好不容易人家给介绍一个，一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互相问‘你怎么离婚的’，各自叙述一遍，就像第二次开庭使人很难进入角色”。

离婚中受害最深的是孩子。样本中只有一位女性离婚者报告说离婚对孩子是有利的。她说，“离婚后孩子们从不堪忍受的家庭气氛中得到解脱，两个儿子先后考上了大学。若不离婚他们恐怕都得得精神病”。

样本中其余所有的离婚者都认为离婚对孩子造成了巨大的不可弥补的伤害。首先是孩子因父母离异一事所造成的心灵创

伤，其次是失去父爱或母爱，还有社会舆论的压力使孩子觉得丢人、抬不起头。不少离婚者反映离婚后“孩子脾气变坏了”、“性格变得忧郁、内向、孤僻，不愿说心里话”、“功课下降、心理波动，常常发呆”，离婚“使孩子早熟”、为讨离异后的父母双方的喜欢而变成“小两面派”等等。一位女性离婚者去外地看望跟随前夫生活的女儿，因离婚时孩子尚小，几年不见母女俩已互不认识。她们在别人指点下相认时，女儿由于受到强烈刺激，只喊了一声“妈妈”就晕倒了。另一女性离婚者说，她5岁的儿子因见不到爸爸，凡面值伍元的人民币都不让花，收藏起来，因那票面上有一戴鸭舌帽手拿钢钎的炼钢工人形象，孩子固执地认为那就是他的父亲。一位男性离婚者说，过去整天淘气不着家的孩子在失去妈妈后不愿去公园，说“没妈妈领着的孩子会被人笑话”。另一男性离婚者说，小女儿有一次突然问他：“妈妈是好人还是坏人？为什么别人说妈妈是流氓？”使父亲无法回答。此后凡再提到妈妈，小女儿一概不吭声。

4. 离婚观念

调查还涉及离婚观念问题。调查对象在如何看待离婚的问题上可大致分为三种类型，即现代型、传统型和过渡型（介于传统观念与现代观念之间）。

现代型观念对离婚持开放态度，认为离婚与结婚一样，既是自由的，更是正常的。

例如，一位男性离婚者说，“既然我们婚后彼此觉得不甚理想，为什么不可以再重新选择一次呢？”他们只用了一个月就办好了协议离婚手续。孩子、房子及财产的归属与分割也异常顺利。离婚后不久前妻即再婚，婚后生活幸福。男方边工作

边学习，热衷于社会活动，生活也很充实。

一位女性离婚者在与丈夫分手时，又双双来到婚前谈恋爱常去的公园，重温相恋时的情景，彼此祝愿对方重新获得幸福。办完协议离婚手续的当天，两人还在一起吃了饭。以后逢年过节，都互赠贺卡，彼此都在心里保留着对对方美好的回忆。

一位男性离婚者与妻子感情很好，妻子出国求学期间，他在精神物质两方面均给其极大帮助。当对方突然提出离婚时，周围的人都很气愤，有主张拖着不离惩罚对方的，有主张让对方设法将他办出国再离婚的，还有主张索要经济赔偿的。但他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正视现实，很快与对方办了离婚手续。他认为索要赔偿及要求将自己办出国会有损自己的人格，也会亵渎过去的纯真恋情。此外，他认为“长痛不如短痛，否则两败俱伤，对谁都不利”，离婚后最初半个月他异常痛苦，健康状况明显下降。他告诫自己不能垮下去，于是从病床上爬起来，走向运动场，多方充实自己的业余生活，很快便从极度痛苦中摆脱出来，并认识了后来的妻子，再婚后感到非常幸福。

一位女性离婚者说，“我离婚是因为丈夫有外遇，第三者就是我的一个好朋友，而且是男方起诉离婚的。当法院通知我说准备驳回男方起诉时，我说已经这样就不要再驳回，请直接给我们办手续吧。因为我想我不是旧式妇女，我有工资收入，完全可以活下去，活得更好，同时把孩子带好。离婚后有一次为别的事与同事发生争执，同事骂我缺德，说‘不缺德怎会离婚’，我当时理直气壮地把她驳得哑口无言，从此，再也没人敢说三道四了。现我已重新找到理想的爱人，他不仅爱我，而且非常疼爱孩子。我对他还是那句话：合则聚，不合则散，只要说清楚，分手还是朋友，绝不互相怨怪对方”。

第二类离婚者的观念属于传统型，他们或认为离婚是大逆不道、有违祖训，或觉得离婚丢人现眼、无法做人。尤其是一些女性离婚者，以秦香莲自居，到处喊冤叫屈，要求组织领导出面干涉，借助社会舆论搞坏对方名誉。一位男性离婚者说，“我妻子虽是有着 40 多年党龄的党员，但在婚姻问题上从一而终的观念却十分浓厚。我提出和她离婚后，她一方面到处说我们感情如何如何好，另一方面对我采取各种控制手段，还动手打我，并说打我是因为爱我，怕我跑了。”一位女性离婚者在丈夫公开与第三者姘居多年的情况下仍不肯离婚，直到自己年近半百才在子女的劝说下与丈夫分手。一男性离婚者在妻子提出离婚后对她说：“我没搞野女人，你也没搞野男人，为什么要离婚？怎么能离婚？要想离婚只有一条路，就是你去搞野男人，回来我二话不说，马上跟你办手续。”于是，在女方始终也不曾到外边“搞野男人”的情况下，他们的离婚整整拖了 17 年。

在离婚观念上属过渡型的人则介于以上两者之间。这类离婚者大都认为夫妻之间过不来应当分手，但考虑到孩子和社会舆论的压力，又往往犹豫不决。例如一位女性离婚者说，我不爱自己的丈夫，要是没孩子早就离了。但为了孩子有个哪怕只是名义上的父亲，我什么都可以牺牲，所以我不想离婚。对孩子来说，无论如何总是“原爹原妈”好。另一位女性离婚者的孩子是与前夫生的，与第二个丈夫的离婚并不牵涉孩子问题。从个人感情及意愿来讲，她婚后半年就想离婚，但在这痛苦的婚姻维持了 10 年之后，男方提出离婚她却不同意。她认为不幸的婚姻是痛苦，但第二次离婚的女性要面临的舆论压力更大更痛苦，她宁肯忍受前一种痛苦，也不愿将自己“再次剥光了一样，在众人面前展览，被舆论的洪水淹死”。

在上述三种类型中，持现代离婚观念和传统离婚观念者在样本中都是少数，多数人的观念则是新旧杂糅的过渡型。

结论

这项调查旨在了解我国离婚现象的现状，包括离婚原因、离婚过程，离婚后果及离婚观念，以及属于离婚者这一文化群体的其他特征。

调查的结论是，婚姻基础不好、婚后一方或双方发生过失、性格不合及性生活不和谐是导致离婚的主要原因。造成婚姻基础不好的原因有个人的，也有社会的、时代的特征以及传统观念的影响。离婚过程中当事人交谈最多的是感情问题，而子女归属问题并未产生大量剧烈冲突。与财产分割问题相比，房子的分割或归属问题更显得突出。离婚对当事人的影响主要是精神、心理方面的，对经济与健康等方面的影响则在其次。离婚对孩子的影响也主要是精神上的，其中包括心灵的创伤，母爱或父爱的丧失，以及由社会压力造成的心理健康问题。准备再婚者普遍面临着社交范围狭窄、选择机会缺乏的困难。人们的离婚观念既有现代开放型的，也有传统保守型的，但多数人的离婚观念则属于新旧杂糅的过渡型。

当我们谈到人们对离婚的态度的差异时，并非主张凡是赞成离婚的都是现代的、开放的态度，凡是反对离婚的都是传统的、保守的态度，而是期待一种指导人们行为的理性原则。什么是离婚问题上的理性原则呢？就是使当事人双方最幸福这一原则。如果双方都愿意离婚，离婚对他们的幸福来说就是好事，不是坏事。如果一方愿离一方不愿离，能够使任何一方做出牺牲或两人一起为子女做出牺牲当然很好，但是如果不可能

做到，离婚对他们来说也就不是坏事而是好事了。离婚问题牵涉的法律、道德、伦理问题还有许多，但由于此项研究的主旨在于对我国目前离婚现象的基本描述，这些题目只好留待进一步的研究了。

参考书目：

- 安布罗斯 (Ambross, P. 筹)：《离婚男性》，《新社会》，1983 年总 64 期，第 464—466 页。
- ② 阿里斯托娃 (Aristova, N.G.)：《未来新娘对离婚的看法》，《社会学研究》，1985 年总 12 期，第 111—114 页。
- 伯格 (Berger, B.) 等：《家庭战争》，安克出版社，纽约，1983 年。
- 卡特 (Carter, H.) 等：《婚姻与离婚：一项社会经济研究》，哈佛大学出版社，麻省剑桥，1970 年。
- 盖桑哈蒂 (Gathorne-Hardy, J.)：《婚姻、爱情、性和离婚》，萨米特出版社，纽约，1981 年。
- ⑥ 古德 (Goode, W.J.)：《离婚女性》格林伍德出版社 威斯特波特，康涅狄克，1956 年。
- ⑦ 戈莱奇 (Gorecki, J.)：《离婚在波兰》莫顿出版社，1970 年。
- ⑧ 哈斯基 (Haskey, J.)：《英格兰和威尔士离婚中的社会阶级及社会经济差异》，《人口研究》，1984 年总 33 期，第 419—438 页。
- ⑨ 海伦 (Haleru, L.C.)：《离婚改革 法律与社会观念的变迁》，自由出版社，纽约，伦敦，1980 年。
- ⑩ 海德卡 (Haderka, J.)：《苏联离婚率的社会学分析》，《社会学》，1985 年总 21 期，第 392—403 页。
- ⑪ 杰科伯逊 (Jacobson, P.H.)：《美国婚姻与离婚》瑞尼哈特公司 纽约，1959 年。
- ⑫ 坎波 (Kemper, T.D.)：《离婚率预测：下降趋势》，《家庭问

- 题杂志》，1983 年总 4 期，第 507—524 页。
- ⑬ 库玛盖 (Kumagai, F.):《日本离婚变迁》，《家庭史杂志》，1983 年总 8 期，第 85—108 页。
 - ⑭ 科达克 (Kurdek, A.) 等：《离婚对儿童的影响》，《离婚杂志》，1980 年总 4 期，第 85—99 页。
 - ⑮ 林 (Lin, R.I.):《台湾离婚率趋势与差异》，《台湾大学社会学杂志》，1982 年总 15 期，第 143—171 页。
 - ⑯ 罗布津斯卡 (Lobodzinska, B.):《离婚在波兰：立法、分布与社会背景》，《婚姻与家庭杂志》，1983 年总 45 期，第 927—942 页。
 - ⑰ 莫斯科夫 (Moskoff, W.):《离婚在苏联》，《婚姻与家庭杂志》，1983 年总 45 期，第 49—425 页。
 - ⑱ 穆勒 (Mowrer, E.R.):《家庭解体》，芝加哥大学出版社，芝加哥，伊洛诺依，1927 年。
 - ⑲ 纳奇斯 (Natsis, M.):《希腊的婚姻与离婚趋势》，为北中部社会学 1985 年会提交的论文，1985 年。
 - ⑳ 兰金 (Rankin, R.R.) 等：《离婚者的婚姻长度对儿童的影响》，《婚姻与家庭杂志》，1985 年总 47 期，第 43—52 页。
 - ㉑ 瑞斯曼 (Riessman, G.K.) 等：《婚姻解体与健康》，《社会科学 & 医学》，1985 年总 20 期，第 627—635 页。
 - ㉒ 斯科恩 (Schoen, R.) 等：《20 世纪瑞士的婚姻与离婚》，《婚姻与家庭杂志》1984 年总 46 期，第 963—969 页。
 - ㉓ 塞维利娜 (Severina, A.F.) 等：《家庭服务及其改进》，《社会学研究》1983 年总 10 期，第 85—91 页。
 - ㉔ 西森科 (Sysenko, V.A.):《离婚 动机与后果》，《社会学研究》，1982 年总 9 期，第 99—104 页。
 - ㉕ 邓拉洛克 (Tcheng-Laroche, F.) 等：《分居与离婚女性婚姻控制组的比较》，《社会科学 & 医学》，1983 年总 17 期，第 95—105 页。
 - ㉖ 威尔克 (Welch, C.E.) 等：《1970—1979 年婚姻与离婚的国际趋

势》，《国际家庭社会学杂志》，1982 年总 12 期 第 121—128 页。

- ⑦ 泽 斯(Zeiss, A.M.)等：《提出离婚与适应离婚的性别差异》，
《离婚杂志》，1980 年总 4 期，第 21—23 页。

第十篇 同性恋

引言

同性恋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是社会学研究的理想课题。说它“理想”是因为同性恋现象外延清晰，内涵独特。同性恋作为一种亚文化（subculture，又译副文化）现象有着它独特的游离于主流文化的特征；同性恋者作为一个亚文化群体具有独特的行为规范。因此，世界各国的社会学者都热衷于这个题目，对此做了大量研究。

同性恋在一般人眼中是一种异常的性倾向。说它异常只是说它有异于常人，并不等于说它是病。从弗洛伊德反对对同性恋的生理解释而强调它后天习得的性质起，到 1980 年美国神经病学会正式将同性恋除名，认为它既然已是一种生活方式，就已经属于由社会来加以规范的事物而不属于神经病学的研究对象止，人们对于同性恋的研究已经深入到这一现象的各个方面。概括起来，关于同性恋现象的研究有下列各类：（1）关于同性恋的历史的研究：从古希腊罗马时期到现代同性恋者争取自身权利的政治运动；（2）关于同性恋本身状况的研究，如他们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他们的性格特征、生活方式、行为规

范等，(3) 关于同性恋形成原因的研究；(4) 关于人们对同性恋态度的研究，如男女两性是否对它持有不同的观点；(5) 关于同性恋者同其他人的关系的研究，如同丈夫、妻子、子女的关系等等。

我的这项研究旨在对北京男同性恋社群的状况做一基本描述，其中包括同性恋社群的主要活动方式和场所，同性恋的形成过程及原因，同性恋者的感情生活与性生活，以及他们的婚姻观与价值观，等等。研究在描述基本事实的基础上，试图对同性恋在中国文化背景中的某些特异之处进行分析，做出合理的解释。

对同性恋现象的研究本应包括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两个部分，但由于笔者精力及调查线索的限制，只做了男同性恋的研究。

文献综述

1. 关于同性恋历史的研究

社会学者里卡塔 (Licata, S.L.) 在《同性恋权利运动：美国历史一个被忽略的领域》一文中回顾了以欧洲为源头的美国同性恋权利运动史，将其概括为以下 8 个阶段：(1) 从 1908 至 1945 年：在这个时期，只有零散的个人的尝试，试图为同性恋和同性恋者的权利作辩护；(2)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数年间是城市男同性恋者“少数派群体意识”的觉醒时期；(3) 1950 至 1952 年：同性恋者寻找身份认同的时期；(4) 1952 至 1953 年：同性恋者对自己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愤慨爆发的时期；(5) 1953 至 1960 年：同性恋运动加强信息交

流，注重教育领域的时期；（6）60年代：将民权运动引向同性恋运动的时期；（7）1969年：开始出现大规模同性恋运动的时期，（8）1973至1979年：同性恋运动与政府通过正式渠道对话的时期。整个70年代以同性恋运动的联合与成功意识告终（里卡塔，1980年）

艾斯科弗（Escoffier, J.）的研究认为，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大批男性公民参军，女性不得不进入劳动力市场，致使美国的性别分工结构产生了巨大变化，进而导致了战后的性革命。这一革命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人们已感觉到性规范与性行为之间存在着差异的情况下，金西博士对性规范的批判，以及同性恋者提出解放的要求，第二阶段是回潮期，其特征是在性别分工上鼓吹妇女留在家里或回到家里去，在性关系方面对同性恋实施制裁，及鼓励提高人口出生率，然而在这个时期有一批知识分子坚持对性压抑的批判，第三阶段的特征是，同性恋亚文化出现于各大城市之中，社会开始容忍同性恋者对性与性别的看法。（艾斯科弗，1985年）

海伯尔（Haeberle, E.J.）等人在《粉红三角与黄星——纳粹德国对性学的摧残及对同性恋者的迫害》一文中，揭露了纳粹暴行被人们忽略的一个方面。论文指出，许多早期的性学研究以及性学这一概念本身是德国犹太人首创的。希特勒摧毁了德国的性研究和性改革运动。在性科学研究的废墟上，纳粹建立起自己以反犹、反女权主义和反同性恋为特征的性意识形态。纳粹档案中存在着大量迫害同性恋者的证据。同性恋者被关进集中营，在囚徒的等级中被排在最底层（海伯尔，1981年）。劳特曼（Lautmann, K.）的调查发现，纳粹集中营中共有一万名左右同性恋者，他们配带粉红色三角标志（犹太人配带黄星），地位很低，与其他囚徒隔离。与政治犯和犹太人相

比，同性恋囚徒被派给的活更重，死亡率更高，幸存率和释放率更低，但其自杀率并不显著。（劳特曼，1980 年）

2. 关于同性恋自身状况的研究

怀特姆（Whitam, F.I.）在对美国、危地马拉、巴西和菲律宾四国的比较研究中得出下列重要结论：（1）这些社会都存在同性恋现象；（2）在这些社会中，同性恋者在人口中所占比例十分接近并保持稳定；（3）社会规范既不能阻碍也并不助长同性恋倾向；（4）只要存在一个足够大的人群，就会产生同性恋亚文化；（5）虽然所在的社会不同，同性恋者在行为兴趣和职业选择上趋于一致；（6）所有的社会都会产生相似的性关系连续体，从男同性恋到女同性恋种类齐全。全文的结论为：同性恋不是由某种特殊的社会结构产生的，而是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人类性行为的一种基本形式。（怀特姆，1983 年）

迪克森（Dixon, D.）以 50 位异性恋已婚男性和 50 位双性恋已婚男性为对象进行了比较研究，使两组对象在年龄、婚姻持续时间、社会经济地位上互相匹配。研究结果表明，在性满意程度和婚姻幸福程度上，两组间存在区别。首先，双性恋者经历性快感的频率显著高于异性恋者，（双性恋者每周 14.5 次，异性恋者 8.6 次）；其次，虽然两组对象的性满足程度和婚姻幸福程度都相当高，异性恋者的满足程度与幸福程度高于双性恋者这一事实具有统计的显著性。（迪克森，1985 年）

3. 关于同性恋形成原因的研究

范怀克（Van Wyk, P.H.）等人研究了同性恋、异性恋和双性恋的形成原因，发现在各种因素之中，早年性经验是决定因素，其次为性认同和家庭影响等。（范怀克，1984 年）这

一结论与某些人以家庭影响为性倾向主因的观点有所不同。

西麦里 (Simari, G.G.) 等人以 22 至 65 岁的同性恋者为对象, 研究乱伦的经历对形成同性恋倾向的影响。他们将研究对象分为三组, 第一组为无乱伦经历者, 第二组为有在核心家庭中乱伦经历者, 第三组为有在扩大家庭中乱伦经历者。研究发现同性恋者中有乱伦经历的比例很大。其中男性多为同性乱伦 (父与子、兄弟之间), 女性多为异性乱伦 (父与女、兄妹之间)。研究对象对核心家庭中的乱伦经历和异性乱伦经历多持否定态度, 对同性乱伦和扩大家庭中的乱伦则多持肯定态度 (西麦里, 1982 年)

4. 关于对同性恋的态度的研究

凯特 (Kite, M.E.) 综合研究了 24 项已发表的研究报告, 看男女两性在对同性恋态度上是否有区别。一般认为男性比女性对同性恋更反感。他发现在这 24 项研究中, 样本越大的性别对态度区别的影响就越小; 发表日期越晚的性别对态度区别的影响就越大。(凯特, 1984 年) 鲍曼 (Bowman, K.) 在 1978 年对 321 名成年异性恋者的研究表明, 他们对同性恋的态度比许多同性恋者和立法者要宽容得多。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但不反对同性恋, 反而赞成取消对同性恋的种种制裁措施。在研究对象中持上述态度的人具有下列特点: 年轻、无宗教信仰或只是一般的基督徒而非少数教派的信徒, 以及朋友中有同性恋者等等。(鲍曼, 1979 年) 拉森 (Larsen, K.S.) 等人的研究则发现, 对黑人种族歧视程度较低的人对同性恋者的态度也较宽容 (拉森, 1983 年)

5. 关于同性恋者家庭关系的研究

沃夫(Wolf, T.J.)以 26 对结婚二年以上的双性恋者为对象,研究同性恋(双性恋)者作为丈夫的现象。研究发现此类婚姻双方满意程度较高,性生活活跃,丈夫对妻子说明自己有同性恋倾向。此类婚姻的满意程度还与下列因素呈正相关关系:(1) 性生活活跃;(2) 双方坦诚相见;(3) 友谊;(4) 婚前接受医生或心理医生的检查;(5) 宽容的态度;(6) 经济独立。(沃夫,1985 年)布朗芬(Brownfain, J.J.)也以双性恋丈夫为题做过研究。他认为这种人并不少,但难以找到他们。他设法找到了 60 位此类对象,研究他们如何处理异性恋的公开形象与名声很坏的同性恋行为的矛盾,以及欺骗妻子与亲人这种做法的道德问题。研究发现这类研究对象多无意改变自己的生活模式。研究的主要结论是,有些男性具有将同性恋和异性恋协调起来,使二者的冲突降到最低限度的能力。(布朗芬,1985 年)我们对北京男同性恋的研究发现与沃夫的发现形成鲜明对照,同布朗芬的结论倒有相似之处,下节将有详述。

费舍(Fishel, A.H.)研究了同性恋者与子女的关系。许多同性恋父母具有子女抚养权并非常担心会丧失这一权利。研究检验了以下三项假设:(1) 子女会由于父母是同性恋者而蒙受侮辱;(2) 子女会由于父母的同性恋倾向产生自身的性角色冲突;(3) 同性恋的家庭环境不如异性恋家庭环境。研究结果否定了这些假设,反而发现同性恋父亲与子女的关系比一般亲子关系要好,但前提是告诉子女自己是同性恋者。原因在于同性恋者在工作居住等方面受到种种怀疑和歧视的情况下,更加需要子女及其朋友们的了解和支持。(费舍,1983 年)

基本事实

1. 全景描述：次属群体内的行为方式

众所周知，广大异性恋群体中的每一个人几乎都有首属群体（Primary group）和次属群体（Secondary group）这两重生活和两种角色。前者如家庭生活和亲子关系、夫妻关系中的角色；后者如社交生活和市场上买卖双方关系中的角色、医生病人关系中的角色等等。同性恋群体中的首属与次属的两重生活和两种角色与上述关系类似。在这个独特的亚文化群体中，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拥有一些首属群体生活，扮演着其中的角色，如短期或长期的亲密同性恋伴侣生活，隐秘的同居生活等，而每个人又不同程度地卷入一些次属群体生活，即所谓“社会上的”生活，例如在同性恋的聚会地点与不熟悉的同性恋者聊天、喝酒，甚至发生偶然的性接触，双方互不相通告姓名地址，以后也不会再接触。用同性恋者的话来说，这属于“发泄完就走”一类的行为。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接触到同性恋社群这两个方面的生活。我们认为，首属群体内的行为是比较纯粹的同性恋文化，更能揭示同性恋现象的本质，因此应当是我们研究的重心。但由于研究是从次属群体行为开始的，也有必要对“社会上的”同性恋次属群体行为作一全面勾勒。

我们的调查对象有的经常出没于北京各同性恋活动场所。由于常到这种场所活动，他们中间有些人自称为“我们社会上的”或“我们常到社会上走动的人”。还有些人不承认自己是“社会上的”，并对“社会上的”那些人的所做所为表示反感，但是这些人不否认自己有时也偶尔在社会上走动。例如，一位

偶尔到社会上走动的 40 多岁的同性恋者说：“我不愿意在人前表露出这种意向。对那批打扮得花枝招展在街上招摇的人不喜欢。他们没把我们放在眼里，觉得我们不够等级，我却觉得他们给我们这种人带来耻辱。他们有他们的等级观，我们有我们的等级观。我见到这样的人就躲得远远的，也不想了解他们。我觉得他们层次低，文化水平低，出身也比较低，俗里俗气的，我不喜欢他们。我认识的人比较正人君子。”但他又自嘲地加了一句，“也许是虚伪吧。”这位同性恋者还提到自己喜欢的一个伴侣，说“他不是社会上的人，他也不喜欢这些人。他不让我问他的姓名地址。他可能有大人物背景”。

由此看来，首先，在“社会上”（即同性恋活动的公共场所）发生的活动，只是同性恋活动的一部分。我们调查对象联系的其他同性恋者有很大一部分从来不在“社会上”走动。其次（但并非比第一点次要），到“社会上”活动的人所属的社会阶层也许不如那些不在“社会上”露面的人地位高。这一点有个很好的解释：因为地位高的人担心失去和能够失去的东西要多些，如名誉、优越的职业地位等。据我们的调查对象说，北京的同性恋文化群体中有不少名人，尤其在文艺界体育界中。他们的身份一旦暴露，则可能失去的东西就远比一个普通职工或无业青年要多。尽管属于同性恋群体的人在文化层次和社会地位上差异悬殊，他们却有一种独特的等级观与外面的世界（异性恋世界）形成对照。一位常在社会上走动的同性恋者说，“我们这样的人各行各业都有，从扫大街的到领导干部都有。在这里人人都是平等的。”

全北京究竟有多少经常在社会上走动的同性恋者？据一位经常出入这种场所的调查对象说，全北京至少有 1000 多个同性恋者他可以达到见面眼熟的程度，仅他居住的 ×× 区就有

200多名。加上大量从不在社会上活动的同性恋者，人数还要更多。据另一位调查对象估计，北京男性中有 1—2% 是同性恋者，那么在全北京 500 万左右男性公民中当有 5—10 万人。我们认为这一数字还是比较保守的。金西博士的调查表明美国的终身同性恋者占人口的 4%（金西，1948 年），而有研究发现，各个文化中同性恋者在全人口中所占比例相差无几。（怀特姆，1983 年）

据调查对象说，北京有 55 处同性恋活动场所，提出这个数字的人也不能把这 55 处数全，看来是另有人做过统计。这些场所中很大一部分是公共厕所，尤其是附近有绿地、花园的厕所。这是结识“社会上的”同性恋者的主要场所。一位 46 岁的同性恋者说，他常去的此类场所有七八处，因为总去一处出事的危险性比较大。这些场所有的只在晚上八九点钟以后才有同性恋者活动，有的却是全天都有人。如北京 ×× 区有个不收门票的公园，来去自由，不引人注意，又处于市中心，因此成为同性恋者全天活动的地点。

同性恋者选择厕所作为接头地点有几个原因。其一是通过对方对生殖器的反应确认其同性恋身份。如果是“圈外人”就不会有任何特殊反应，因而这是确认对方同性恋身份的万无一失的途径。其二是为了在外貌之外对方做进一步的观察。因此厕所又成为寻找适意伴侣的惟一适当场所。此外，厕所当然也是最安全的地方，两位男子即便素不相识，在厕所里攀谈几句也是无可非议的。北京有两座条件较好的公厕，曾被同性恋者戏称为“东宫”和“西宫”，一度成为同性恋活动的中心。某年夏天的一个雨天里，“东宫”、“西宫”到了一百多名同性恋者，因为这种天气除上述方便之处外，还有极好的口实对付盘问（可以说是避雨）。据说在夜深人静时，女厕所也被采用

为男同性恋的活动地点，因为女性深夜绝少上公厕，且女厕又不易引起警方的注意。

公共浴池也是同性恋者接头和活动的场所，其做法往往是在池内用脚接触对方，如果对方喜欢，就做出回答。

厕所之外的地点如绿地、街心花园等，有时成为同性恋集体活动的场所。这些活动包括跳舞、聊天，有时甚至还有性行为。在极端的情况下，这些性行为甚至有人旁观。还有一类地点不是每个同性恋者经济上都能负担得起的，那就是大饭店的酒吧和舞厅。

我们的调查对象一致认为，在公共场所辨认一位同性恋者并不困难。这其中的诀窍很难为外人领会，如“同性恋的眼神有渴望感”，“当你注意他时，他也注意你”等等。一位调查对象说：“这种人互相之间不用讲话，眼睛会说话。不管在什么时候都能认个八九不离十。双方眼光一碰就像触电一样，能意识到。”有趣的是，不只一位调查对象使用过“触电”一词，由此可以证明这种相认方法之普遍适用。许多互不相识的同性恋者就用这种方法接上头，然后大多会去其中一人的住处，因为到旅馆开房间不是一般人常常负担得起的，而且也并不绝对安全（不可能做到完全匿名）。

同性恋者在社会上交往时，大多不愿告诉别人自己的真名。每个人打过交道的数十个甚至成百个人中，大多数互相并不知道真名、地址和工作单位。有些只发生过一两次关系的人隔些日子再见时甚至完全不记得曾和对方打过交道。这一方面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另一方面也是由次属群体关系的性质所决定的。只有极少数互相愿意长期深入交往，又对对方绝对信赖的人才互相交换真实的姓名和地址。例如一位自称与数百人有过交往的同性恋者说：“有人说我是公安局的、安全部的、卖

水果的、二道贩子、铁路上的、饭店加工间的，我就让对方相信我是干这个的。对不打算深交的人我就说假话，有的一看就喜欢他的就说真话。”

同性恋者将结识这种萍水相逢的伴侣叫做“挂客”。这一点已被警方掌握，并用来鉴别同性恋者。办法是把捕获的双方带开，令其说出对方的姓名与工作单位。我们的调查对象中有三位有过这种经历。如碰巧对对方熟识，能说出姓名地址，警方就不深究，因为没有证据将他们与非同性恋伴侣严格区分开来。

互相攀谈无疑是“社会上的”同性恋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一位被调查的同性恋者说过这样一段话：“出去玩不见得是为了找性伴侣，有时就为散散心。在烦恼时，一聊天一开玩笑，什么苦恼都没有了。有一阵我天天去，这些朋友在一起也得到不少东西，互相聊天有道理的话也不少。知识、社交方面学到不少东西。”另一同性恋者说：“有一天我在北京饭店跳舞，后来觉得跳舞没意思，想认识些朋友，出去逛逛。那天天气特好，不冷不热，我化了点淡妆，从 N 街骑车向北，没有和谁做爱的意思。我往马路上一站，好多人围着我转……他过来了，长得不算好看。一般人装束。他问：你是不是叫小 A 啊？头三四年就听说你了，你看我好吗？我回答说，你不错啊……”

除了这种个人与个人的接触，在同性恋活动地点也有集体行为，比如 1985 年夏天，在靠近紫禁城的一个集会场所，众多同性恋者集合起来评选了北京同性恋的“十大明星”、“四大淫妇”、“五大童子军”等，选举的方式是根据提名后所得到的呼声大小，选出之后又把名字（绰号）写上红墙。这次聚会甚至惊动了外国记者，写出了一篇报道（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查到

原文)。

在集体行为的背景下，容易产生非理性的个人极端行为，如以下事例：“小 C 做了一件旗袍。有人问：你敢不敢穿着上 × 处去，他说敢。结果他穿着旗袍、高跟鞋，还有人挎着，一块儿去了。……那天正好碰上大抄，他叫人逮住了。”小 C 的行为有几分出于易装癖倾向，几分出于集体行为气氛的感染。提供上述情况的调查对象认为，小 C 是“起哄”去的。

尽管此类“社会上的”同性恋集体行为为一些社会地位较高的同性恋者所不齿，但在较低的层次却很被看重。有人为了给自己“拔份儿”、“扬名儿”，不惜做出过激举动。例如，× × 区一个同性恋者，招了 16 个人，挨个为他们口淫。出现这种极端行为的原因是他气不愤所谓同性恋“十大明星”的名气，要干这件事给自己扬名。有些同性恋者是从“社会上”“学习”同性恋行为的。我们的一位调查对象谈到一对同性恋同居者时说：“这俩人嘴紧，做爱的方式不外传。一般人都说出自己的做爱方式，别人还可以指点指点。”看来同性恋在“社会上”的活动还有“学习”和交流信息的功能。

上述同性恋的次属群体行为之所以为一些社会地位较高的人视为畏途，还因为它有危险性。危险主要来自警方。

警方目前对同性恋的一般做法是拘留审问，存档后教育释放。过去不通知单位，现在有的通知单位。社会地位较低的同性恋者似乎不太害怕通知单位。例如一因盗窃罪判过刑的同性恋者说，“通知单位单位也会为你保密，这事怎么说呀，不是偷也不是摸。说有同性恋行为又没抓住把柄，单位也没法说什么。”

那些社会地位较高的同性恋者则比较害怕。一位同性恋者告诉我们，他的一个“恋人”不慎被抓，材料要送单位。他是

军人、医生，又是党员，非常害怕通知单位，于是这位同性恋者想办法托人将材料销毁了。

同性恋行为如不涉及未成年者，无人告诉，则很少导致法律制裁。以下是一个受到法律制裁的事例：有一成年同性恋者同一个 16 岁（一说 12 岁）男孩发生肛交行为，不慎被男孩家长发现，告到法庭，尽管那男孩上庭承认自己是自愿的，那成人仍被判处 7 年徒刑（鸡奸罪）。这大概是对同性恋最重的法律处罚了，较轻者有劳教和 15 天拘留。

据调查，“社会上的”同性恋行为有时与金钱有关。有几位调查对象提到小 B（十大明星之一）借同性恋关系向人要钱。但另一位调查对象说起同一件事时则说，小 B 要钱只是为了要对方表示真心，后来又把钱退了回去。后者是小 B 的朋友，两种说法的真伪尚难以判断。还有一些岁数大的人愿出钱“养活”同性恋少年。一个被调查的同性恋者说：“有个二道贩子找到小 B，什么也不干，就让小 B 陪着他，给钱，给衣服。这是享受心理，摆阔呗。”小 A 也遇到过类似情况，他说：“我遇见一个日本人，说出十万日元，什么都不要求，只要求陪一星期。我说陪一天试试。跟着他出了一个饭店又进另一个饭店，拿我炫耀。晚上还分房睡，也不做爱，我觉得很没意思。”因为小 A 在北京同性恋圈子里很有名气，这位日本人要他陪他有点人前显贵的意思。这位小 A 曾说：“我跟他说，同性恋是一种感情，你不理解。就这样和他分手了，也没要他的钱。”

以上所述为“社会上的”同性恋行为中较极端的例子。在这个层次上，有不少感情以外的因素在起作用。谈及这些事实是要指出同性恋群体生活的边际所在，勾画出一个全貌。男性同性恋行为的主要内容当然还是围绕着两个男子之间的感情进

行的，即所谓首属群体行为。以下各节将围绕这一主要内容展开。

2. 入道方式与形成原因

我们的调查对象中，有人已有三十年的同性恋史，也有人才“人道”不久，有人一开始就是从“社会上”学得同性恋的，也有人属于无师自通，然后走向社会。然而，有一点却空前一致——他们的同性恋经历均始于性朦胧时期。

举一个无师自通的例子。被调查的一个同性恋者说：“中学时我是性盲，有一点性欲。十六七岁时，男女同学间不讲话。一个男同学是我的好朋友。有时住在他家，同时就有了这种欲望。没有感觉性别间的区别，但是有性方面的好奇心和朦胧的感觉……（做完后）觉得妙不可言。”

性朦胧时期的少年性目标尚未固定，很容易做出同性恋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会成为终身同性恋者。我们的调查对象提供了下述实例：“有一天晚上，我们几个同学在一起看录像。后来女孩子离开了，我们6个男孩在一块，就说比比谁的生殖器大，比比看谁流得快，流得多。开始自己弄，后来就互相弄。”这位调查对象当时虽已是自觉的同性恋者，却没有加入这个活动，据他说是怕控制不住自己，做出得罪这几个朋友的事情。

上述集体行为显然同自觉的同性恋行为有异，虽然从表面上看这是不折不扣的同性恋性行为。金西博士关于同性性行为的定义是：“一个男性与另一个男性发生肉体接触，并因此而达到性高潮。不论心理刺激的状况如何，不论采用何种技巧，不论是否经常这样做，不论是否还有过异性性行为，这种同性间达到性高潮的肉体接触就是同性性行为。”（金西，1948年）

前例中的那 5 位中学生后来并未成为同性恋者。本节开始时那一事例中的两个人后来有一个成为同性恋者，另一个则中止了同性恋行为。后来成为同性恋者的那个人自述说：“后来他当兵走了。他回来时，我去找他。没有异性伴侣时，同性他也能满足，可那时他已有女朋友。结婚后他再没有这种欲望，我就退出了。”

这个例子就解释了金西调查书中所报告的“有同性恋行为者”（37%）和“终身同性恋者”（4%）之间的比例差距。一位同性恋者对二者之间的差异做出如下解释：“我觉得同性恋有先天潜意识的原因，没有土壤（即造成同性恋的条件）欲望就不强，如果碰到男朋友，就一发不可收拾。”

在我们调查的范围内，无师自通的同性恋者是少数，多数是由资深同性恋者引诱入道的。一同性恋者回忆道：“是人家教我的，我一个同学和我住楼上楼下，我常去他家玩，在那里碰见了那个人。一次我到同学家，他从楼上下来了，聊聊天，说觉得我好。摸摸手，摸摸脸，让我明晚上他家。我去了，住在他那儿，他跟我睡一被窝。开始没觉得不好意思，后来他让我把内衣内裤脱了，我说那哪儿成呀……第一次觉得很讨厌，后来就觉得好了。”十大明星”之一小 A 是这样入道的：“上初中时我就懂了。我们街坊有个二叔结了婚。他爱人怀孕，他让我上他家去听录音机（当时有录音机的人家还不多）。当时我 16 岁。我觉得什么都新鲜。他说你累就在床上躺躺。我躺在床上问他结婚是怎么回事，他就对我说了。他搂抱我，吻我。我一开始躲，后来就不躲了……我觉得很有意思。”

此外，还有由于纯属偶然的原因被诱入道的。一同性恋者说：“我 17 岁懂这事的。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那年国庆节，广场上有焰火晚会，我在那晚会上碰上一个日本朋友（学

中文的留学生)，他和我聊天说起这方面的事，问我感不感兴趣，说晚会完了约我去玩。我觉得挺新鲜，但对他说不行。他把地址留给我，是×校的留学生宿舍。后来我去找他，是个星期六。他说今晚别走了，在一起喝点酒。我说不会喝酒，他说不会喝就睡觉吧。然后对我又吻又抱，把事也办了。并希望我以后再来。我又好奇又害怕。他告诉我哪些地方有这些人，我就慢慢和这些人接触起来了，”这位调查对象一再强调，如果没有这次偶然的机会有，也许自己到现在仍然对同性恋一无所知。

另一偶然机会入道的事例：“我以前没接触过这种事，一次上公厕，见一个年岁挺大的人本来站着突然蹲下了，我也蹲下，他开始用手抚弄生殖器，我没反感，但有点紧张。他见我并没有反感就胆更大了。正在这时有人进来，他示意我跟他走。我跟他出去一谈，他以为我知道这种事，我告诉他我不知道，他就给我讲了社会上的事。”

有些同性恋者热衷于“发展”新人，这也是同性恋者入道的方式之一。

一位调查对象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小D对我说，一次在浴池，他发现一个老头在勾搭一个小伙子，小伙子长得很漂亮。他凑过去问那小伙子：这老头干什么了？小伙子答：他老碰我腿。他把老头赶走，和小伙子聊起来，问他知道不知道这种事，小伙子说知道但是不喜欢。结果出了浴池他把小伙子带回家去干了。后来他跟我说：‘我发展了一个’，还说：‘不能让他知道社会上的事，到外面他就毁了。’”

虽然不少同性恋者拼命试图肯定自己的行为及在社会上的地位——主动去“发展”新对象就部分地源于这种动机——但也有不少人在“带坏”别人方面存在“恻隐之心”，特别是对

那些天真无邪的少年以及亲友近邻。例如，一同性恋者说：“有个比我小两岁的男孩对我说，我特别喜欢你，你长得漂亮，对人温柔。我说，你喜欢我能为我做点什么事吗？他把我名字纹在胳膊上了。我说你这是干嘛呀？他说，为了永远记住你。他 22 岁。我本想教教他，又想别这样做，我怕他发痴露馅，因为我们是邻居，两家父母都认识。”

有些人从开始同性恋行为到自认为是一个同性恋者中间还有一段过程。一同性恋者说：“明确意识到同性恋这个词是 × 年认识 × 国的一位外交官。一起跳舞喝酒，看中文杂志。从那时起才认识到自己有这种倾向。他试探出我有这方面的经历，因此我也就没必要拒绝他了。从那时开始认为没必要隐瞒（自己是同性恋者），两人的关系持续了半年。”这位调查对象除同性性经验外，还有过异性性经验。在一段时间内可以算作双性恋者。他认为自己已逐渐固定于同性恋取向。

还有些同性恋者开始只是和同学朋友邻居交往，后来才因偶然的机会有走向“社会”。一同性恋者入道后的经历是这样的：“高一时我出去玩，无意中发现了社会上的事，觉得有意思。我们院那人（引他入道的人）一直不知道我在外面有伴，直到我花 8 块钱扎了耳朵眼，他吓了一跳……”

从这些人的经历看，不少同性恋者在最初入道之后，有个从意识朦胧到逐渐明确认同于同性恋的过程，还有一个逐步从身边的专一伴侣走向社会的过程。

除了性朦胧期的经验，同性恋者的家庭环境也是使他们走上这条路的一个原因。一男同性恋者讲：“我妈是个善良的妇女，总受我叔叔们的欺负。我的性格像妈妈。我对父亲反感，觉得他不爱我们，家长作风让人反感。他对我们不负责任，我常常想，他既然不爱我们为什么要我们。”看来，从小认同母亲

（女性）是长大后变得“女气”，成为同性恋者的原因之一。

还有些同性恋者有从小受到女性化教育的经历。一男同性恋者回忆道：“我小时候脾气急躁，我妈让我学女红磨性子。我从小爱编织，上学时学过织毛衣，也学绣花。”他后来成为同性恋者之后，就常常帮助同性恋恋人织毛衣。这种女性化的教育看来也是青少年步入同性恋之途的原因之一。

此外，家庭对男孩子的过分溺爱也有可能造成同性恋倾向。一同性恋者说：“从小父母十分溺爱我，要什么都给。我从小学五年级就知道自己要打扮了，人家有的我都要有。那年社会上刚刚恢复烫头，我就把头烫了。学校让我把头发剪了，否则开除，可我宁肯不上学也得烫。我还学了摘眉毛，专门学过化妆和装束。”

有的调查对象从对周围伙伴的观察中总结出如下规律：同性恋者是家里老大老么的多，独生子女的多，家里只有一个男孩其他都是女孩的多，家里是干部、知识分子的多。这些孩子正好是最容易受到溺爱而且有条件受到溺爱的。

在同性恋形成原因上一个最困难也是争论最多的问题是：它究竟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我们的调查对象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莫衷一是。有的坚决认为是后天的，如那个被日本人引诱“人道”的人就一再强调：如果不碰上这个人教会他，他一辈子也不会走这条路，而另一位几次试图像戒烟一样戒掉同性恋倾向结果不能成功的人就偏向于先天论。主张后天论的人还有认为同性恋者都是因为在青春期时在异性恋上受挫或自觉不自觉地压抑了自己的异性恋性取向，结果才转向同性恋的，主张先天论的人们当中却盛传一个典型先天同性恋者的故事：据说他是北京某著名艺术团体的演员，因为搞同性恋被领导找去谈话，他说：“我没办法，你们把我杀了吧。”在这两种意见之

外，还有人认为先天后天两种情况都有，关键在于性朦胧期的遭遇。目前我们比较偏向于这最后一种观点。

3. 感情生活与性生活

如前所述，同性恋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一对一的关系。前面述及一两个类似乱交的事件，我们的调查对象也认为属极端现象。一位调查对象将同性恋者在感情与性问题上的行为模式分为三类：一类是感情接触，一类是性接触，还有一类是感情和性的双重接触。值得注意的是，具有感情色彩的关系在全部活动中所占比例甚小，至少在那些常到社会上走动的人中是如此。不少调查对象都有过同几十人或上百人性交的经历，但其中真正具有感情色彩的仅仅有四五次或稍多一些。这就是为什么同性恋者常常能同时和好几个人“好”（保持接触，其中包括性关系）的缘故。

然而，不能否认的是，在那些真有感情的关系中，同性恋的感情生活与异性恋的爱情相比，无论从形式、内容还是热烈、真挚程度上看都十分相像，只是对象的性别是同性。这一点对于广大异性恋者似乎是难以想象的，但我们调查中了解到的一个个同性恋的“恋爱事件”在当事人身上却显得那么自然、真诚，无可怀疑。下面是一个单恋的极端事例：小 E 有个好朋友把他甩了，很长时间见不到这朋友的面。一次在 ×× 桥两人碰上了，小 E 问他是怎么回事，那朋友没理他。小 E 一气之下故意向旁边几个小伙子（非同性恋者）挑衅，结果被人围殴，小 E 问他的朋友：你为什么不帮我？朋友绝情地说：“我帮你也让人打一顿？”小 E 一听当场晕倒，送到医院后发了神经病。

虽然这个单恋的例子即使在异性恋伴侣中也属极端，但其

感情不可谓不真。同性恋者叙述自己恋爱经历时所使用的词汇与异性恋也完全一样，如“爱上”、“占有”、“海誓山盟”、“感情破裂”等等。

一位同性恋者这样叙述他的一次罗曼史：“那年我爱上一个人，爱得神魂颠倒。我们有三个月时间，每星期有三四天住在一起。我爱他，他也爱我。他有一个女朋友，但他对她完全是在演戏。我们虽然有海誓山盟，但后来感情还是发生了裂痕，我怀疑他另有男朋友，在欺骗我。我跟踪他，到他门前守候，发现他夜不归宿，去和别的男朋友睡觉去了。我对他说：我付给你爱，你不能拿我的感情开玩笑。我当时真想去把他男朋友的家给砸了。他对我说：我不会故意伤害你，但我也不知是怎么了……”这段恋爱史中的感情纠葛及其认真程度丝毫不逊于异性恋爱。

S 经历过的一系列“恋爱事件”中的感情纠葛的认真程度较之上述事例，更有过之：“那次与 N 偶然相识和简单交谈后，他约我 × 月 × 日去 × 处，我去了。去时正碰上从小认识的几个朋友。大伙说去喝啤酒。到饭馆里喝着酒，我说我今天约了一个好的，让你们开开眼。这伙人正嚷嚷起哄，他来了，我摆了三瓶啤酒三瓶汽水在面前，和朋友们说些个‘社会上’做爱的事。他靠门站着，看着我，不进来。我说‘约好的来了’。那帮朋友起哄说，这人怎么长得这样，老学究似的。我叫他坐下，给他一瓶啤酒，他不喝，哭了。那几个朋友见状就都走了，只剩我们俩。他说，为什么招这么多年轻漂亮的？为什么向我示威？你肯定瞧不起我。我对他态度挺横，他给我信我不看。他说，你不看我就死在这儿。我看了信。我对他说，我不是在这些中寻找爱，是交朋友有用。他说，我不让你这样，我喜欢你，我要独占你。我说，谁也别想独占我。他不问我真

名地址，说，‘如果你爱我，会主动告诉我的’，他却把自己的真名地址都告诉了我。”

在“社会上”，谁都不想被别人知道自己的真名字。这种不问对方姓名就把自己交到对方手里的做法，有点“倒执太阿、以柄授人”的味道。这位追求者 N 写了很多缠绵的情书，除了显示出文学修养和修辞才能之外，感情也十分真挚热烈。在 S 25 岁生日之际，N 甚至将写给他的一首情诗在报纸上发表了。S 在一段时间内接受了对方的感情。这段时间的经历说明同性恋与异性恋的感情一样是排他的。S 如此描述他与 N 的交往：“从 7 月初到 9 月中，他一直接送我上下班。我要出去就跟他说‘我出去’，他允许我同别人接触，但不能做爱。每次我出去他都远远看着我。那段时间，每晚 6 点半他一准接我到我家，晚上把我送回家，我从不在他家过夜，我怕真爱上的他不可自拔。那段时间说幸福也幸福，说不幸福也不幸福……”这段感情可算得同性恋感情生活中的典型事例。

在同性恋的感情生活中有追求者与被追求者的角色之分。有些调查对象承认他们正在寻求一位值得追求的人，另有人则认为“爱人是痛苦的，被爱是幸福的”。而这两种角色不是不可转换的，正如一位调查对象所说：“今天我被追求，明天也许我去追别人。”这一点同异性恋完全一样。但有一点与异性恋绝对不同，同性恋感情上的角色往往与性生活中的角色有关，感情生活中主动的追求者，往往要在性生活中扮演被动的接受一方。同一个人在与不同对象的性关系中变换角色，这是异性之间难以做到的。

关于同性恋的性行为方式，一般圈外人总以为是以肛交为主，其实不然。我们的调查受条件所限不能做定量统计，但我们深入访谈后所得到的印象是，在“社会上”的同性恋者之

间，肛交所占比例并不大，而口交的比例则大得多。原因有以下三点：据调查对象反映，首先，肛交受到身体条件限制，并且完了事要立刻洗澡。北京的大多数同性恋者很难找到有浴室的房间作为发生关系的地点，因此这一说法令人信服；其次，照一位调查对象的说法，“干这种事，除了卫生条件好，总还得有点什么原因。或者爱别人爱得发狂，乐意接受别人肛交，或者自己年纪大了，条件不好，对方条件好，才乐意接受。”再次，同性恋者中间有一种说法：“一般乐意接受生人肛交，不乐意接受熟人肛交。熟人之间都怕因这种事闹矛盾，所以长期的关系中肛交很少，多是互相口淫。”总之，一般同性恋者都有肛交的经历，但它似乎是较不寻常、较为重大的事件，至少不是做爱的主要方式。

如前所述，同性恋者的性生活中角色可以变化，往往有一方角色地位较高（男性角色），另一方角色地位较低（女性角色）。由此就产生了谁来充当低角色的问题。在同性恋群体之中，一般的行为规范是，年纪小的、条件好的、被人追求的角色地位高，年纪大的、条件差的、追求别人的角色地位低。因此，就有“刚刚入道的人一般不肯接受肛交，觉得吃亏”，“年纪小的连为别人口淫都不乐意”等等说法。这里还有个习惯问题。据说有人肛交上瘾，专门喜欢扮演女性角色，接受肛交。

调查对象们常常将“接受肛交”（与之相对应的是“施予肛交”）与受虐混为一谈。他们说，“接受肛交就是受虐。”与异性恋在同一次动作中双方都能达到快感高潮不同，同性恋者的性行为方式（肛交、口交）一般总是一方痛苦，一方快乐；一方服务，一方被服务，因此他们才将主动（施予）一方视为施虐，将被动（接受）一方视为受虐。正如一位同性恋者所说：“谁都不情愿当被动角色，喜欢主动角色。如果找到弱的，

就扮演施虐角色，找到比自己强的就扮演弱的受虐角色。但因为怕失去对方，也经常互相交换角色。”

有时，某人会因为强烈的负罪感而自贬身价，在性生活中扮演被动接受的一方，甚至流露出受虐或自虐的愿望。同性恋心目中的施虐、受虐概念同性社会学中所定义的那种在异性恋与同性恋性行为中全都存在的虐待狂（*sadomasochism*）不是完全相同的概念。然而，经典意义上的虐待狂行为在北京同性恋的行为中也有表现，但它“并不是真正的暴力”，而是具有游戏性质的。例如，一同性恋者说：“我遇到过一个上海的（同性恋者）希望我打他……他越痛苦，我越痛快。他受虐是心甘情愿的。”据另一调查对象讲：“小 H 和人发生关系时很粗野，拿绳捆上；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不会体贴。小 B 有一段时间和他在一起，身上常有烟头烫痕……有人愿找虐待狂，愿意找两三个人带他到一个地方，几个人同时对他施性虐，招他，打他，用烟头烫他……”

捆绑和鞭打正是典型的性虐待狂行为。这种行为不论在同性关系还是异性关系中都是极端现象，性学将这种行为专门划归“性少数派”之列，它同一般同性恋行为中的主动与被动角色这一意义上的“施虐”、“受虐”显然是有区别的。

一位主张同性恋有先天后天两种成因的调查对象还总结出如下规律：先天的同性恋者爱扮演被动角色，后天的爱扮演主动角色，因为那些先天的同性恋者一般都比较文弱，女孩气较重。他的说法也许不无道理，至少是关于同性恋性别角色的经验之谈。

关于发生性关系的频率。这一点当与年龄和身体状况有密切关系。一位同性恋者报告自己的性交频率如下：“我 19 到 20 岁时身体最好，每天平均超过两次（以达到性高潮为一

次)。21 至 22 岁时每天平均两次，23 至 24 岁时每天平均一至两次，25 岁以后明显感到不如以前，也不想玩，平均每天不到一次。”另外一位报告说，自己在 20 至 24 岁间平均一星期两次，到 24、25、26 岁时频率最高，一星期有五六次，随后到 30 岁，平均两天 1.5 次。一位 46 岁的同性恋者说，自己在 30 岁时差不多一天一次，现在一周一两次。要了解同性恋者性交的确切频率当有大量调查统计数据，限于调查规模，目前我们只能得到个案数字。但据我们的调查对象说，他们的性交频率在周围同性恋者当中属常态，不过多也只不过少。他们提供的频率数字与文献综述一节迪克逊调查的数字相仿（每周 14.5 次），我们认为比较可信，且有代表性。

一般同性恋者的“性感”标准是什么样的呢？据一位在圈内以“性感”著称的同性恋者说：“着衣要突出肩膀、臀部和腿。身材不分高矮，主要看眼神、步态。还有首饰、化妆。耳朵漂亮很重要，接吻时能看见耳朵，有人在耳壳上施点粉。用唇膏的人很多，一般先涂上，再用纸抹去，剩下一浅层。肩膀浑圆的性感，但肌肉发达不性感。上身三角太大不好，无三角也不好。皮肤有人爱粗，有人爱细。穿体操服很性感，但是体操运动员不性感。他们太壮了。”从这些叙述中，可大致看出男同性恋的性感标准。但是异性恋者对此很难产生共鸣。彻底的同性恋者对异性也毫无感觉，在这一点上和我们是同样的。

同性恋者是否喜欢男人长得女气呢？这是因人而异的。一位调查对象提起某人时说：“他长得太漂亮了，穿上军大衣和女的完全一样。”可也有些同性恋者讨厌女气，如另一位调查对象说：“有的男人有女气让人恶心。但也有例外。我认识一个男孩子，有一种活泼的孩子气的女气，很可爱。”由此可见，

同性恋者也并没有一种统一的审美观，这一点和异性恋很相似。

对于我们的调查对象们来说，固定的同性恋对子总是不能长久。经调查可知，同性恋者的固定关系长不过一两年，短不过一两次会面。这种情况有可能来自我们的样本偏差，但至少代表了部分社会上资深同性恋者的经历。对这一现象有多种解释。第一种解释如一位调查对象所说：“据我自己的观察，同性恋者的性欲比异性恋者强烈。有了长久的关系，欲望就会淡下去，经常换伴就显得强烈。”第二种解释是另一位调查对象提供的，他认为，同性恋的伴侣“取之不难，弃之也就不可惜了”。喜新厌旧是人的本性，异性恋者如果不受限制也会如此（经常更换伴侣）的。第三种解释是这样的：“同性恋者大多是文弱胆怯的，希望对方强悍。同性恋男人爱的是异性恋心目中真正的男人。由于在一起时都希望对方更像男人，所以不能长久。”这段分析颇似影片《蜘蛛女之吻》中那位同性恋者的自白：“我始终在等待一个真正的男人，可是真正的男人要的是真正的女人。”这其中的辛酸，真不能为外人所知。

然而，调查过程中也发现过与上述想法截然不同的情况。例如一同性恋者说：“跟我们厂的那男孩同居十年二十年都可以。他特别细心，温柔体贴。我喜欢吃鱼，他尽力去找，买不到回来就说：我没买到。那种口气真叫人感动。”在解释为何并未真的同居时，这位调查对象说：“就算许可同居也不能这样做，因为要给父母和社会尽义务（传宗接代）。”

对于我们的调查对象来说，固定的同性恋伴侣关系（首属群体关系）总是短命的，而“社会上”的同性恋生活（次属群体关系）却是长久的，虽然偶有间歇。这或许是为同性恋生活方式的特点所决定，或许是因为他们在同性恋群体中是一个特

殊的人群（只有他们才经常换伴）。总而言之，对这一点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和研究。

4. 婚姻观与价值观

我们的调查对象中没有一个是西方意义上的“公开的同性恋者”，即使那些在“社会上”十分活跃甚至知名（所谓知名并非真名而是绰号）的同性恋者也不愿让家长亲友知道自己的真实倾向。虽然与他们关系亲密的人中有些会怀疑到他们的真实倾向（少数因同性恋行为被判刑或判劳教、拘留的人的家属当然能了解到），但他们绝不会主动让人了解到这一点。

在中国社会中，这个秘密有个必定要泄露出来的时候，那就是到了结婚年龄时——因为健康的男性在中国几乎人人都要结婚，所以不结婚就会引起怀疑。我们的调查对象中有的已结了婚，还有的正准备结婚，真正准备终身过独身生活的只是极少数。所有的人中没有一个是征得妻子同意的双性恋者，整个调查过程中也没有听说过有这样的事。因此可以断定，同性恋在中国必定是或将是背着女方（妻子或女友）进行的秘密活动。于是就产生了一个如何看待和处理婚姻关系的问题。

在婚姻观问题上，我们首先发现，在同性恋者心目中结婚是一件“跌身份”的事：同性恋者小 A 对他新结识的一位同性伴侣 J 说：“我不喜欢结婚的人，觉得他们没有人味，对女人也不真，对男人也不真。”殊不知 J 恰恰是结了婚的，还有一女儿，因怕失去小 A，J 一直瞒着没敢吐露真情。但后来出于对小 A 的感情，他还是诚恳地坦白了。小 A 很生气，说：“我以后再也不见你了。”J 悲痛欲绝，在给小 A 的一封信中语无伦次地表达了他对小 A 的感情和对自己婚姻的矛盾心情。他在信中写道：“请你相信我，我是永远爱你一人的，至死不

渝.....我已经是结婚的人.....我总是觉得对不起你..... 我的结婚是痛苦的，一直不知用什么方法来挽救.....请你理解我，现在我的心都快碎了.....我是结婚的人了，提起这几个字我心里非常烦恼，心里感到压抑，对不起你..... ”

在下面的例子中，一对同性恋者发誓 30 岁以前不结婚：“我遇到一个小我一岁的工人，对他有好感，他也喜欢我，我们很疯狂地相爱了，这爱一直保持到他结婚。是我允许他结婚的。本来我们有个约定，30 岁以内不许结婚，但一次他和我闹别扭，我同意他结婚了。”

结婚除了使同性恋者在圈内的等级下降，还会限制他们的活动自由。当问到一位 26 岁的同性恋者为什么还不结婚时，他说：“我想再玩一年，结婚以后就不能随便出来了。”当然，许多已婚的同性恋者仍旧到社会上找同性恋伴侣，他们对结婚以后的限制就不可能认真对待了。只有那些尚未达到不结婚就会引人注意的年龄的同性恋者和极少数真正决定终身不娶的同性恋者才会有这种看法，他们当中有些人甚至持有相当严厉婚姻道德观。一位决心独身的同性恋者充满同情地说：“最痛苦的是同性恋者的妻子。我在 ×× 宾馆认识一个同性恋，他的妻子和别人乱搞（男女关系），被单位抓住开除了公职。这个同性恋者竟然跟他老婆离婚了。可那女的实际上是受害者，她丈夫满足不了她嘛。我觉得他这样做不道德，结了婚就不该出来了。”

既然如此不愿结婚，他们为什么还都要结婚，他们又是如何看待婚姻的呢？首先是怕暴露自己的真实性倾向。一位调查对象说：“不搞对象怕邻居说我有病，往这边想（怀疑是同性恋者）。”婚姻成了掩盖真情的手段，却并不会真正制止同性恋的活动。一个调查对象说：“结了婚搞同性恋的多了，有抱儿

子、孙子、重孙子的，老婆全都不知道（丈夫是同性恋者）。 ” 其次是为了对父母尽义务，为他们着想。一位调查对象说：“我倒不怕别人说，但要为父母着想。”再次是为社会尽义务。当我们问一位结调查对象结婚后是否打算要孩子时，他说：“当然要生孩子，结婚不就是为了要孩子吗。”另一位将同性恋的婚姻观表达得更明确：“我想以后该结婚还得结婚，男的是传宗接代的工具，对社会要尽义务。”

既然男同性恋必定是背着女方进行的秘密活动，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败露了怎么办？同性恋活动败露后，牵涉的不只是配偶，还有家庭、单位、社会等方面，但首当其冲的是配偶。我们调查中一个极其意外的发现是：同性恋行为暴露后，配偶方面的反应似乎比预想的温和。据一位调查对象说：“有一位家住××的，干这事（同性恋）被逮住了。家里（妻子）一开始要离婚，后来没离成。还有一位40多岁的干部，在党校和一个30多岁的男人同居，逮住了按鸡奸算，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也没离婚……”

提供上述事例的调查对象总结道：同性恋败露后，妻子闹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比（异性）第三者插足要轻。关于这一事实的重大意义在下节将有详细讨论。

总的来说，同性恋者处理婚姻关系的做法可概括为三种模式。第一种是抱着对妻子的负疚感克尽作丈夫的义务。一中年同性恋者说：“我爱人很爱我，我也挺爱她。从法律上说，我只能有一个爱人，我有对不起她的感觉。我欺骗了她。我在性的方面尽量满足她，我不能让她得不到。要尽义务，要让她幸福。”

第二种做法是把妻子改造成能适应自己状况的人。一个即将结婚的同性恋者说：“我要是真和她结婚，就要让她一辈子

不知道（我的同性恋倾向）。人的性欲是可以培养的，可多可少，可高可低，特别是没有性经验的人，很容易被培养成性冷淡的人。就像有人天天晚上要喝茶，可如果让他天天晚上不喝茶也就不想喝了。我要给她一个心理障碍，让她想不到这一点。当然我在其他方面都会好好照顾她的。”

第三种人是不能成功做到上述任何一种模式的失败者，等待他们的大多是婚姻的破裂。一调查对象这样谈到他的一位男友：“他现在连逢场作戏都作不下去了。我曾劝过他，你不爱那女孩不要和她结婚，他勉强自己去结婚，一个月也不和太太过性生活，骗太太说自己阳痿。”另一调查对象在与已婚的前任男友相遇时，后者告诉他已和老婆离婚了，说同她没话说，互相讨厌，没有性欲也没有性生活，“老回味我们在一块儿的时候。”

在如何评价自己的同性恋取向这一价值观问题上，我们的调查对象大致可分为基本否定和基本肯定两种态度。

在持否定态度者的身上这一价值观表现为很强的负罪感和压抑感。一位中年同性恋者说：“我懂这事以后，觉得很痛苦。跟任何人都不能表达。书上讲得很隐讳，但我知道自己是这样的人。我和领导、同志们都相处得很好，但是和他们没法谈。我知道自己不正常，但是不觉得自己不道德。我有时表现出女人的言谈举止，有时能控制，有时下意识流露出来。有同事说，你说话真好听，像小女孩似的，性格温柔挺好的。可也有人说，你女里女气的。我听了很自悲。……我总觉得这不是什么值得张扬的事，我不愿把这种身份暴露出去，我惭愧，有负罪感，很压抑。现在的年轻人敢爱敢恨，我们这些在正统教育下长大的人却总认为这不是什么好事。自己有批判能力才感到痛苦，人都有点双重人格了。我和朋友说，我们都是挺好的

人，惟独这一点和人家不一样。我自觉工作能力、理解能力都不比别人差，但我知道自己在这点上永远不如人家，这将是我终身的遗憾……我觉得是先天的，不怨父母，不是谁教的，不是看书看的，咱这种人就是这种人。人家不是不注意我们，就是厌恶我们。别人不能设身处地为我们想，我能设身处地为他们想。有时我幻想有一种办法，打针吃药能改变我。但是治病的人都不是我们这种人，所以不能了解我们。我几次试图像戒烟那样把它戒掉，最终还是失败了。”

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同性恋者对自己的性倾向持肯定态度，并不感到有负罪感、压抑感或觉得自己有病，而是“觉得自己的生活很充实”。就连前述那位典型的有负罪感的人也说：“我翻来覆去想，我的一生只能是悲剧。但在我最高兴的时候也会觉得很幸福，因为大多数人不能理解的，不能感受到的我能感受到，我好像探索了一些什么秘密似的。别人只有一种幸福和快乐，我却有两种。”（注：这位在我们看来实际上是双性恋者，他对女性不反感，甚至还有好感。）

尽管同性恋群体中有人感到压抑、有人没感到压抑；有人有负罪感，有人没有负罪感；有人认为自己有病，有人认为自己没病，但他们在一个问题上却空前的一致，即：不认为自己是不道德的。一位中年同性恋者在很长时间内一直认为自己不正常，十分痛苦，在他已过“不惑之年”之后，却逐渐改变了看法，认为“这是自然的”了，虽然他对同少年打交道仍有些负罪感。他曾经写过一篇《重新认识同性恋》的文章，其中观点很能代表同性恋的价值观。文中指出有三个对同性恋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其一为“变态论”，他认为既然同性恋是古而有之，那它就是常态，不是变态；其二为“道德败坏论”，他认为这不是道德品质败坏的问题，因为他曾经痛恨自己，极想

改变，但改变不了，可见至少不是明知故犯；其三为“享乐论”，他驳斥了一般人认为搞同性恋是贪图享乐的观点，反问道：如果是为了追求享乐为什么不去找异性呢？

值得注意的还有北京男同性恋者对艾滋病的看法，因为当今世界上有一种暧昧的说法，认为艾滋病是上帝对同性恋这种异常性欲的惩罚，这就触动了同性恋者们本来就十分脆弱敏感的神经，也涉及对同性恋现象的评价（价值观）问题。使我们略感意外的是，在调查中只要一提到艾滋病，调查对象们总会下意识地流露出敌意。有一位调查对象说：“我当然怕艾滋病，但梅毒不曾经也是不治之症吗？为什么没有人因为梅毒认为同性恋是不正常的呢？再说，就像异性性行为只是梅毒的传播渠道而不是它的病源一样，同性恋行为也只是爱滋病的一种传播渠道，而不是它的病源。如果同性恋能在社会中公开化，那么同性恋者就会自愿去体检，防止自己得病也避免传播疾病。如果社会不给你好的待遇，你就只好反抗社会。把得了病的人隔离起来一直到死，从国家考虑是合理的，但从本人来说，与其让人发现还不如多活几年。”看来，从社会安全和全民的健康考虑，同性恋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

分析与结论

在上一节，我们简述了调查所得的基本事实。这些事实可以概括为：北京男同性恋社群的概况及同性恋生活方式——他们如何进入这一社群，他们的感情生活与性生活，他们的婚姻观与价值观。作为一个亚文化群体，他们的行为规范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规范相悖，这是由同性恋生活方式和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共同决定的。

我们准备从价值与事实两个方面对社会中的同性恋现象做一剖析。在价值方面，我们讨论社会、局外人、同性恋者的家人亲友及他们本身对同性恋的看法；在事实方面，我们讨论同性恋的感情生活、行为方式等等。然后将二者作一对比，结果非常有趣。

首先分析价值方面。从调查中我们发现人们对同性恋现象的评价有两点值得引起注意。第一，关于同性恋行为正当与否的问题。就我们访谈所得，还没有人说同性恋是正当的。即使同性恋者中最坚决自信的人，顶多也只能作到对这种行为正当与否的问题置之不理。他们中间很多人对异性毫无兴趣，可还是要结婚，并把这看作对社会应尽的义务。这无异于承认了同性恋的正统地位。

第二，关于同性恋行为重大与否的问题。据现有材料，同性恋行为虽被视为不正当，但并未被视为十分严重的坏行为，至少比之不正当的异性恋是轻微的。我们未访到因同性恋败露而离婚的个案（当然这不等于没有，但至少有人肯定地说，同性恋比第三者插足轻），北京同性恋的活动在有些场合是半公开的，假如异性之间有这么明显的涉及性的活动，肯定会招致更严厉的干涉，我们的调查对象坦白地承认自己有很多性伴侣，而我们在另一项调查中询问异性恋这方面的情况（婚前及婚外性经历），竟找不到几个肯谈的人（包括那些在问卷中注明有这方面经历的人也多拒绝访谈）。总之，人们不认为同性恋非常严重，它不像是邪恶，倒更像某种荒唐。

关于事实方面我们已经谈得很多了，无论从感情的热烈、性生活的内容、还是同性恋活动在当事人生活中的地位等诸多方面来看，其热烈程度均不弱于异性恋。同性恋者之间的关系纵然不及婚姻生活稳定长久，起码不弱于非婚的性关系。简言

之，同性恋什么事都干了，区别仅在于行为对象是同性而非异性。因此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样？

我们还可以换一种方式提出问题：大多数同性恋者已过或将过异性婚姻生活。同性恋看来不算对婚姻关系的亵渎，或重大亵渎。如果从“不忠实”或“外遇”这个角度提出问题，那么同性恋在感情上和肉体上的不忠，丝毫不弱于婚外恋。这里惟一的区别在于前者不会搞出孩子来。

如果我们将目前社会中存在的各种性关系开列出来，可以得到下列清单：（1）婚内以生育为目的性关系。一般来说，只要不加声明，社会默认婚姻的目的为生育。（2）婚内不以生育为目的（或以快乐为目的）的性关系。第七篇中自愿不育夫妇之间的性关系就属于这一类，因为他们已公开宣布不要孩子，将生育剔出婚姻生活的内容之外。（3）婚外异性之间的性关系。（4）同性恋的性关系。

前二种性关系受到法律保护，属正当关系。但是第二类调查对象对我们抱怨道：他们的婚姻关系受到轻视（不是指责），比如说分不到住房，听了很多闲话（如说他们没本事生育）。因此又可将上述分类重新命名为（1）正当而且重大的性关系；（2）正当然而不重大的性关系；（3）不正当然而重大的性关系；（4）不正当而且不重大的性关系。如下图：

	重 大	不 重 大
正 当	（1）婚内以生育为目的的性关系	（2）婚内不以生育为目的的性关系
不正 当	（3）婚外性关系	（4）同性恋性关系

由图可以看出，在涉及性问题时，重大不重大是生育可能性之同义语。第一类性关系之所以正当而且重大，在于它可能产生合法的生育；第三类性关系是严重的错误，原因在于它会产生非法的生育；第二类性关系之所以被轻视，正因为它申明不生育；第四类性关系的错误之所以显得不如第三类严重则是因为它不会造成非法生育。至于正当不正当，则明显是结婚与否的同义语。除非经过一定手续得到社会承认和法律保护，一切与性有关的行为均为不正当。以上解释不但为我们调查中所得事实所证实，而且在逻辑上是严谨的。

调查结果表明，北京同性恋群体无论规模还是活跃程度都超出我们的预料。同性恋者享有某种程度的性自由（至少比不受法律保护的异性恋有更多的自由）。这一点令人感到意外。可以肯定地说：同性恋者的活动完全是为了性和感情方面的满足，不可能有其他目的（如生殖）。这种行为虽然因此在中国社会中永远得到负面的评价，但却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由于受到轻视而苟得的自由。追溯历史也会发现，虽然宋明以来一直有“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法，但逛相公堂养戏子之类的行为几乎是合法的。在这里，实际上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生育重大论。放纵欲望比之造成非法的生育罪名要轻得多。

不需要论及同性恋现象对当事人和周围社会的影响，仅其存在本身（规模、内容、规范、价值观等）就足以引起社会学研究的注意。我们期待有条件用科学的抽样方法对同性恋现象做实证的研究，以得到更精确的结论。

参考书目：

- 布莱克（Black, K.N. 筹：《性角色与对同性恋态度的关系》，
《同性恋杂志》，1984年总10期，第83—92页。

- ② 鲍曼 (Bowman, R.):《新西兰公众对同性恋的态度》,《国际现代社会学评论》,1979 年总 9 期,第 229—238 页。
- 科曼 (Coleman, E.):《婚内双性恋妇女》,《同性恋杂志》,1985 年总 11 期,第 87—99 页。
- 布朗芬 (Brownfain, J.J.):《对已婚双性恋男性的研究》,《同性恋杂志》,1985 年总 11 期,第 183—188 页。
- 德米利 (D' emilio, J.):《性政治学与性社区》芝加哥大学出版社,芝加哥,1983 年。
- ⑥ 迪克森 (Dixon, D.):《双性恋和异性恋丈夫的性满足程度与婚姻幸福程度》,《同性恋杂志》,1985 年总 11 期,第 209—222 页。
- ⑦ 艾斯科弗 (Escoffier, J.):《性革命与男同性恋身份政治》,《社会主义评论》,1985 年总 15 期,第 119—153 页。
- ⑧ 费舍 (Fishel, A.H.):《男同性恋家长》,《妇女健康问题》,1983 年总 4 期,第 139—164 页。
- ⑨ 古德曼 (Goodman, G.) 等:《回溯:80 年代男女同性恋解放运动》新社会出版社,1983 年。
- ⑩ 格林堡 (Greenberg, D.F.) 等:《资本主义、科层制与男同性恋》,《当代危机》1984 年总 8 期,第 33—56 页。
- ⑪ 海伯尔 (Haerberle, E.J.) 等:《粉红三角和黄星:纳粹德国对性学的摧残及对同性恋者的迫害》,《性研究杂志》,1981 年总 17 期,第 270—287 页。
- ⑫ 金西 (Kinsey, A.):《人类男性性行为》,1948 年。
- ⑬ 凯特 (Kite, M.E.):《对同性恋态度的性别区别》,《同性恋杂志》,1984 年总 10 期,第 69—81 页。
- ⑭ 拉森 (Laisen, K.S.) 等:《反黑人态度、宗教信仰、容许程度和性信息:关于异性恋对同性恋态度的研究》,《性研究杂志》,1983 年总 19 期,第 105—118 页。
- ⑮ 劳特曼 (Lautmann, R.):《粉红三角:纳粹德国集中营对男同性恋者的迫害》,《同性恋杂志》,1980—1981 年总 6 期,第

141—160 页。

- ⑮ 里卡塔 (Licata, S.J.):《同性恋权利运动:美国历史一个被忽略的领域》,《同性恋杂志》,1980—1981 年总 6 期,第 161—189 页。
- ⑯ 马洛塔 (Marotta, T.):《同性恋政治学》,荷顿米林公司 波士顿,1981 年。
- ⑰ 米凯尔 (Mitchell, P.):《粉红三角 同性恋解放的激进观点》,埃丽森出版社,波士顿,1986 年。
- ⑱ 西麦里 (Simari, G.G. 筹):《同性恋群体中的乱伦经历》,《性行为档案》,1982 年总 11 期,第 329—344 页。
- ⑳ 范怀克 (Van Wyk, P.H.) 等:《异性恋、双性恋与同性恋的心理发展过程》,《性行为档案》,1984 年总 13 期,第 505—544 页。
- ㉑ 怀特姆 (Whitam, F.L.):《男同性恋的文化相似性质:从跨文化研究获得的推测性结论》,《性行为档案》,1983 年总 12 期,第 207—226 页。

第十一篇 婚姻

近代社会学者们在人类婚姻关系的研究中做出了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突破，那就是，推翻了所谓“一夫一妻制是人类惟一的永恒的婚姻形式”的神话。他们用大量事实和论辩证明：人类婚制确实经过了一个缓慢但是明显的演变过程，原始时代实行的并不是一夫一妻制，而现存的一夫一妻制也并不是永恒的；所谓“惟一”、“永恒”之类的神话，不过是现阶段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物。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人类婚姻关系发展史上的观点亦如上述。他们将婚制的演变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群婚时代，时间约为 100 万年前至纪元前 5000 年（有些区域结束得较晚）。群婚时代的开始，是一个“同从动物状态向人类状态的过渡相适应的杂乱的性交关系的时期”。那时，婚姻不分辈数，甚至存在父母与儿女交媾的现象。接下去是几种前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形式，即（一）血缘婚姻形式：这种婚制排除了不同辈数的人们之间的结合，但同辈者皆为夫妇；（二）普那路亚婚姻形式：这种婚制排除了兄妹之间的结合，采取一氏族的妇女与另一氏族的男子结为共同夫妇的形式；（三）对偶婚姻形式：这是从群婚制向个体婚制过

渡时期的婚姻形式，它虽然是一男一女结合，但家庭还没有成为独立的经济单位，夫妻关系是松散的、经常变异的。

随着母系社会转变为父系社会和私有财产制的出现，人类婚制进入第二阶段——以私有财产制为基础的一夫一妻制阶段。这个阶段大约从公元前 5000 年开始，至今已历数十个世纪。这种一夫一妻制并不是严格的，它被恩格斯称为“以通奸和卖淫为补充的一夫一妻制”。

婚制演程的第三阶段是在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的全民所有完全实现的共产主义时代。对那时的婚姻形式虽然难以预测得十分精确，但可以推知的它的两个基本原则是：一、男女双方完全平等；二、婚姻完全丧失其不可离异性。

我国现存婚姻关系处于哪一发展阶段？它是在怎样的历史基础上形成的？它与历史相比较有怎样的变异与遗传？它存在的合理性是什么，又将怎样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取而代之的未来婚制又将是什么样的呢？

历史

在私有制尚未出现的原始时代，人类婚姻大多出于满足情欲这一十分接近动物本能的动机。但是，“当父权制和一夫一妻制随着私有财产的分量超过共同财产以及随着对继承权的关切而占了统治地位的时候，婚姻的缔结便完全依经济上的考虑为转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75 页）中国古老的婚姻定义是：“婚姻者，所以承先业而继后嗣者也。”为了辨别子女的确属，以求得到确定无疑的财产继承人，形成一个能够使私有财产世代相传的相对稳定的家庭，便发生了为产生合法子嗣而缔结的婚姻，同时出现了为剥削女子劳动力而形成的

家庭奴隶制。在这种婚姻中，男女双方的结合不是基于共同的爱恋，而是为了家族的利益。起决定作用的是整个家族的意志，而不是个人的意愿。那时，结婚成为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家族势力的社会行为。对于男子来说，结婚不是为个人娶“妻”，而是为家族娶“妇”；对女子来说，结婚也不是个人嫁“夫”，而是以“妇”的身份嫁给夫的家族。

这种旧式婚姻在社会上层常常表现为两个家族的政治联姻和经济联姻。俗谚云“竹门对竹门，木门对木门”，我国自古以来是以“门当户对”为婚姻的首要条件的。《大清律例》中明文规定：“夫妻有敌礼之义，而良贱非匹配之宜。良人奴婢相为婚姻，各离异改正，良自为良，贱自为贱。”北魏和平四年诏：“皇族师傅百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不得与百工伎巧卑姓为婚，犯者加罪。”现代的阶级内婚制虽然不再像古时那样彰明昭著，见于经典，但仍为社会实际上分为阶级这一无情现实所决定。拿破仑为了和旧式王朝结成同盟，以博得欧洲帝王中首屈一指的声誉，娶了自己所不爱的奥国皇帝的女儿为妻，就是典型的政治联姻。日本影片《华丽家族》中所描写的金融资本家为了扩充自己经济势力，不惜违背儿女意愿与其他财阀家族缔结婚约的行为，就是标准的经济联姻。在这种政治和经济的联姻中，感情的动机是一文不值的。

旧式婚姻在社会下层的表现形式虽然谈不上政治和经济的联姻，但并没有摆脱经济的考虑，并不能仅仅以双方的爱情为基础。女子是作为廉价劳动力和为家族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工具被娶来的。在以男耕女织为主要形式的中国旧式家庭中，女子担负着相当大的经济职责。“掺掺女手，可以缝裳”（《魏风·葛屨》），女子从一结婚就陷入了伺候公婆、丈夫和子女的终身劳役。《礼记·昏义》中说：“妇顺者，顺于舅姑（公婆）和

于室人，而后当于夫，以成丝麻布帛之事”，这里把旧式婚姻的经济意义和女子在家庭中的经济职能表述得十分确切。

与婚姻的经济动机相应的婚姻方式，是普遍的买卖婚姻和包办婚姻。由于婚姻完全是或首先是一件关系两个家族经济利益的事情，所以它是一笔货真价实的交易。家族为这件大事认真商讨、权衡利害，却不大顾及婚姻当事人的意愿。

在封建统治极为深重的中国，人们可以看到买卖包办婚姻的完备形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千年古训在各类典籍中俯拾皆是。《诗经》中诵道：“**蓺麻如之何？衡从其亩；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齐风·南山》）《礼记·坊记》说：“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币不交不亲。”《左传》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有一个女人，不聘（无媒礼）而婚，虽然为夫家生了一个儿子，还是没有免于被休弃的命运。赘婿婚也可以作为旧式婚姻买卖性质的佐证。《说文》释“赘”字为“以物质钱”。《汉书》载：“家贫子壮则出赘”，就是说有些男子因家贫出不起聘财，只好“以身为质”。在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等严整礼仪之下，在父兄尊长决断的选择和奢华的铺排之中，儿女的意愿被摆在什么位置，爱情又被摆在什么位置呢？几千年来所谓“明媒正娶”的旧式婚姻，把人们束缚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重压之下，人类生活中最美好最珍贵的爱情之花，被这只冷冰冰的磨盘碾得粉碎。正像拜伦的诗句中描写的那样：“平静而高贵——明媒正娶，可是冰冷。”（引自《唐璜》）

在私有财产制度出现之前，无法辨别子女确属的自由性交、自由结合绝不是不道德的，但当建立一夫一妻制家庭有了绝对必要时，作为产生合法子嗣之保证的妇女贞节就变得格外重要起来。以此为基点，形成了一套适应于旧式婚姻关系的伦

理道德。它看上去是那么道貌岸然，而实际上却极端的伪善，它的无所不在的威权令人窒息。

旧道德的特别虚伪之处，在于它只是对女子的约束，而对男子却并无约束。就像一枚铜币的正面永远不能摆脱自己的背面一样，旧式婚姻也绝对离不开蓄妾和嫖妓。于是，所谓“一夫一妻制”变成了只是对女子而不是对男子而言的一夫一妻制。几千年来，我国盛行的实际上是一夫多妻（妾）制。古籍中有“尧闻舜贤，征之草茅之中，妻之以媼媵之以嫫”的记载。春秋时，“上自天子下至庶人，莫不有妾”，“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礼记·昏义》），诸侯一娶九女，大夫一娶三女，士一娶二女，庶民一妻一妾。自汉以来，帝王后妃之多，“晋武至于万人”，“开元天宝中，宫嫔大率至四万”，“隋大业离宫遍天下，所在皆置宫女”。元代刑法虽然规定有妻妾复娶妻妾者离之，但允许妾以一人有限（《元史·刑法志》）明律虽然规定“其民年四十以上无子者方准娶妾”，但一夫多妻毕竟是合法的。

相比之下，女子处于极不平等的地位。首先，对男子纯属虚设的一夫一妻制，对女子却严格地执行了。“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仪礼·丧服》）以夫为天，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离也。“妇人以贞为行者也。”（《谷梁传》）女子贞节要义，首在妇不二适。“得意一人，是谓永毕，失意一人，是谓永讫”（《女宪》）这就是女子在劫难逃的命运。其次，男子可以离妻，女子却不可以离夫。古代有所谓“七出三不去”，都是由男方提出的，女子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因此没有离夫的权利。再次，男子可以再娶，女子却多数不可再嫁。古代天子诸侯不许再娶，死了后妃只是以一娶多女推上为补，后来这一规则被废除了，《仪礼·丧服》上说：“继母如母”，证明男子是

可以再娶的。但是“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女诫》），“凡居父母丧及夫丧而身自嫁娶者，杖一百，命妇夫亡再嫁者 罪亦如之”（《清律》）

我国旧式婚姻对妇女片面贞操的要求，经过宋明理学的加工，变得日臻完备、名目繁多：“节妇”，30岁前守寡至50岁后不改其节者；“烈妇”，夫死殉节或拒奸自尽者；“孝妇”，遵循三从四德、确有孝舅姑之行；“贞女”，未婚夫死，哭往夫家守节者（即望门寡）；“烈女”，未婚夫死，闻讣自尽者；“孝女”，终身不嫁以事父母者。对这种现象鲁迅先生曾讥讽道：“总而言之：女子死了丈夫，便守着，或者死掉；遇了强暴，便死掉；将这类人物，称赞一通，世道人心便好，中国便得救了。大意只是如此。”（《鲁迅全集》第1卷第105页）自从出了因使者未持昭王符而宁愿淹死不下渐台的烈女贞姜，又出了因“傅母不至，夜不可下堂”而宁愿在火中烧死的宋伯姬等，贞妇烈女层出不穷。修祠堂，立牌坊，一搞就是几千年。封建道德已经从其本来意义中抽象出来，变成了一种固定的大量吞噬人类生灵的野蛮习俗。

总之，旧式婚姻关系是一只生长在病态的社会之树上的苦果，它给予人们的远不如人们希望于它的那么甘美，因为它并不是芳香的爱情之果，而是苦涩的经济之果。

现状

自从中国进入近代以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社会生产力有了巨大的发展，现代大机器工业给中国带来的不再是旧时代那种所谓“太平盛世”的繁荣，而是对旧生产方式的整个基础的撼动。从五四运动的启蒙教育开始，我国人

民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反封建斗争的胜利。旧经济基础分崩离析，其上层建筑也得到了初步的清算。公开的蓄妾和嫖妓已经在严厉的措施下完全绝迹，盛行数千年的买卖婚姻和包办婚姻也终于在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大中城市中销声匿迹了。在聚集了全国 20% 人口的城市中，新的生产方式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也带来了婚姻动机、婚姻方式及婚姻道德的巨大变化。

带来婚姻方式进步的原因首先在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废除。由于个体家庭不再是社会的经济单位，“绝大部分耐久的、可继承的财富——生产资料——变为社会所有，而把这一切传授遗产的关切减少到最低限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71 页）消费资料的私有虽仍存在，但它的一般来源是工资，数量极为有限，这样，以产生合法子嗣继承私有财产为目的的婚姻就丧失了其存在的绝对必要性；其次，生产的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和社会服务事业的发展，使得婚姻不再是维持起码生存条件的必要手段（夫妇作为劳动力的合作、丧失劳动力后靠子女抚养等）。人们的谋生手段对家庭的依赖程度少了，而对社会的依赖程度大大增加（教育、养老等），人们的生存方式从家庭本位向个人本位转变的条件已趋成熟。

基于上述原因，我国城市居民已经基本上摆脱了旧式婚姻的沉重枷锁，在较大程度上实现了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方式，基本上做到了自由恋爱和婚姻自主。根据笔者 1980 年在部分城市工人、学生中所做的调查（详见附录一），绝大部分人持婚姻应当自主或基本自主的观点。被调查者中，婚姻完全自主或基本自主的占 80% 以上，父母作主的不到 20%，其中多数也是经过本人同意的。据调查，虽然由于种种条件限制，与配偶自由认识的人数（34.5%）比通过别人介绍而结识的人数

(45%) 要少些，但已是一个不小的数量。从人们的主观愿望来看，愿意与配偶自由结识的人数 (68%) 大大超过了希望别人介绍的人数 (16%)。

在这些人们面前，还展开了一个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新天地。当然，能否选择新的生活方式，除了经济因素外，还取决于社会伦理及心理方面的诸种因素。在旧经济基础消亡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以家庭为本位的旧观念仍会固执地纠缠着人们的头脑。例如：“断子绝孙”虽然不再像过去那样引起深深的恐惧，但据调查结果统计，仍有 4.5% 的人（城市青年工人、学生）持婚姻是为了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观点。尽管如此，从统计中还是可以看出随着新的经济基础而来的新观念。据调查，有 37.5% 的人认为有没有男孩无所谓，21.5% 的人认为终身不要孩子也可以，23.5% 的人认为独身也是可以的。这在信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类伦理观念的社会中，是完全不能想象的。在那里，人们因为没有儿子（男劳力，传宗接代者）而痛心疾首，以“断子绝孙”为最严重的诅咒，怎能指望这些人接受不要孩子、有没有男孩无所谓的观点呢？新的观念反映着新的存在，它证明，我国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正在逐步完成从家庭本位向个人本位的过渡，这确实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我国是一个具有两千年封建传统的国家，生产力的极端落后加上历史包袱的极端沉重，使得每一点改造都极其艰难。对植根于落后的生产方式和深种在千百万人心中的旧式婚姻方式及其观念的改造，就更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占全国人口 80% 的农村，土地私有制虽已废除，但生产资料的一部分还是私有的（除农具外，近年还允许农户养大牲畜），生活资料的大部分是私有的（房产等）。在那里，生产

方式仍处于相当原始的水平上，生产工具极为落后，手工劳动大量存在。与生产方式的落后状况紧密相连的婚姻关系，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直接牵涉到当事人双方家庭的经济利益，产生合法子嗣以继承财产仍有必要，因此，在农村，旧式婚姻的原则仍然是神圣的。此外，由于自然经济比重大，商品经济比重小，交换手段落后，规模狭小，使得社会服务事业很不发达，吃穿住用等消费品多数还要靠自己生产（在一些落后省份，人工推磨和土机织布等仍然存在）。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一个人如果没有配偶作为劳动力的合作，没有子女抚养老年生活，就几乎不能维持起码的生活水平，于是，婚姻成为维持生存所必需的手段。加之按照一般的社会心理，农村女子多愿嫁给城市居民或国家职工，以便过上“旱涝保收”的生活，这就进一步造成了农村男女数量的不平衡。根据供求关系的一般规律，需求的过于紧迫必然造成供给方面的价格加码，女子的买卖价格于是愈益抬高。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对于买卖婚姻和包办婚姻在广大农村、特别是在一些落后省份中的顽固存在，就不会感到十分意外了。

根据我们的粗略调查，在我国农村，买卖婚姻和变相的买卖婚姻严重存在。男青年为娶妻花钱一般在一千元上下，多者高达二三千元。许多人为此 30 岁以上还不能结婚。为了解决这一困难，重新出现了所谓“两换亲”、“三拐亲”。女青年为了替兄弟换妻，往往要违背自己的感情和意愿与人结合，身心健康受到摧残，造成了不少婚姻悲剧。青年人为结婚时免于背债而拼命劳动，节衣缩食，老父母为儿女终身大事终日操劳，心力交瘁。在这勤苦的忙碌中，婚姻当事人的感情因素被置于极其次要的地位。

人们常说，中国人习惯于无爱情的婚姻。这里，有为了经

济的原因不爱而结合，以及为了同样的原因爱而不能结合等多种情况，所谓“先结婚后恋爱”毕竟还有爱情，而许多人就是在无爱情的结合中度日，丧失了人在这一类活动中之所以有别于动物的主要之点——高尚的人类爱情。买卖婚姻像枷锁，折断了爱情的双翼，而爱情是自由的，它天生是要飞翔的。“难道两个将要结合的青年人没有权利自由地处理他们自己、他们的身体以及身体的器官吗？……难道相爱者的这种权利不是高于父母、亲属以及其他传统的婚姻中介人和媒妁的权利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6页）买卖婚姻是由落后的社会经济形态造成的人的异化即人类本性的丧失。试想一个人在恋爱这种最个人的事情上都不能够选择和主宰自己的命运，他能够生活得像一个真正的人吗？

马克思说：“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0—321页）在现今社会中，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种婚姻形式呢？回答看来只能是否定的。对于落后的婚姻现状的改造，归根结底要寄希望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及由此引起的生产、交换和消费形式的进步，寄希望于农村的都市化和农业人口向工商业人口的转移，寄希望于整个社会由家庭本位向个人本位的过渡。

婚姻道德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文中指出：“我们断定，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4页）随着社会经济形态的演

变，人们的道德规范也在不断变化着。封建时代以不能从一而终为不道德，而今妇女再嫁不失为道德，阶级社会中夫妻无感情但在法律的约束下同居被认为是道德的，而到未来的无阶级社会，无感情的同居将被认为是不道德的。在这里，没有一个永恒的、终极的、适用于各个历史发展时期的道德规范，道德只能是时代的产物。

恩格斯关于“两性间的关系将成为仅仅和当事人有关而社会勿需干涉的私事”的说法，是今日中国农民所难以理解和想象的，就像牛耕时代的人们难以理解和想象电子计算机时代的许多事情一样。城市的情况虽然好些，但是在儿童、老人的社会抚养完全实现之前，真正理想的完全符合人类本性的婚姻方式和婚姻道德还很难为大多数人所接受。

我们的调查表明，虽然已有相当一部分人持真正合理的婚姻不应存在不可离异性这一观点，但还是有更多的人出于种种现实的考虑，如保护儿童（父母离婚对儿童有不利影响），保护妇女（被遗弃的妇女再婚有困难）甚至保护男子（重金买妻，离不起婚）等等，选择了离婚手续应当困难些的答案。主张在男女双方不再相爱时应立即分离的，也远不及主张调解的人多，还有少数人认为，即使没有感情也不可离婚。主张只有单方提出离婚就应准予离婚的人数更少，只占 17.5%。如果考虑到无感情即离异的婚姻在现实中比持这一观点的人（39.5%）还要少得多，考虑到已经完全无爱情以至从开始就无爱情的结合在现实中大量存在，人们对于我国现阶段的婚姻状况及婚姻道德就有了更接近实际的了解。应当承认，持多数观点的人们并非全都不懂得，随着社会的进步，婚姻的不可离异性将日趋减少，因而从未来的道德标准来看，男女双方不再相爱时，当然应当立即分离，离婚的手续当然也是越容易越

好，他们做这种选择完全是从我国现阶段婚姻不能不考虑的种种因素（诸如子女的抚养，经济的原因等等）出发的。如果说他们当中确实有一部分人不懂得这一点，那么，这只能说明，他们所具有婚姻道德恰恰是现阶段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

恩格斯曾阐述过这样一个深刻的思想：诉诸义愤是科学上无能的表现，科学的任务在于说明现存的一切的合理性及它们必然灭亡的原因。道德是时代的产物，正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到达仅仅以爱与不爱作为结合与分离的惟一依据的时代，所以，我们还必须承认一切不得已而为之的经济考虑。婚姻道德的研究常常涉及一个人们为之十分激动的题目：某人经济地位改变了（例如：一个农村人变成城里人）便抛弃了原来的配偶，对此应给予怎样的道德评语呢？这里有两个道德标准可供选择：第一，未来时代的道德标准。在城乡、工农、脑体劳动之间的差别已不复存在、不仅生产资料而且消费资料的私人所有已不复存在、儿童老人已由社会抚养的未来世界，男女双方除爱情外一切都不必考虑，因此，不爱而结合是不道德的，不爱就分离则是十分道德的，感情是结合与分离的惟一依据。我们显然不可能用上述道德标准来要求现代人。这样就有了第二个标准：现在时代的道德标准。这就是除爱情外不得有许多派生的经济考虑的道德标准。这个标准一经运用，就得到了两个方面的结论。

一方面，一个人要么不发生爱情，一旦发生了爱情，与异性同居（包括合法非法两种情况），就产生了忠于配偶抚养子女的责任和义务。如果你负责任、尽义务，你就是道德的，反之则是不道德的。这里，也应当包括没有爱情的同居（同样包括合法非法两种情况）。由此可以得出结论：那些因地位改变而抛弃配偶的人是不道德的（应排除买卖婚姻、包办婚姻）。

基于上述原因，当双方不再相爱提出离婚时，行政部门（或法律部门）运用它们的权力规定父母双方各自对儿童抚养应负的责任；当只有单方提出离婚时，则要再三调解，然后决定是否准予离婚。我们知道，在未来时代的婚姻关系中，只要有一方无感情，就构成了离婚的充分理由，但现在却不行。苏联十月革命成功初期以及我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苏维埃政权，都做过“只要单方提出离婚立即准离”的尝试——自然是出于对未来婚姻道德的向往——但结果并不是很成功的。苏联出现了所谓“杯水主义”，中国也不得不对军人眷属作了特殊规定，以防止动摇军心。由此可见，某种道德只能在当时社会经济政治形态所许可的范围内成为现实。

如果你已经肯定了现阶段婚姻必须伴之以责任和义务这一结论，就不能不得出第二个结论：当人们选择配偶时，除感情因素外还做了某些经济考虑，不能认为就是不道德的。即使像马克思那样的理想主义者和伟大的革命家，在处理女儿劳拉的婚事时，也不得不考虑未来的女婿拉法格的“经济状况”，以便保护自己的女儿“不触上毁灭她母亲一生的暗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520—522页）所以我们说，现阶段的婚姻道德绝不是要求人们在婚姻关系中完全排除爱情因素之外的一切考虑。这样的要求固然是理想的，但不是现实的。不能否认，明天的婚姻动机在我们的社会现实中已经存在，但它还很微弱，只是在少数理想主义者中间像火花一般闪耀。这种闪耀与大多数人们之间极为“现实”毫不“理想”的婚姻相比较，没有任何值得过多夸耀的理由。也许他们的爱情十分纯真，但相似的经济地位是他们相爱的物质基础，甚至是造成他们相识的机会和条件，相似的家庭环境、教育环境和生活圈子，促成了他们志趣、爱好、情感、性格的相投，而这一切又

形成了人们选择配偶时的心理基础。所以我们说，中国的问题既不是要让那些改变了经济地位的青年仍去爱原来的朋友（注意：如已同居，则有与对方保持婚姻关系的义务，如想解除婚姻关系，则应做适当的赔偿），也不是鼓励经济地位不同的青年，例如城市和农村的青年都互相恋爱起来，一对一对结了婚，而是争取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缩小城乡、工农、脑体劳动之间的差别，使每一个人（例如城市青年）都能不以同另一个人（例如农村青年）结婚为难事。到那时，新的婚姻道德才能在中国广大的土地上扎根、结果，到那时，我们才能不只在理想中而且在现实中抛弃旧道德，获得新道德。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那种压抑人的天性、造成人的异化的社会经济形态将得到改变，作为“当时的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物”的伴之以责任、义务的婚姻道德也将随之改变，新的婚姻道德——纯粹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道德——将普及于全人类。

未来婚制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家庭起初是惟一的社会关系，它包括夫妻之间的关系以及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后来，当需要的增长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而人口的增多又产生了新的需要的时候，家庭关系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便下降了。大工业的飞速发展，消灭了旧的家庭关系，建立起较高形式的家庭和两性间的关系。在工业发达的国家和民族中，大家族的解体业已完成，小家庭也受到冲击，这一点从欧美各国的现状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就连我们这个素以古风淳厚著称的民族，也已基本上完成了大家族的解体过程，五世同堂、三代同居的现象已日

趋减少，小家庭日益普及。以前由家族对社会保证负责其成员的正当行为，现在已变为个人直接向社会负各种犯罪行为的责任。法律收养弃儿和学校教育儿童，又接收了家庭的部分职能，解除了父母抚养训练儿女的精神义务，进一步松弛了家庭的纽带。

目前，各先进工业国家婚姻状况有某些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例如：生育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家庭儿童拥有数减少，离婚率增高，独居（单身家庭）和不育（不要孩子）大量增加等等。（详见附录二）人们为了摆脱随组织家庭而来的繁重责任与义务，为了避免因生儿育女而来的经济负担，正在尝试选择新的生活方式。特别是战后出生的一代人，对社会、家庭、生活方式的看法大大改变。目前，由于医疗技术水平的高度发达，避孕变得愈益安全易行，男女的自由性交已不再与“私生”联系在一起，因而在法律的权限之外。青年中出现了“公开实行性试验”的行为，追求他们自己的“独特风尚”与“特殊需求”，追求一个“自我表现”和“个人自由”的“随心所欲的社会”。两代人的差距正在加大，传统的家庭形式及伦理道德正在被新的价值标准所取代。作为这种社会现象的理论反映，法兰克福学派“新左翼革命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赫伯特·马尔库塞的理论值得重视。在多年以前，他就把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思想混杂起来，提出用艾罗斯（爱欲、爱神）新文化改变现状的观点。他认为，艾罗斯是积极的创造力量，人类靠这种力量才能全面实现自我。他甚至认为，只有艾罗斯得到解放，人类真正的解放才会到来。他预言，新的人类所遵循的是幸福原则，而幸福和自由是连在一起的，“这种幸福原则排斥一切道德标准”。

恩格斯在讲到个体婚制同奴隶制一起开辟了一个新时代时

说过，在这个时代中，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相对的退步。因为它不可避免地带着私有制社会的种种弊端。精神的解放既带来权利的充分获得和随心所欲的快乐，又带来义务的全面放弃及人与人之间许多美好感情的丧失，肉体的解放既带来人类天性的满足，又带来单纯性欲的泛滥。那种种现象似乎是未来两性关系的端倪，其实却是真正合理的未来婚制在社会现实中扭曲的表现。那么，未来的婚姻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

在阶级社会中，婚姻作为家庭的基础而成为立法的对象，如康德所说：“婚姻即是关于性器官的相互利用的法律协定。”（转引自伏尔佛逊《唯物恋爱观》）在人类发展的未来时代——无阶级社会中，婚姻将会像友谊一样，不再是立法的对象，因为它已经不再是家庭的基础，也不再负担任何责任和义务。以婚姻为基础的家庭，从最初的生产单位，进化为单纯的消费单位，最终在财产社会公有和儿童老人的社会抚养完全实现之时归于解体，这就是家庭制度的演程。作为它的基础的婚姻当然也逐渐趋于自由。从没有爱情的婚姻，到杂以爱情的婚姻，到纯粹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这是人类两性关系进步的一条脉络。这里，有一个根本的原则，即人的解放的原则。从这个原则出发，任何符合人的本性的变更是进步的，而任何压抑人的本性的法规、习俗、伦理道德是反动的。遵循着这一原则，社会学家和进步思想家对于未来婚制作了种种预测，提出种种设想。它们或许带有某些空想的色彩，但未尝不是一些有价值的预言。

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倍倍尔认为：在社会主义时代，结婚这件事是无须经什么法律干涉的私人的契约。与别的感情和食欲一样，设若男女二人不愿再继续结婚生活，社会主义的道德就要求他们分离，因为在这样的状态下还继续结婚

生活是不自然的，同时也是不道德的。（《妇女与社会主义问题》）

社会学家卡宾德也表达过类似的主张，他强烈反对社会法律干涉婚姻生活的宝贵关系，他曾预测，在那遥远的将来，已婚人可以和外人亲密相处，而彼此仍然继续保持完全的忠实，将三位合一及别样的关系永久维持下去。他认为，在那个人们已拥有绝对自由和独立的社会里，多妻制或多夫制也许会自然而然地发生，但这和古代的多妻制多夫制在性质上是截然不同的。那时，一夫一妻制也许会丢掉它的排外性与偏狭性，妇女或男子选择一个以上的异性作为伴侣，也不是没有尊严、高尚及忠实爱情的。

社会学家沙尔·费勒克在《家族进化论》一书中，作了更加大胆的预测：等到生产的手段不再是继承的财产的时候，所谓合法的婚姻也就是无用的，并且是苦人的一个东西了。家庭将成为不必要的，它将在空间里缩减为母亲和小孩的地位，在时间里缩减为哺乳的时期。另一方面，建筑在爱情上面的男女两性关系，将像两同性之间的关系那样自由、变异和复杂。

恩格斯在他著名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运用唯物史观的科学方法，对婚姻制度的未来形式做了充分的阐述。他指出，只有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即马克思所说的“真正的个人所有制”实现之后，只有在消灭财产私有制度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派生的经济考虑消除之后，也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阶级对立和超越对这种对立的回忆的、真正的人的道德才能成为可能。到那个时代，两性关系的规范将是怎样的呢？这要在新的一代成长起

来的时候才能确定。这一代男子一生中永远不会用金钱或其他社会权力手段去买得妇女的献身，而妇女除了真正的爱情以外，也永远不会再出于其他某种考虑而委身于男子，或者由于担心经济后果而拒绝委身于她所爱的男子。那时，对于性关系的评价将产生一种新的道德标准，即不仅要问：它是结婚的还是私通的？而且要问：是不是由于爱情，由于相互的爱而发生的。那时，将通行这样的婚姻道德观：如果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么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那时的一夫一妻制不再是那种以通奸和卖淫为补充的一夫一妻制，而是十足实现的一夫一妻制。这种婚姻之为一夫一妻制，是在这个名词的词源学意义上说的，决不是在这个名词的历史意义上说的。那时，旧道德的两个主要特点——男子的统治和婚姻的不可离异性——将归于消亡，代之以平等互爱，可随时随双方意愿离异的然而更强烈持久的爱情结合。

既然一夫一妻制是由于经济的原因而产生的，从一而终的一夫一妻制道德也是由同样的原因形成的，那么当这个原因消失的时候，它是不是也要消失呢？那时，自由的性关系已经在经济上成为可能，“这会不会成为更自由的性交和随之而来的社会舆论对于处女荣誉及女性耻辱的更加宽容的态度逐渐产生的原因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2页）我们不愿也不能为未来的人类婚姻关系划定任何模式，我们惟一的信念是：它应当愈益符合于人的本性，使人们在这一类活动中不致因任何社会的（包括经济的和道德的）原因而受到压抑。摩尔根说过：“如果一夫一妻制家庭在遥远的将来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那就不能事先预言，它的后继者将具有什么性质了。”

附录一：婚姻问题调查表填写情况统计

本调查表由山西运城拖拉机厂 25 人，江苏无锡柴油机厂 27 人，安徽宿州师范 16 人，山西运城师范 42 人，厦门大学 15 人，四川大学 25 人，复旦大学 16 人，兰州大学 34 人，共计 200 人填写。

1. 关于配偶的选择与确定：

	完全由本人作主	本人作主但须征求父母同意	父母作主但须征求本人同意	完全由父母或其他尊长作主	未 详
你认为婚姻应由谁作主？	55	120	5	0	20
所占比例	27.5 %	60 %	2.5 %	0	10 %
你的婚姻属于何种？	34	80	26	2	58
所占比例	17 %	40 %	13 %	1 %	29 %
以已婚 142 人为 100 %	24 %	56 %	18 %	2 %	0
你所看到的多数婚姻属哪一种？	7	118	59	7	9
所占比例	3.5 %	59 %	29.5 %	3.5 %	4.5 %

2. 关于结识配偶的方式：

	别人介绍	自由认识	未 详
你认为通过什么方式寻找配偶较好?	32	136	32
所占比例	16.0%	68.0%	16.0%
你们两个是通过哪种方式结识的?	90	69	41
所占比例	45.0%	34.5%	20.5%

3. 关于结婚仪式：

	要排场	要郑重	过得去就行	尽量简单	不举行任何仪式	未 详
人 数	2	41	51	70	29	7
比 例	1.0%	20.5%	25.5%	35.0%	14.5%	3.5%

4. 对生育男孩的看法：

	一定要有	最好有	有没有无所谓	未 详
人数	25	74	75	26
比例	12.5%	37.0%	37.5%	13.0%

5. 对终身不要孩子的看法：

	完全做不到	最好不这样	也可以	有很多好处 完全可以做到	未 详
人 数	27	113	43	8	9
比 例	13.5%	56.5%	21.5%	4.0%	4.5%

6. 对独居的看法：

	完全不应该	最好不这样	也可以	是保持个人自由的好办法	未 详
人 数	22	112	47	8	11
比 例	11.0%	56.0%	23.5%	4.0%	5.5%

7. 对离婚的看法：

你认为离婚手续应当怎样？		困难些	容易些	未 详
人 数		83	67	50
比 例		41.5%	22.5%	25.0%
双方不再相爱时应当怎样？	应立即离婚	应调解	不可离婚	未 详
人 数	79	101	3	17
比 例	32.5%	50.5%	1.5%	8.5%
只有单方提出离婚时应当怎样？	应准予离婚	应调解	不可离婚	未详
人 数	35	130	23	12
比 例	17.5%	65.0%	11.5%	6.0%

附录二 国外几种值得注意的动向

1. 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 (单位: %)

年份	美国	苏联	日本	西德*	英国	法国
1950	13.9	17.0	17.3	5.9	4.5	7.9
1970	8.8	9.2	11.9	1.6	4.5	6.1
1975	5.9	8.9	10.8	-3.6	0.6	3.5
1976	5.8	—	10.0	-3.2	-2.1	3.1

* 1973—1978 年 5 年间 西德人口减少 78 万 平均每年减少 156000 人。

2. 家庭儿童拥有数减少:

法国: 1789 年 4.2 人; 1891 年 2.1 人。

美国: 1900—1910 年 4—5 人; 1930—1940 年 2—3 人。

苏联 近期统计 莫斯科 80% 的家庭是独生子女。

西德: 近期统计, 每对夫妇平均生 1.5 个孩子, 50% 的家庭是独生子女家庭。

3. 离婚率增高:

苏联: 每三对夫妇中有一对离婚。

荷兰: 每三对夫妇中有一对离婚。

法国: 每八对夫妇中有一对离婚。

4. 独居与不育者增加:

美国 独居者 5000 万左右, 占全国人口四分之一。

西德: 全部夫妇中生儿育女的只占 60%。